

K250.6

31

2·1

1352101

革命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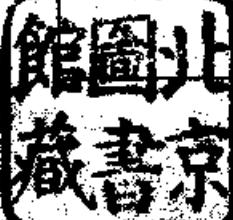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〇·北京



A753668

K250.6

31

2·1

1352101

革命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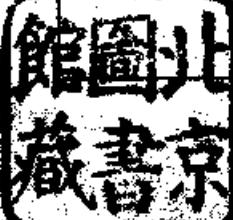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〇·北京



A753668

徐向前 陆定一 许德珩为本刊题词

目 录

写在《革命史资料》之前 王首道 (1)

我的一段经历 安子文 (3)

入草炭子监狱前后 杨献珍 (6)

(一) 接受任务 (7) (二) 饭店失约 (8) (三) 赴
平接线 (9) (四) 落入虎口 (10) (五) 被特务毒害
(12) (六) 秘密刑审 (12) (七) 组织“编供”
(14) (八) 开展斗争 (15) (九) 学习马列 (17)
(十) 出《红十月》 (19) (十一) 识破特务 (19)
(十二) 穿透诡计 (20) (十三) 营救出狱 (21)

“关键一票”的由来

——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

..... 朱仲丽 (23)

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 黄鼎臣 (27)

(一) 国共合作时期，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留学生革
命活动 (27) (二) 国共分裂后，东京特支领导下的
社会科学研究社 (30) (三) 成功的“三·一八”纪
念活动 (33) (四) 反日大同盟的建立 (34) (五) 我

被遣送回国 (36) (六) 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 (38) (七) 反帝大同盟的建立 (41)

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

..... 张维桢 (43)

在同蒲线上 王新亭 (62)

(一) 三打运城 (62) (二) 强攻“卧牛城” (67)
(三) 歼灭阎军晋陕集团 (71) (四) 群凶就缚 (74)

忆张秋人、胡公达烈士 薛暮桥 (82)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承宗 (87)

(一) 撤退 (88) (二) 倾家圩子——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 (92) (三) 华中局城工部——新四军调查研究室 (97) (四) 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 (107)

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聂洪钧 (111)

大革命失败之后

——湖北松滋党组织的发展和

九岭岗起义 黄杰 沈德纯 (116)

记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谭汤池 (121)

王光美同志及其兄妹参加革命的

前后经过 王 新 (142)

(一) 名字里的奥妙 (142) (二) 天津秘密无线电
台 (144) (三) 光美对我们的帮助 (146) (四) “王
光超大夫诊所”——秘密联络点 (147) (五) 接受
新任务 (149) (六) 继续当好一座“桥” (150)

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 王会悟(152)

宁死不屈的李联奎同志 赵鹏飞(153)

专访

于若木同志谈和江青的斗争

.....本刊记者(155)

考证

王若飞同志在内蒙古地区

革命活动的若干史实 史筠(162)

封面题字 魏传统

写在《革命史资料》之前

王首道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革命史资料》丛刊。

文史资料工作自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个事业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工作停顿了十多年。

一九七八年五届政协恢复工作以来，政协委员中增加了相当一批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根据这个新的特点，文史资料工作增加了搜集、整理、编写中国革命史资料的新内容。

两年来，许多老同志和有关人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撰写回忆录，提供革命史资料，有一部分已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现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将部分革命史资料编成丛刊，公开出版。收集在这里的资料，主要是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另外也配备一些有关的印证资料，以便提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并用真实的历史

资料，肃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造成恶劣影响，教育青年一代。

我们希望老同志以向后代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把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的经历记录下来。我想，在向四化进军的道路上，这也是老同志晚年应尽的光荣职责。

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的一段经历

安子文

编者按：这是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忆草岚子监狱斗争史实时，口述的一段本人经历。当时他已经重病缠身，住在北京医院。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子文同志不幸逝世。我们发表他的这段回忆，以表达对这位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的深切怀念。

本文标题是编者后加的。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共青团，当时叫CY。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在河南开封转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天，即入党后的第三个月，在开封被捕。因为我用的是假名子、假口供，敌人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只好把我押在看守所里。

第二年蒋冯战争，韩复榘倒戈，我出了监牢。接上组织关系后，到了上海，担任交通，往返上海和武汉、沙市。

一九三〇年八月间，组织上把我从上海派到了天津，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同志，组织部长是

阮啸仙，宣传部长是余泽洪。工作没有多久，又调我去担任阮啸仙同志的秘书，交通科长的职务便由周仲英同志来接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消北方局，改称为顺直（河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天津。顺直省委书记由铁路工人出身的六大中央委员许兰芝担任，陈原道任组织部长，余泽洪任宣传部长，陈复任秘书长，我仍然担任组织部秘书。陈复去广东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不久，张国焘到天津，决定调我去中央特科工作。顺直省委秘书长职务由刘亚雄接替。

我正准备动身，组织上给我一项临时任务，让我组织“打狗队”，准备狠狠打击叛徒和内奸，一俟任务完成后，立即赶往上海。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贺昌同志负责北方局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大旅馆里曾租用了几间大房子，挂有“星野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北方局机关开会的地方。顺直省委成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地方，但又觉得此处用的时间长了不安全，决定撤消。周仲英同志到“星野公司”去，不幸被敌人逮捕，我并不知道敌人在那里安下了捕网，心里还想：“星野公司”有许多沙发、立柜、地毯、办公桌、小保险柜之类的物品，应当和旅馆结账，然后将所有物品拍卖。组织上当时是十分需要经费的。一天下午，我赶到了“星野公司”，刚进屋就让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们逮捕了。

敌人将我押往法租界工部局，审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忙编了一个假口供，说了个假名字。敌人又问我：“你住什么地方？”

我说：“刚下火车，从北平来这儿找朋友的。”

敌人劈哩拍啦打了我几耳光。再问我，我回答还是那几句

话。结果，他们又拥上来，动手打了我一顿。

在工部局押了三天，又把我转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三个月后，由于“交通”被敌人盯梢，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也关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由于我是早被捕的，没有和他们作为一案。

后来，我们都转到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胡同监狱。陈原道、刘亚雄一案的同志，是“九·一八”之后不久判的刑，鉴于当时的时局正处于大动荡，敌人判的比较轻，在“一·二八”后的一次大赦中便出狱了。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前被捕的，判的刑比较重，大赦减刑也出不去。敌人让我们“反省”，我们坚决反对，当然更不会出来了。因此，抱定决心“红旗出狱”。狱中，我和薄一波、殷鉴、杨献珍、胡锡奎、李楚高等同志一起，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团结广大政治犯，进行反对牧师说教，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和争取改善狱中生活等等斗争，还进行过一次大的绝食斗争，经过长达五年半的狱中斗争生活，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党组织营救我们出狱为止。

出狱后，我被留在北方局，后来又担任了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鬼子进占北平，我便由天津乘船到了青岛，又从青岛到济南，然后绕道去山西太原工作。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杨献珍 口述

(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党校顾问)

编者的话：“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十一个叛徒”案，对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许多同志进行了种种诬蔑，实行了残酷的迫害。



杨献珍同志在北京医院

本篇回忆录中，杨献珍同志以其亲身经历说明，这些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机智，被捕入草岚子监狱后，仍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是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铁的事实完全揭穿了所谓“六十一个叛徒”的无耻谰言。在入草岚子监狱

之前，杨献珍同志还有一段惊险的斗争经历……

接受任务

一九三一年初，在上海的党中央有个计划，准备在北方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其中一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共产党员，是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国会议员的胡鄂公，他在北方的上层人物中有很多熟人。中央决定让胡鄂公赴北方，以他的社会身份和关系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并派我做他的助手。

四月中旬，胡鄂公和我乘船从上海去天津。出发前，中央已获悉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受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和陈原道、刘亚雄等分别被捕。一大批负责干部被捕后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里，法院刚刚受理案件，但还没来得及定案。这是一个机会，中央交付给胡鄂公和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

这时，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成立。省委书记殷鉴同志得知我们到达天津，立即委派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赶来，协助我们进行营救工作。

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刘少白先生（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从北平赶到天津，为营救女儿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等人到处奔走。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方活动，终于使天津法院吐口：花四五千块大洋，就可以把陈原道这批人释放出来。刘少白、胡鄂公原来就是好朋友，刘少白便将营救的经过告诉了他。

胡鄂公听说营救有望，赶忙返回上海，亲自向中央报告。党中央听了胡鄂公的汇报以后，决定仔细研究一下。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央内部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负责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

在武汉被捕叛变。受顾顺章领导的陈赓同志，在上海获悉情报大吃一惊。陈赓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一直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打入敌人内部后常与国民党上层特务机关、租界巡捕房和下面的特务、包探打交道。顾顺章的叛变，使陈赓和特科的几位同志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迅速地离开上海而转移到天津。

我当时住在天津大同公寓，胡鄂公去上海还没有返回来，因此，陈赓等同志的到来由我负责接待。陈赓留下一名特科的王同志和我一块在大同公寓暂住，其它的几位同志，由他再设法安排。

饭 店 失 约

一天清早，我买来几张当天的报纸，突然从《大公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昨晚在“汀州会馆”破获共产党机关……。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破坏了共产党组织，第二天就登报以示“功绩”。我看到这则消息，心中不免一惊，顺直省委书记殷鉴派来的赖德，不就是福建人么！他就住在“汀州会馆”，而且来过大同公寓，并在这里见过胡鄂公。莫非……。我当即告诉那位王同志。王同志常年在中央特科工作，为人十分机警、干练，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搬家转移。

我们搬入新居之后，我说要把新居地址告诉刘少白，以便他有事好找我。王同志说不行，不能把新地址告诉任何人，要我多往国民饭店去找刘少白。

一天，陈赓同志来到我们新居，要我明天八时带他到国民饭店去会见刘少白。第二天，我在家等候陈赓。约定时间过去了，一直到中午十二时他才匆匆忙忙赶来，说上午有人找他，一时脱

离不开。我也没说什么，便带陈赓赶到国民饭店。

但刘少白的房间已经上了锁。

我问茶房，茶房说，“刘先生一早就退了房间，走了。”

我问：“搬到哪儿去啦？”

茶房摇摇头，说：“不知道。”

不好再问下去，我只好带着陈赓离开了国民饭店。

赴平接线

原来，刘少白听到北平的风声，已经转移了。

顺直省委的活动经费，一直是由上海地下党中央通过刘少白转给陈原道、刘亚雄的。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受破坏后，迁至北平，经费依然由刘少白转交给新省委书记殷鉴同志。从刘少白家转经费是绝密关系，只有殷鉴和省委秘书郭亚先知道。六月，顺直省委在北平遭受破坏。郭亚先被捕叛变，马上把刘少白这个关系向敌人告密，敌人当即派宪兵去刘少白家抓人，但刘少白不在北平。出事的当天夜里，刘家的一个男佣人偷偷地跑到了天津，在国民饭店找到了主人，便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家里出事的经过。刘少白得知消息，马上迁出国民饭店，他想把情况告诉我，但又不知道我新搬的住处，只好不辞而去。

胡鄂公这时从上海回到天津，他找到我说，中央已经同意用钱赎买被捕的陈原道等同志，而且已经带来了款子，让我马上去找刘少白。

到哪里去找刘少白呢？我向胡鄂公讲述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事情，并告诉他刘少白已经离开国民饭店，去向不详，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胡鄂公听说后，决定让我到北平走一趟，并告

诉我刘少白的家址——北平虎坊桥，现今的晋阳饭庄原址。

我想，刘少白突如其来地离开国民饭店，必有原因。该不是他家里出了问题？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胡鄂公，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会，他家里会出什么事？你去找他好了。”

于是，胡鄂公将五份早就写好的《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的小纸条交给我，并随手开了北平的五个关系让我去接头，指示我给每个关系人留下一份“大纲”。这五人中记得有张克侠、何基洋……等。胡鄂公又指示，接上头后，去找刘少白，然后留北平开展工作。

落 入 虎 口

七月二十四日，我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平，住进一家公寓里。第二天，我就带着五份秘密的“大纲”，按照早已开好的地址、关系、暗号，挨个儿去接头。中午时分，已经见到了第四个关系人，他家离虎坊桥很近，也熟识刘少白。我便向他打听刘少白家里情况，关系人说刘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并说：“我认识他家，我带你去吧！”走到刘家附近，我让他回去，便自己朝刘少白家院子走去。

进了黑漆大门，看见门里影壁下有个老太太，便问：“刘少白先生家在这儿吗？”

老太太毫无表情地回答：“刘家在后院。”

我进院子前已经打定主意，先看看群众的脸色表情，来判断凶吉，因为我仍然怀疑刘少白突然离开国民饭店，必事出有因。但老太太木然的脸色，使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便一直朝后院走去。其实，就在两天以前刘锡五同志也是到刘少白家来，前院的

一位好心妇女用眼色暗示“刘家出事了，快跑……”。刘锡五同志十分警觉，知道势头不好，转身就走。谁料到正巧被宪兵看见，追出去将刘锡五捉住。尽管刘锡五不承认邻居“通风报信”，宪兵还是把那位妇女痛打一顿，并警告前院的居民，谁也不准再给“来人”任何暗示，否则以“通共产党”罪论处。

我并不知道刘锡五同志被捕这段事儿，刚才影壁下那位老太太脸上又没有什么反映，我就径直走到后院，到了刘少白家推门而入，只见年幼的刘竞雄惊恐地扑到妈妈怀里。一个宪兵坐在屋里，一个宪兵站在屋门后，我被堵在屋里跑不出去了。但我马上想到，身上还有一份情报“大纲”呢，如果敌人搜身就要坏事，必须设法消灭掉它。我一面随机应变地编着假口供，向敌人胡扯着，应付着……，一面打量着两个宪兵。只见一个宪兵走出屋到前院去，大概是打电话报告去了；另一个宪兵背着身，正在找纸片写什么“记录”之类，我就坐到椅子上，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记录着“大纲”的小纸条，放进嘴里，偷偷地嚼着，最后竟吞了下去。身上任何可疑的证据也没有了，我这才喘了一口气，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

打电话的宪兵回来了，他们把我捆绑起来，带到大门口，雇了两辆人力车，一直拉到了宪兵司令部。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刘澜涛和孔祥祯同志，他们也被敌人逮捕，关在这里。

叛徒出卖

天黑的时候，敌人开始审讯我。审问官是李天明，他是个老叛徒，见了我，突然大声吼道：“把胡鄂公交出来！”

我心里想：敌人并没有从我身上搜出任何纸片，又没有同案

人，李天明也不认识我，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天津的活动？

我假装糊涂地说：“什么？”

李天明逼进一步，厉声厉色地叫着：“把胡鄂公给我交出来！”

我仍然装做不解，反问他：“什么胡鄂公？”

李天明冷冷一笑，指着坐在桌子后面的人，说：“你认识他吗？”

刚才被带进这间昏暗的审讯室，我并没有看清桌子后面坐的都是什么人，现在经李天明一指，这才抬起头望了望。原来，赖德就正襟危坐地坐在桌子后面。我恍然大悟，知道赖德已经被捕叛变了，冤家路窄，事情实在不妙，但仍硬着头皮说：“不认识”。

“什么？”李天明又指了指赖德说：“你真不认识他吗？”

我摇摇头说：“不认识。”

只见李天明手一挥，马上冲过来几个特务，把我按在地上，钉上了重脚镣，又连打带踢地把我推进了“密审室”。

秘密刑审

“密审室”其实就是刑讯室，屋里摆着各种法西斯刑具。敌人将我的胳膊用绳子捆绑好，单挂膀悬吊到屋梁上。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房梁上放下来时，我的左手脖子已经骨折了。

“讲！胡鄂公在哪？”特务们仍然向我吼叫着。

我摇摇头，一言不发。

赖德跑来，赖声赖气地对我说：“老杨……”

我没等他说完，便怒不可遏地骂起来：“你给我滚开！”

李天明无奈，又把我带回审讯室，他把一张纸递到我的面

前，那是敌人已经写好的口供，让我签字画押。

我看了看，那纸上写的大意是：杨仲仁奉胡鄂公之命，到北平行刺张学良，煽动军警暴动，策动石友三叛乱……，云云。

我挣扎着抬起头，对李天明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你们的捏造。”

审问官笑呵呵地说：“好，好，这与你无关，只要你按个手印就行了……”

他的话音刚落，几个凶恶的宪兵就一拥而上，把我按住。一个彪形大汉揪住我的右手，硬掰开我的食指按上红印油，又强行在那张“假口供”上按了一下……。

第二天，敌人再次提审我。我还是一言不发，他们又把我弄到“密审室”动刑。这次敌人把我仰面按倒，一个宪兵用他那大拳头在我的大腿内侧来回滚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刑罚，只感觉双腿疼痛难忍，好象锯掉一样。

“说，胡鄂公究竟在哪？”敌人仍然逼问我。

我躺在地上，心想：一言不发不是办法，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于是，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李天明十分清楚，按照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规定，下级工作人员不得过问上级领导的情况和住址。他们便不再追问我了。

后来，国民党法庭按照他们自己捏造的假口供，将我判了死刑。

组织“翻供”

一九三一年，顺直省委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在春季，被捕的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第二

次是在六、七月份，殷鉴同志任省委书记那一届省委。殷鉴同志被捕后表现的十分坚定、英勇，而省委秘书郭亚先、省军委书记廖化平、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省团委书记李国玉等人则相继叛变。因此，在省委工作的同志一时被捕的相当多。薄一波、刘澜涛、魏文伯、孔祥祯、刘锡五、张友清等同志，都是这次被捕的。陈原道同志那一批被捕后，都关在天津市公安局；殷鉴同志这一批，都关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并被判了很重的刑，好多都是判的死刑。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张学良的行营军法处把北平被捕的人都集中调到军法处看守所。由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乔国桢等同志秘密领导难友们搞“翻供”，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审讯。军法处的法官都是东北人，而且多是些老头子，他们不象老叛徒李天明那样，对共产党内部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对党内组织，特别对党的外围组织更是不甚了了。

一天，一个老法官审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在‘互济会’做点事。”

法官又问：“‘互济会’是干什么的？”

我说：“‘互济会’只是帮助被捕坐牢的人做些事情，比如救济他们的家属啦！给犯人送点日用品啦！”

法官听了，忙说：“这是好事情呀！那‘互济会’在官厅立案没有哇？”

我说：“大概没有吧。”

法官又说：“没有立案呀！那可不合法……”

由于我们在军法处搞了“翻供”斗争，不久军法处就把宪兵司令部判的死刑案全部改判了。我由死刑改判为五年徒刑。

开 展 斗 争

一九三一年底，张学良成立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把天津，北平等政治犯都关到那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设在草岚子胡同，故又称草岚子监狱。

这座监狱是封建军阀采用法西斯手段对我们进行长期迫害的地方。监狱面积并不大，可以说只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座灰色的小楼，那是敌人办公的地方。楼前是院子，楼后是一个长筒形的大房子，那就是关押犯人的监号，拦腰有条走廊，以此为界，分为南监和北监。院子四周都设有岗楼，敌人日夜监视着政治犯们的行动。

从铁皮大门迈进院子，临墙有一间平房，那是重病号的监房。由于敌人对待政治犯的酷刑残害，加上营养不良，许多犯人患有疾病，而且有很多人是重病号，如周仲英、魏文伯患有严重的肺病，殷鉴患病后行动很不方便。为了照顾重病号，敌人派我去给他们倒马桶，打开水，打饭等。因此，我也住在那间病号房，并利用出入比较自由，接触比较方便的有利条件，为狱中支部传递消息，帮助殷鉴同志做些工作，并利用空闲时间翻译马列主义书籍，编辑狱中的秘密刊物。

狱中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孔祥祯，后来担任支部负责人的有殷鉴、薄一波等同志。安子文和薄一波同志还负责和外面同志的联系，以取得外面党组织的指示，也通过关系向外面要报纸、书刊以及生活必需品等。

当时狱中的政治犯，主要有天津和北平被捕的两批顺直省委干部，也有从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转来的犯人，还有大学教授派

韩麟符等人和反党分子张金刃（张慕陶）等。政治情况比较复杂。

如何对待敌人的长期折磨和政治围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敌人首先用牧师说教的办法，企图进行软化，促使政治犯“转变”。但这种方法行不通，敌人便宣布了“反省”政策，如果谁不反省悔过，就别想得到释放，将长期关押在反省院。以后又宣布，谁不反省就枪毙。

在这种情况下，支部秘密地领导着在押的政治犯进行了革命气节和“红旗出狱”的教育。所谓“红旗出狱”，就是说只有红旗在全国都飘扬起来了，我们才有可能出狱。也就是说，等待刑满释放出狱，只能是幻想。所以，大家就不反省，不悔过。敌人也没有办法。

敌人为了对政治犯实行高压，加重了对犯人肉体上的折磨与摧残：犯人带上了三斤到六斤重的大脚镣，致使大部分人得了关节炎；每天放风时间很短，一天只有两次；监狱克扣囚粮，米饭里净是沙子，馒头常常是生的，菜汤仅是白水煮菜，没有一点油星……。

根据这些情况，支部又领导了改善生活的一场斗争。

狱中政治犯虽然比较复杂，但由于生活苦，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支部便动员一切犯人，共同对付统治者。全体政治犯都发动起来进行绝食斗争，狱方十分惊慌，终于答应给犯人以洗澡的权利，延长放风时间，病人由六斤大镣改换成两斤半小镣，伙食也略有改善。但敌人没有答应我们看书看报的权利。

学 习 马 列

我们虽然没有从敌人那里取得阅读书报的权利，但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即通过秘密活动，想方设法从外面把当时的报刊和外文马列主义著作偷运到监狱中来。

我们这时已经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争取了几名看守人员，使报刊秘密送进了狱中。那些看守人员，几乎全是下等士兵，家境比较清苦。我们向他们宣传，并利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办法打通了他们，让他们为我们做些工作。如让他们代买报纸时，多给他们一些钱，于是我们就可以很快读到天津的《大公报》和北平的《华北新闻》。又让他们代我们往外送信，一封信给他们两块钱。有时外面朋友送钱来，先由监狱管理员登记存好，然后让看守班长来通知我说“来挂号了！”我有时就说：“好，你取出来用吧！”

遇到狱中大检查，看守班长就跑到我这里来，悄声通知我说：“明天检查号子……”我赶忙通知大家做好准备。

在我住的病号房床底下，我曾经秘密地将砖扒开，挖了一个洞，把一些文件、稿件存放里边。遇到狱中检查号子，我就把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不便保存的东西藏到这里。

那时，法国人开办的北京饭店，附设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可以在那里买到俄文的《布尔什维克》、英文的《国际通讯》等书刊。逐渐地，各种书报都秘密地弄到狱里来了。外文书刊由殷鉴、廖鲁言、刘子久和我几个人翻译，再又秘密地传递到监号里。

记得我翻译过英文版的书，有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

《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以及季米特洛夫的《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等有关文章，还有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英共总书记等人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还设法送出监狱，交天津去出版。后来，李哲人同志告诉我，这本译稿送到他那里，他已经和书店谈妥出版，准备第二天就送去。但是，当天突然有两个躲避警察追捕的人跑到他家里，警察冲进来追人，见桌子上有这部稿子就捎带着抢走了。结果，这部书没有能出版。

一九三七年在太原，我和王若飞同志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在他那里我看一个油印小册子，书名叫《社会主义与战争》。王若飞同志将这个材料递给我看，我一翻，才知道也是我在草嵒子监狱里翻译的一本书。那是我送交魏文伯同志的族侄王伯平保管的，不知他怎么油印出来的。

当时，我们翻译外文马列主义书籍是要避开敌人的，但一天也要翻译出好几千字。我们的翻译方法，一般采用直译，但在文字上尽量避免生硬，要译得流畅一些。

我记得殷鉴同志翻译过俄文的《布尔什维克》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等。翻译俄文的还有孔祥祺同志。

这些马列主义著作，不可能一下翻出一本，那样在狱中秘密传递也不方便，而是采取翻译一段，编好号码，往下发，大家传阅。

出《红十月》

《红十月》刊物是在草嵒子监狱中秘密编辑出版的。

为了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狱中支部除让懂外

文的同志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供大家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外，又决定创办一个小型秘密刊物《红十月》，使大家能交流思想和学习心得，并传达当时党和红军的消息。文章是动员大家来写的，因为不能印刷，只是写在纸上，所以有一定的格式，一篇纸规定写几行字。文章由大家写好后，分别交到编辑手里，再由编辑订成小本本——三十二开本，有封面。编辑中有我和胡锡奎等。

这个《红十月》刊物，在狱中秘密传递，好象敌人从没有发现过。刊物到了监号里，因为难友人多，少则数名，多则十几名，不便于每人传阅，习惯的做法是一个人读，大家听。我们弄到报纸，往往也是一个人来读，大家在旁边听，有人放哨以保证安全。

红军开始长征，我们是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消息的。有一个同志十分留心，不断地根据消息把红军活动记载下来，看看红军从哪里到了哪里，当红军到达陕北后，那个同志居然绘出一幅“长征路线图”，它也编到了《红十月》刊物上。

识破特务

一九三三年何应钦来到北平，带来了一个特务团——宪兵三团，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疯狂的镇压，包括在狱中的政治犯。这是北平最黑暗的时期。

宪兵三团到来后，给监狱订立了新的规定：政治犯不论刑期长短，只要写了悔过书，在报上登了反共文章，就立即释放，拒绝这样做的永不释放。狱中党支部立即动员党员坚决抵制敌人的这种“反省政策”，坚决反对写悔过书，坚决反对在报纸上刊登反共文章。宪兵三团的特务们，每年到反省分院来几次，威逼犯

人们写悔过书。在敌人的进攻下，有的人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叛变了，出去了。绝大部分政治犯的回答是：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坚决抵制了敌人的进攻。

一九三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一些青年学生被捕，判刑后送到反省院来。这些人是狱中的薄弱部分，因为他们都十分年青，没有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到草炭子监狱后，党支部派人做他们的工作，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

由于绝大部分党员坚决抵制了敌人的“反省政策”，这就激怒了敌人。一九三五年，宪兵三团派两个特务伪装政治犯，戴着手铐、脚镣进入反省院，企图混进我们的组织，直接搜查证据。这两个特务进反省院不久，即被我们识破了，对他们严加戒备。但这两个特务仍然向监狱当局告密说，薄一波等人在狱中秘密串通，抗拒“反省”。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副团长，马上判处薄一波等十二名同志死刑。由于“何梅协定”签字，何应钦与宪兵三团离开北平，十二名同志才得以幸免。那两个伪装政治犯的特务，也匆匆地滚出了反省院。

戳 穿 诡 计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宋哲元上台。宋派了一个姓过的老头子当反省院的院长，这人是个佛教徒，给在狱中的人讲佛学，发的是《戒杂放生》之类的书。

一九三六年，华北反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狱中党支部配合外面的斗争形势，领导了争取无条件释放出狱的斗争。监狱当局坚持必须履行登报“启示”的手续。当时狱中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殷鉴，组织干事赵铸，学习干事是我）曾经考虑过，能不能登

一个一般的“启示”，只说出狱后回家务农或者教书，或者谋其它职业，不涉及“反共”和任何政治内容。在同监狱当局谈判时，他们要我们写一个稿子给他们。党支部指定我起草，我就根据支部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稿子，大意如上述所说。此稿交给监狱当局后，第二天，当局先把薄一波叫去，叫他在一个印好的《反共启示》上捺手印。薄一波同志一看，不是我们起草的那个稿子，而是监狱当局另写的《反共启示》。薄当场拒绝捺手印，监狱当局不让他回监房，把他又关押到另一个房子里，并在那个《反共启示》上填上“张云璞”的名子（这是薄一波同志在狱中的名子），又捺了一个假手印，放在桌子上，然后又叫其他人来。第二个被叫去的人，一看是《反共启示》，也拒绝在上边捺手印。监狱当局指着桌上那张有假手印的《反共启示》说，张云璞都捺了，你为什么不捺？第二个人回答说：谁愿意捺谁捺，我不捺。第二个人拒绝在《反共启示》上捺手印，同样不让回到监房，把他又关在另外一个房子里，然后又叫第三个人。这样，所有的人都一个个地被叫去，但是全支部没有一个人在《反共启示》上捺手印。

敌人的阴谋诡计破产了，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个党员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营 救 出 狱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我们在草炭子狱中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战胜了敌人的“反省”政策，遏制了叛变逆流；进行了绝食斗争，取得了改善狱中生活待遇的胜利；战胜了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法西斯恐怖，包括对薄一波等十二位同志判处死刑，同志们没有屈服；相反，

在狱中进行长期学习，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了同志们的头脑，坚定了大家的斗争信心。经过这些狱中斗争的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

一九三六年，华北抗日斗争的形势日益成熟。我们党迫切需要大批经验丰富，熟悉北方情况并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来领导和组织华北地区的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时，北方局想到草岚子监狱中有许多党的干 部长 期被关押，便打报告给党中央，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北平党组织全力营救出狱。

一九三六年八月到十月，我们这些同志相继出狱，立即奔赴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关山整理)

“关键一票”的由来

——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

朱仲丽

(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间，毛主席多次谈话中提到王稼祥同志，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也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在这些讲话之前，我从未听稼祥讲过这件事。后来在我的询问下，他才告诉我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博古等同志继续执行王明路线，使红军在战局上仍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那个时候，毛主席身体很不好，坐了担架，稼祥同志由于在苏区时腹部受过重伤，也坐了担架。行军路上，俩人并排走在一起，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耽

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聂荣臻同志对此有一段回忆：“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同志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由此可见，稼祥同志是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后来，决定博古同志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由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通知他准备，周恩来同志因为是军委主要负责人，他准备了补充报告。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军攻占了遵义城，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由于白天要集中精力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会议都是晚上召开。会址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博古）、刘少奇、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邓发、朱德、何克全（凯丰），红军指挥机关和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也参加了，伍修权同志担任翻译。

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首先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强调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党的军事路

线没有错。博古同志讲完后，周恩来同志作了补充报告。

完了之后，毛主席站起来讲了话，他对博古、李德等人在苏区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短促出击”等口号，和军事上造成的绝大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有力地批判。

毛主席鲜明的态度，使会场出现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王稼祥与朱仲丽在延安

在这个时刻，稼祥同志慷慨发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讲话，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他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红军。

张闻天同志接着表态，他同意毛主席和稼祥同志的意见，对

博古、李德等人作了批判。

周恩来同志紧接着发了言，他的态度十分坚定、诚恳，要求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

几位主要领导同志表了态，会场的意见就容易统一了。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有的同志也畅快地讲了他们的不同看法，但个别同志不仅仍持错误意见，而且态度蛮横，不愿将印把子交出来。

会议期间，李德坐在屋子靠门口的地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吸烟，情绪十分低落。

会议开到第三天，由张闻天同志执笔写会议的决议案。

最后一天，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毛主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同志和王稼祥同志任副主席，王稼祥同志仍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他们三人参加的军事指挥小组。会议选举了张闻天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巨大意义，已经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由于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同志后第二个发言，又是在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第一个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提到他的这一功劳。这就是“关键的一票”的由来。

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

黄鼎臣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致公党主席)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东京的秘密组织，和日本共产党没有组织关系，它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大革命前后，东京特支发动、团结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右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国共合作时期， 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留 学生革命活动

大革命时期，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是国民党右派却在暗地里进行破坏活动，只是这个时候还不敢那么猖狂地公开活动罢了。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黄鼎臣同志
在天安门广场

这种情况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反映出来。那时，在东京的中共党员都属于中共东京特支，但特支是秘密的。党员的公开活动是通过国民党（中共党员当时都参加了国民党），他们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一起在神田的中国青年会办公，所以人们把在青年会办公的叫青年会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些人，是属于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派”的，他们在东京西巢鸭办公，人们称他们为西巢鸭国民党。

从留学生中来看，当时中间派占多数，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西巢鸭的右派力量差不多。但因为当时的潮流是国共合作，所以中间力量多在青年会这一边。留学生在东京的爱国活动，都是青年会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是中共东京特支的共产党员在起领导作用。每次会议的组织、演讲差不多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因此共产党在留学生中的威信很高。

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除了西藏，差不多每省都有一些人，因此各省都有留学生同乡会。所有的留学生都参加同乡会，因此青年会国民党和西巢鸭国民党，即左右派之间的斗争首先在同乡会中表现出来。斗争最激烈的是广东同乡会和安徽同乡会，这两个省的同乡会只要一开会，就有斗争，而且争吵很激烈。

广东省在日本的留学生比较多，青年会和西巢鸭两派力量都比较大。当时各省留学生的管理人员称经理，广东的经理陈季博是个老官僚，十足的右派，思想很反动。他为了拉拢广东同乡会，经常解囊买茶、茶点给同乡会，作为招待之用，节日联欢，他也同样破费，因此，广东同乡会中的许多干事被他拉过去，使西巢鸭派在干事会中占多数。这样他就可以操纵同乡会了，但左派对他坚决反对，操纵和反操纵的斗争很激烈。

有一次，广东省政府准备免去陈季博的经理职务，他就操纵广东同乡会，企图用同乡会的名义给广东省政府发电报挽留他。这是一件大事，干事会本身无权决定，必须召开全体同乡会会员大会。他们在不通知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会员参加的情况下，开会通过了电报，并发了出去。结果给左派留学生知道了，他们坚决反对这件事，于是展开了斗争。在同乡会的大会上，左派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干事会在不通知全体的情况下，以同乡会名义发出挽留陈季博的电报是非法的，经过辩论，那些原来参加会的中间偏右分子也感到理亏。干事会无可奈何，最后决定，再以同乡会名义发出否定前一决定的电报，前一电报电报费也要他们几个人贴出来。这事算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

安徽同乡会也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他们经常借青年会的地点开会，我有时去青年会，听到他们争吵得很厉害，记得安徽同乡会有个童长荣，是个共产党员，斗争很坚决。

其他各省同乡会也有斗争。

尽管两派斗争很激烈，但那时大的活动还在一起，碰到重大纪念日如“五四”、“五卅”“沙巷惨案”等周年时，都开留学生大会。在这些大会上，青年会派往往占优势，因为会议的发动、组织、主持、演讲，一般都是青年会派的人，而且多数是共产党员。记得有个叫何恐的湖北人，是个共产党员，很能讲，而且很能鼓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但一般只知道他是左派，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每次纪念日开完会，我们一定要打着旗帜列队到中国大使馆去提请愿、搞抗议、发电报，这就需要同日本警察进行斗争。按日本的法律，我们在青年会开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活动点，他

们并不干涉。但要列队去大使馆，他们就进行阻拦，常常互相发生冲突，有时互有受伤的。经过斗争，他们也只好让去，但只允许三三两两地走。可是一出大门，队伍又汇合在一起，列着队浩浩荡荡向大使馆出发了，气氛很热烈。这时打头阵的往往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那个时候，右派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这些活动，甚至也参加这支队伍。

总之，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对大的爱国活动，即使西巢鸭派也不敢公开反对，他们只是一股小逆流，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却起着主导作用，这不能不说这是东京特支正确执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二）国共分裂后，东京特支领导下的 社会科学研究社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受到了挫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斗争也激烈起来，青年会派开始分裂了，但分出去的还只是少数，青年会派仍保持着一定的革命面貌。不久“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青年会派随之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退出青年会派，剩下的同西巢鸭派合流了。

我们退出了青年会派，但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组织起更精干的队伍，向着国民党右派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八、九月间，在东京特支领导下，退出青年会派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加上一部分偏左的中间派，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进行半公开活动。

社研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又是一个向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政治组织。为学习方便，社研社分甲、乙两组，日文较好，能读通日文马列著作的为甲组，如廖承志、冯乃超、特支负责人郑汉先、童长荣等，我当时也在甲组，刚到日本不久，还不会日语的则在乙组。两组下面按住的地区不同又分若干小组。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著作，当时日文的马列著作比较多，我们也就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学习是以自学为主，也进行一些讨论。除了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革命气氛很热烈。

除了学习以外，社研社还采取行动，向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一九二八年，分裂后的留学生两派都经过一番整顿，斗争就开始了。

“三·一二”纪念日，他们准备在青山区青山会馆礼堂召开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同时还有文娱活动。我们在东京特支领导下，准备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出面，利用这个会场进行斗争。

首先我们印好了两种文件，一个是对时局的宣言，内容是分析国内形势，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并指出革命一定会胜利等；另一个是告留学日本的中国士官生书，要求士官生认清形势，看清方向，不要给蒋介石当走狗等。文件印好后，又在会前派人去了解他们会议的准备情况，准备演什么节目，以便考虑怎样散发这些文件。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的会员有的带着文件，有的空手陆续进入会场，在二层楼的礼堂楼上楼下各个角落都布置了人，有的准备发传单，有的作掩护，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

会议演讲结束以后，第一个节目是舞蹈，我们根据事先的安

排，观众席的灯刚灭，就将传单象下雪片似的在礼堂各个角落里撒开了，当时场内黑着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等电灯一亮，传单已经发完了。他们一看传单是反对他们的，就赶快追查。日本警察，还有身上别着剑的士官生，到处寻找目标，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有一位叶仲豪同志，是广东人，社研社员，以后参加共产党，是在日本学美术的。这天他在二楼右角发传单时，被一个小孩看见了，告诉了警察，警察就把他揪住了。叶仲豪坚决否认，警察也找不到证据，双方发生争吵，两位掩护的同志就装做劝架的样子，出来劝他们，但争吵还是没完没了。我在左角担任掩护，一看老在吵，怕发生意外，也装做劝架的样子走了过去，劝了一会，警察到底没有抓住什么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叶仲豪同志吵了一架有点生气，觉得发传单任务已经完成了，节目未演完就拉着我要回去，我们刚到门口，警察就把我们揪住了。大概是因为我们中途退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于是就对我们身上进行搜查，当然查不出什么。我又解释，我们路远，怕回去晚，所以早点走，警察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们放走了。这说明斗争不仅要勇敢，还应该有策略，这次叶同志耐心不够，差一点出了乱子。

“三·一二”纪念会的第二天就紧张了。国民党右派不甘罢休，同日本警察勾结起来，到处追查，凡平时言论、行动有左派嫌疑的，都作为追查对象。按日本法律，在没有证据情况下，警察是不能随便搜查的，但国民党右派不管这一套，他们随便撞进人家里检查，查到了就向警察报告，有的还打人。这个时期，右派是很猖狂的。

(三) 成功的“三·一八”纪念活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在东京特支领导下，准备以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召开纪念会，我们主要是纪念巴黎公社，但名义上还是纪念“三·一八惨案”，同时还把三八妇女节纪念也放在这个会上进行。特支要我去借青年会礼堂，因为我在日本时间比较久了，青年会有个排球队，主要是广东人，我也是排球队员，比较熟悉，所以一去，礼堂就借到了。

因为刚发生“三·一二”事件，我们估计这个会决不会风平浪静，右派一定会来捣乱，甚至发生武斗。于是我们作好了准备，让一些人带着棍棒武器以便自卫，又找一些人进行掩护，再找几个人放哨。会议还准备好了传单、标语和讲演稿。

一切准备就绪，会议决定在三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举行，并发出了通知，在青年会门口还贴了海报。国民党右派知道我们要开会，但不知道具体内容。

根据过去的惯例，留学生开会，从来比预定时间要迟得多，如通知两点，起码要到三点才能进行，我们这次会议却准时举行了。而国民党右派却照老皇历办，除了派来一个士官生当侦探，大队伍两点并未到场。

会议由共产党员郑道之主持，参加会的有廖承志、司徒慧敏、刘之汇、郑畴、关键、杜君慧、叶仲豪等。巴黎公社问题由寸树声主讲，另外由两个女同学讲“三·一八惨案”和三八妇女节。讲话快完时，下面就站起来贴标语、发传单。这时国民党右派队伍还没有来，那个当侦探的士官生对会议的性质已经弄明白，站

起来拔出腰上别的短剑就想刺郑道之，其实我们在他前后左右早布置了人，在他后面的大个子黄维聰（即黃健）一下把他两手和全身搂住，另一个人拿起折叠椅就向他头上拍下去，士官生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会议结束后，我们组织人员分批撤退，到靖国神社集中，清点人数，一个不少，这次会议由于安排巧妙，就顺利结束了。等到国民党右派的队伍赶来，我们早已安全撤退完毕，他们什么稻草也没捞到。

国民党右派并不甘心，他们又同日本警察勾结起来，追查会议的主持人。一查是我去借的礼堂，因我是广东人，广东留学生比较多，我又是广东同乡会总干事，所以国民党右派不敢直接找我，只能向警察告密。于是派出所对我进行传讯。会议在神田青年会开的。本应由神田三崎町派出所管，但会议已结束，我又住在本乡，神田就无权管了，只能由本乡派出所传讯。本乡派出所问了一下，我说明是留学生要开会，托我去借礼堂，我给办了，至于具体发生什么事，我没去，也不知道，就这样我把责任推卸了。日本警察对青年会内发生的事本来就不愿管，因国民党右派追得紧，不得不应付一下差事，所以问了我情况以后，就让我走了。

（四）反日大同盟的建立

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济南军阀张宗昌阻止国民党中央北上，南京政府派蔡公时同日本进行外事交涉。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于五月三日占领了济南，并杀害了蔡公时，还屠杀了许多老百姓，这就是济南“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国民党也表示抗议，反日浪潮掀起来了。

消息传到日本，中共东京特支立即组织了留学生群众大会，所有的学生包括国民党右派都参加了。

会开得很热烈，各同乡会、同学会都有发言，慷慨激昂。大会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大同盟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总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主任是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杨的国民党左派；组织委员会由广东同乡会负责，我任主任委员；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记不起来了。

大会以后，各省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继续开会，在这个时候，左右派的斗争仍很激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上。右派表面上也支持反日大同盟，但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由国民党领导。我们在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坚决抵制。会是我们组织的，建议是我们提的，我们斗争坚决，因此，群众支持我们，国民党右派想夺领导权而无法得逞。

反日大同盟在东京成立以后，日本仙台、京都等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反日大同盟的分会，而且还派代表来东京联络。为了进一步展开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我们也派人到神户、横滨等华侨比较多的地方去宣传，并为解决同盟的经费进行捐款。记得当时曾派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陈的留学生，和一个叫杜君慧的女同志（广东人）到神户宣传。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捐了一大笔款。但后来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破坏。

为了取得同国内的联系，大同盟还派一个代表团，由关键同志（中共党员）带队回上海，成立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

因为大同盟的宗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引起了日本当

局的仇恨，特别是军方。军部派侦探到处检查进步留学生，政府的警视厅也派出许多便衣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也曾派人到我家来，问我对反日大同盟的看法。其实，大同盟的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已经宣布，他们也知道。我旗帜鲜明地告诉他们，中日两国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济南，杀了我们的同胞，我们反对的是日本的侵略。

不久，日本当局就开始抓人，到处搜索。广东同乡会一个叫李洁冰的女干事，是在日本学画的，只是一个爱国的中间群众，济南惨案引起了她的愤怒，也参加了反日大同盟的活动，并积极地到处宣传，结果被日本警察抓走了。由于她的房东小石川女子宿舍负责人、广东留学生经理、同乡会和日方交涉才被释放。

（五）我被遣送回国

李洁冰被释放以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准备去慰问她，然后到东京车站为赴上海的反日大同盟代表团送行。这时，警视厅的便衣已经盯上了我。

待我从李洁冰宿舍出来，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匆匆上了有轨电车，向东京车站而去。便衣警察一看我上车，也赶忙上了车。电车驶到虎之门警视厅的所在地，车刚靠站，便衣警察便上前对我说：“黄先生，你下车吧，我们有事找你谈谈。”我说：“不行，我还有急事。”他说：“我知道你是去东京车站吧？你一定要下去，有事同你谈。”不管我怎么说，他一下把我拉了下来。

到了警视厅，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值班的也正准备锁门走，看我去了，又开开门让我进去。他问了我一些事，我一概

都不理睬。这下他急了，伸手给了我一个耳光。我那时年青力壮，就同他扭打起来，但他们人多，终于把我抓住，送到日比谷公园派出所扣押起来。在派出所关了七天左右，那个警视厅的便衣警察又来了，他说请我吃点东西去。我以为这是释放了，就说：“我不饿，不去。”他说：“那好，走吧！”又把我带到警视厅拘留所关了起来。

关了二十九天，中间审问了几次。谁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反日大同盟总务委员会那个姓杨的主任也被抓起来，并什么都交代了。于是又审问我，我还是什么都不说，那个审讯者说：“你不说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从姓杨的那里什么都了解到。”并一拍桌子吼道：“你为什么要反对日本？”我说：“日本人民对我们很好，我们不反对日本，反对的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因为它侵略我们的国土，杀了我们的同胞。”他又问：“你们为什么学苏联，成立什么委员会？”我说：“我们并不是学苏联，因为大家都起来了，需要组织委员会来做什么，名称是大家定的。”他们觉得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又把我押下去了。

关押到第二十七天时，当局把我住的樱洲馆老板找来了。房东平时对我比较了解，知我在旅馆也安分守己，所以看见我，觉得很奇怪。他问我：“黄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我把反对日本侵略济南、杀害我同胞的事告他，他低头不语了。警视厅问老板：“黄先生欠你什么债务没有？”老板说：“就这个月房租未交。”这时，警视厅向我宣布要将我押送回国，并不准回旅馆，让我结清帐目。

我告诉老板：“我身上只有很少的零花钱，因为我被抓，家里也没寄钱来，我房中的东西就作为抵押，如不够，我以后想

法还你。”这个房东还不错，他说：“黄先生！够也好，不够也好，都无所谓。你还要什么，尽管说好了。”我当时只要了一个听诊器、三本医书，其余都给他留下了。

第二天，房东把我要的东西送来了。当局问我有买船票的钱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他们给我买了船票。我把身上的几角零用钱买了几张明信片，给樱洲馆的朋友叶仲豪同志写了信，告以自己将被遣送回国，当天下午就去横滨坐船，具体开船时间到横滨再告。

我被警视厅逮捕，同学们都不知道，以为我已经被日本人暗杀掉了，有的还写信回国说了这件事，这次收到我的信，才知道我还活着，他们都非常高兴。

我由警察监视着从东京坐车到了横滨，被带上一条日本货船。我赶忙简单地给东京的朋友写了明信片，证明自己坐的船号及开船时间，托一个码头工人将信发了出去。警察一直在我旁边监视着，直到开船的汽笛响了，他们才下了船。

货船要在名古屋、神户等港停靠，每次一停靠，警察就上船来监视我，直到开船。叶仲豪同志接到我从横滨发出的信，根据船号，打听了船到神户的时间，就赶到神户码头，上来见了我。警察不准多说话，而且必须用日语交谈，叶仲豪同志带点零花钱给我，要我保重。我担心到上海后被交给国民党当局，就要他打电报到上海反日大同盟分会，要他们到码头接我。

（六）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

我乘的日本货船到达上海，上海分会已经派两个同志在码头

上等我了，一个是杜君慧，她比我早回国，这时已入党；另一个是姓吴的贵州省籍的同志。他们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卡车，把我带上，直向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驻地——上海南市的大同大学驶去。

回到上海，我便到分会工作。我了解到，当时带队回来的关键同志带有东京特支的介绍信，所以很快和江苏省委接上关系，从此由江苏省委秘密领导分会的工作。东京特支书记郑汉先和童长荣同志比我更早被遣送回国，这时在闸北区委工作，对分会的工作也作些具体指导，同时也是分会成员。

上海分会的党组织关系在南市区委，工作归省委领导。对外以公开的反日团体作了登记，在大同大学挂出牌子，领导人都印有名片，以便开展合法斗争。

关键带着代表团刚到上海时，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反日大同盟的宗旨，接着又去慰劳伤兵，访问各界团体、机关，所以大同盟在上海影响不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知道我们的来意，但对我们内部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他们成立有“抗日会”，一开始就企图把我们纳入他们的范围，但我们根本不理它，因此便对我们发生了怀疑。

因为我们是真反日，这同国民党政府的假抗日是针锋相对的，所以，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相互矛盾就发生了。但是，国民党当局毕竟还有抗日的假面具，所以也不敢抓我们，也不敢取消反日大同盟这个团体，只是在暗地里搞阴谋，处处刁难我们。

我们在大同大学办公，学校师生都同情我们，同我们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但国民党市党部却命令学校当局，让我们搬出大同大学，我们还是没搭理。学校当局赶来说：“我们也为难，上面

命令不能不听，你们还是赶快搬走吧！”我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同盟分会被逼迁而未迁时期。最后，我们终于从大同大学搬出，迁到徐家汇附近的光华大学，这所大学是圣约翰大学闹风潮时分出来的，学生都比较进步。

我们搬到光华大学以后，照样向学校当局登记，也在他们那里吃、住。学生对我们很热情，关系很好。我们在学校里出壁报，廖承志同志担任一部分壁报工作，他能写能编还能画，多才多艺，编出的壁报，人们很爱看。我们还进行了其他宣传，工作很有起色。

不久，国民党市党部又采取同样方法，要学校当局让我们迁走。这时，我们经费很困难，省委每月给每人三元二角钱生活费，由于党的经费太困难，有时给我们，有时还不给，我们连膳费也欠学校一部分。没有钱是无法搬走的，我们想法让大家捐款，但是同志们这时都很困难，也捐不出什么。

正在焦急的时候，廖承志同志给解决了困难。一天，他找到我说：“老黄，现在经费困难，我想了办法，你看行不行。”原来，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一直不想让廖到日本学习，而是希望他去德国留学，到欧洲留学，国民党还答应给经费。廖承志同志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母亲表示要去德国，去德国必须先学一点德文，而我是懂德文的。廖就想以请我当德文老师的名义，向他母亲要一笔学费，作为大同盟上海分会的经费。我也觉得只有这个办法了。

廖承志同志把我带到法租界金神父路他的家里。何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这天穿着夏布长衫，摇着羽毛扇，刚开回来。廖把我介绍给她：“这位黄先生，也是广东人，懂德文。”在我走

后，廖就向他母亲提出请我当德文老师的事，何当即同意了，给了几十块钱。我们拿着这钱，付过光华大学的费用，就搬到善钟路（现叫常熟路），租了房挂出牌子，在那里自己起伙，继续办公。

我们在上海搞宣传，除了访问外，主要是发传单。我们发传单不用飞行集会的方法，而是采取派传单的办法，即挨家挨户分送，或通过邮局寄出去。为了扩大宣传，我们还编了一种刊物叫《反日同盟》，公开在书店出售。

一次，有两位男同志到浦东区去派传单，传单的内容是一项声明，被工贼碰上了，被弄到了国民党龙华司令部。这两位同志，一个叫何鸣九，一个姓张（忘了名），都是云南人。我们的声明只是反日，并未涉及国民党当局，因此我们去和军法处交涉。我和一个姓胡的同志到了军法处，递进了名片。军法处处长是一个留日毕业生，他也觉得这两位同志没有什么罪，就让我们进去了，并开条让我们见了两位同志。军法处长说：“没有什么问题，查一下可以释放。”他还说：“你们可以不在上海宣传，上海大家都知道了，你们到乡下去宣传吧！”

但是，两位同志并没有被释放，听说是龙华司令部政治部不同意释放，军法处就把何、张交给他们审查。他们在我们的刊物《反日同盟》上一字一句挑毛病，最后划了几道红杠，说有马列主义的论点，要军法处判刑。结果这两位同志被判处十一个月徒刑，在漕河泾监狱执行。一直到期满才释放。

（七）反帝大同盟的建立

八月初，江苏省委同我们联系的同志来了，找我和关键两人

开了个会。他说：“我七月份到乡下去了，一直没与你们见面。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不仅要反日，而且还应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应该组织反帝大同盟。”

根据省委的指示，由我们发起，思想社（原创造社）、大夏大学、新滇社、上海艺术大学等七个单位筹备了反帝大同盟。接着，在善钟路上海艺大开了成立大会，反帝大同盟正式成立了。大同盟也成立了总务、组织、宣传三个委员会，总务委员会由思想社负责，主任潘汉年；组织委员会由反日大同盟负责，我任主任；宣传委员会由新滇社负责，艾政（即艾志诚，云南人）任主任。整个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我们做得比较多一些。

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我被捕了，对以后反帝大同盟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据说到了一九三二年，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反帝大同盟受了一些挫折，一次在上海共舞台开会，被抓了一批同志，送到苏州监狱，那时我正关在那里，从这些同志的口中才听到一点消息，说这个组织发展得很大，对反帝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 工运的一些情况

张 维 楠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总工会顾问)

〔内容提要〕本文记述了顾正红惨案、“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江苏省委遭受破坏、一九二七年底的罢工斗争等。作者并对工运领袖刘华同志的牺牲、周恩来同志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和“四·一二”事变后的指示，以及与资本家、工贼、叛徒、反动帮会进行斗争的史实，作了详细的回忆，对党内错误路线造成的危害，也作了一定的揭露。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即顾正红被日本人打伤，后来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的那天，我从湖南来到了上海。到沪后，由任弼时同志介绍，我住进了上海地委。不几天，根据形势的发展，上海地委派我到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地址在小沙渡弹子湾）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公开了，刘华同志宣布我担任办事处秘书主任，陶静轩同

志为组织部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一九二八年初，我一直从事职工运动。

—

顾正红惨案发生前，我们党已经在纱厂工人中开展了工作。一九二四年夏，项英、嵇直和孙良惠同志（原同兴纱厂工人，满族）在小沙渡槟榔路组织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参加的二三十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纱厂中的先进分子。俱乐部推选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时常来俱乐部教书和演讲。不久，项英、嵇直同志调走，党派刘华同志（原名刘剑华，四川人，曾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当过学徒）到俱乐部接替秘书工作。俱乐部以多种多样方式，无情地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数月后，俱乐部便由最初的二三十个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个会员，顾正红同志是其中之一。在这些会员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沪西各厂也开始秘密建立了不少工人小组，总人数近千人，其中内外棉五厂、七厂有一二百人。

第二年二月二日，小沙渡内外棉八厂的日本人无理打骂粗纱间的女工，全厂工人愤愤不平，接着，厂方又把粗纱间几十名男工开除出厂。全厂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表示强烈抗议。日本人不但不认错，反而拘捕了六位工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二月九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

罢工首先从内外棉五厂开始，内外棉七厂、十二厂起而响应。刘华同志同罢工工人代表商量了条件，提出，不准打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无故克扣工资，以及增加工资、释放被捕

工人等项要求。刘华亲自起草了罢工宣言，揭露日本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压榨、侮辱的事实。在上述几厂罢工的影响下，内外棉三厂、九厂、丰田纱厂工人纷纷响应，沪西的日人纱厂掀起了罢工高潮。这股浪潮很快又波及到沪东的东华（张佐臣同志领导）、大康（朱英如领导）、裕丰等厂。前后有二十多家工厂，好几万工人参加了罢工。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找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接受了一部分条件，使复工达成协议。二月底，罢工结束了。

这次罢工，给了日本资本家一次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使工人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组织——工会了。在小沙渡，工会组织一下子就增加了好几千人。这次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序幕。

二

二月罢工结束后，日本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防范，甚至扬言要取缔沪西工友俱乐部。他们一手制造了顾正红惨案。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宣布关厂，刁难工人。工人们义愤填膺，工人顾正红挺身而出，代表群集在厂门外的工友，向日本人进行交涉，日本人竟残暴地向他和其他工人开枪射击，顾正红连中数弹，伤势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光荣牺牲。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工人群众悲愤万分，刘华等同志动员和组织群众，决定以罢工的行动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罪行，支援内外棉七厂的斗争。五月十六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一

万多工人全部罢工。工会并派出代表到各学校、团体报告顾正红被枪杀的经过及日本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事实，讲述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各校学生听到这些，立即组织起来，走上街头，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向市民广泛宣讲顾正红被杀事件，募捐救济罢工工人。三十多个团体还组织了“日本惨杀同胞雪耻会”。五月二十四日，党组织决定，在潭子湾召开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大会总指挥为刘华、主席为孙良惠。大会进行中，“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群众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最后，发展到五月三十日学生、工人到南京路演讲，英帝国主义者的巡捕灭绝人性地向学生、工人开枪，当即打死打伤我学生、工人几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当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结成各阶级联合战线，组织罢工、罢市、罢课，联合向帝国主义斗争。同一天，上海学生、工人与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商谈总罢工、罢课、罢市事宜，经过斗争，总商会接受了这个要求。五月三十一日晚，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的决定，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做秘书长工作），赵子敬、刘贯之任交际部正副部长，何松林（即汪寿华）任组织部长。总工会设在中华新路，下面有五个办事处，挂出了公开牌子。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六月一日上海总罢工。六月一日，上海全市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实现了！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不久，总商会要求允许商店开市营业，表示愿意捐款救济罢工工人。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在党的同意下，答

应了他们的要求。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继续坚持。此时，上海总工会已拥有近两百个工会、二十余万人之众，工人阶级已经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强大基础。工会还组织了纠察队，用木棒武装起来，仅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就组织了八百多人。那时，警察见了他们，都打一个敬礼。纠察队的队员和工作人员，每天发十六个铜板，只能吃点馒头、稀饭、咸菜。罢工工人每月也只由总商会发六元救济费，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同时，和资本家的斗争也越发尖锐复杂起来了。

约在八月间，一个暗中和日本人勾结的大流氓顾雪桥，冒充顾正红的族长，想以一万元抚恤费的代价结束顾正红事件，破坏反帝爱国运动。我们知道此事后，第四办事处主任项英同志要我带领纠察队员给他以惩办。一个早晨，我同四十多个纠察队员到顾家，将顾雪桥从睡梦中揪起来，带到第四办事处，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让他写了悔过书，找了铺保，然后才释放了他。

前面提到，罢工工人每月由总商会发给六元救济费，它是全国各地和海外许多进步团体捐助的。这笔款由总商会转发给罢工工人。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竟利用转发这笔钱的机会，配合顾雪桥搞阴谋，宣布停发工人的救济费。当时，刘少奇同志知道后，斩钉截铁地说，停发救济费，就是破坏罢工，上海工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立即指示每个办事处派十个人到总商会质问虞洽卿。经过斗争，虞洽卿只得老老实实地继续发给救济费。

罢工两月有余，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出卖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以及帝国主义采取种种策略进行破坏，在继续罢工斗争问题上，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已无法一致行动。因此，从八月下旬开始，经过谈判结束罢工，条件还是按顾雪桥的调子，给顾

正红家属一万元的抚恤费，以及各厂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赔偿工人罢工期间的损失十万元等。至此，日本纱厂、英国纱厂等陆续复工。

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当年八月二十二日商务印书馆职员、工人罢工和八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工人罢工，他们在罢工中提出了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和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缩短工时等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三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对上海工人在“五卅”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所显示的非凡英勇和伟大力量，又恨又怕，他们合谋进行穷凶极恶的反扑，矛头直指上海总工会。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他们雇用的大批流氓、打手，携带手枪、木棒、铁棒，一齐拥至中华新路新华里上海总工会会所，遇人就打，见物即毁。幸亏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在暴徒到来之前，已经安然离开了总工会，但暴徒还是打伤了工会干部朱宝廷等，将办公室捣毁一空。这样还不甘心，到九月十八日上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竟指使北洋军阀，以武力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同志等。

十月间，帝国主义者企图抵赖在“五卅”惨案中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上海举行所谓“司法调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沪案重查”。

十一月十五日，封建军阀又将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刘华同志逮捕。十二月十七日，由军阀孙传芳下令秘密杀害，

并丧尽天良，灭尸不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华同志的牺牲，是和张国焘直接有关的。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李立三、刘少奇相继离开上海。十一月，上海总工会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当时不叫代表大会），选举上海总工会领导机关。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华同志刚被逮捕，由于敌特机关掌握的刘华同志照片是个瘦子，而刘华同志被捕前在宝隆医院住了几个月，人比较胖了，且又改了姓名，敌人一直没有认出他来。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胡说什么外国政治犯一选上议员，政府就得释放。他提出选刘华同志为副委员长，公开宣传，并要各厂派代表到敌司令部要求释放刘华。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听信了他的话，选举了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王景云、杨梅生为副委员长。会后，各工会派出许多代表团到淞沪戒严司令部，强烈要求释放刘华同志。这样，刘华同志的身份被暴露。后来，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从孙传芳司令部的档案中，发现外国领事给孙传芳一百万元钱，让他秘密杀害刘华的文件。刘华同志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他的英名将永世长存！

敌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流氓捣毁总工会时，工人纷纷赶来保卫；许多团体派代表前来慰问。总工会遭到无理封闭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告工友书，鼓励工人继续团结战斗。上海总工会也发表宣言和通电，揭露敌人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迫使军阀启封上海总工会，释放被捕的工会干部，撤销通缉令等等。十月十八日，上海工人代表会即上海总工会联合学生、妇女和市民团体召开八万余人反对“沪案重查”大会，决议“誓死反对‘沪案重查’”。当刘华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更加激起了

上海工人群众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刻骨仇恨，正如我党在《悼刘华同志》一文中所说：“在刘华同志鲜血淋漓的尸身面前，上海工人是不哭的，他们宣誓继续刘华同志的工作，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而奋斗”。十二月六日，人民的怒火爆发了，数万工人、群众群情激愤，高呼口号，集聚闸北顺城里，强烈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总工会代表陈之一在群众热烈掌声中宣布：自行启封上海总工会！群众将门上的封条撕毁了，大门洞开，人们欢呼跳跃，四周响起了“上海总工会万岁”的口号声。总工会当即发表了致全国各界宣言，决心继续爱国运动，为保卫工人的自身利益而斗争。

在工厂方面，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也异常尖锐激烈。英人和日人纱厂的资本家，以为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刘华同志被杀害，工人骨干力量已被摧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向工人猛扑过来。其实他们又失算了。九月二十三日，沪西日华纱厂的资本家，否定“五卅”复工条件，任意开除工人，打伤工人。四千多名工人立即举行罢工，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十分之一，抚恤受伤工人，发给罢工期内每人工资两元……。十一月下旬，老怡和纱厂资本家，无故把工人王根英叫到写字间，交杨树浦巡捕房逮捕。六千多名工人闻讯，立即冲向杨树浦巡捕房，将捕房包围，捕房用自来水笼头向工人猛射，工人们不畏寒冷，坚持斗争，最后捕房不得不将王根英当场释放。工人们护送着王根英回到厂里，要求资本家向王根英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拘捕工人，不打骂工人，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否则决不开车。资方只得一一允诺。十二月中旬，杨树浦纱厂（即新怡和纱厂）粗纱间工人陈某，被资方打伤致死，全厂四千余人罢工，提出抚恤死难家

属，不准打骂工人，不准开除工人等条件。十二月底，沪西日商同兴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破坏“五卅”复工条件、克扣工资等举行罢工，日华纱厂也举行了同情罢工。上述各厂罢工，除日华纱厂、老怡和纱厂工人取得完全胜利外，其它各厂也基本取得了胜利。

四

一九二六年，罢工斗争仍是持续不断。

二、三月份，首先由沪西内外棉东五厂、西五厂开始，工人要求厂方增加工资，不准开除工人，不准克扣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此后，内外棉九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等陆续出现罢工斗争。这些罢工影响到曹家渡的丰田、公益等纱厂的罢工斗争，又波及到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的罢工斗争，最后发展到估衣业、药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工人要求大致与东、西五厂相同。在沪西工人斗争鼓舞下，英商电车工人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经工部局发给执照，正式成立了电车工人俱乐部。至七月时，罢工斗争均取得很大胜利，以电车、先施、永安、新新公司、估衣业、药业的罢工最为突出。

沪西、沪中等区罢工此起彼伏时，惟独沪东区工人平静无事，赵世炎、汪寿华同志批评了党的沪东部委。部委书记张叔平同志（“四·一二”后在杭州牺牲）乃决定老怡和纱厂举行罢工。不料，厂方以关厂相威胁，罢工持续了三个月。部委乃又调我兼任恒丰纱厂工会组织员，组织恒丰纱厂的罢工。经过深入发动工人，罢工搞成了。但厂内有一个资本家操纵的反动组织“两

“湖同乡会”，利用同乡关系，蒙蔽了一些工人，对罢工斗争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一面派人做湖南、湖北籍工人工作，告诉他们“两湖同乡会”除了为资本家利益服务外，为两湖同乡从未做过什么好事，启发他们觉悟，不要为资本家所利用。同时，我们发动群众捣毁了“两湖同乡会”的会址，把他们搞臭了。资本家由于失去了“两湖同乡会”的支持，不得不找厂工会谈判，被迫同意工会提出的十一项条件，其中突出的一条是：女工产前产后休假四十天，工资照发。同时同意复工的时候，放鞭炮欢迎。复工那天，工人们兴高采烈，列队从工会出发，队伍前面鞭炮齐鸣。

恒丰纱厂罢工胜利了，老怡和纱厂的资本家才开始同意与工会谈判，但态度还是强硬，除同意每人每月增加米贴三分小洋外，还坚持要开除四十个工人。由于罢工时间已有百天，工人生存困难，只好达成协议：李世民（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根英等四十个同志被开除出厂，但资方也被迫同意工会派一人进厂接替李世民的工作（李在厂里的工作是抄号头）。

十月，我被党组织派到老怡和纱厂接替李世民的工作，并接任厂的党支部书记。厂内虽被开除了几十个党员，但经过整顿，力量还是很大的。这时，由于北伐军进展甚速，工人武装暴动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一般的罢工斗争也就停下来了。当月，由于国民党右派钮永建的欺骗，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泊之主持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第二次武装暴动问题。会议在榆林路电车工人俱乐部举行，到会者百余人。会议中间，提篮桥巡捕房一个绰号叫“小滑头”的爪牙，恰巧到电车工人俱乐部来，他听到楼上有动

静，就要上楼看看，被传达制止，他就到巡捕房报告了。不一会，巡捕包围了会场，将坐在靠近桌边的李泊之等五人抓走，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其余的人抓到提篮桥巡捕房。抓人之前，沪东部委书记张叔平在几个女同志帮助下，跳窗逃出了俱乐部。他立即通知各厂工人，要他们要求各厂资本家出面保释被捕的人，否则，工人就要罢工。一时间，各厂资本家纷纷打电话要巡捕房放人，弄得巡捕房的电话应接不暇。杨树浦电灯公司的英国人亲至巡捕房保释王克全（时任市政总工会委员长），老怡和纱厂的英国人由四十个工人代表陪同，也到巡捕房保我，我紧接王克全第二个被释放了。到当天晚上九点钟，除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的五个同志外，其余的百余人已全部释放，陈云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在党组织的活动下，李泊之等五人由提篮桥巡捕房的英国人要回租界审理，也就全部脱险了。

没有多久，上海总工会决定工人罢工，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当时，沪东罢工工人两万多人，集合在辐棚路底，准备向闸北进攻。突然“小滑头”鬼头鬼脑地从老怡和纱厂工会门口路过，被我们发现了。我让人叫住了他，对他说，今天是欢迎北伐军，你应该同我们一道去，不许半道上跑掉。他连连应诺：不会的，不会的。于是我领着他和十几个人一同到了辐棚路底，在场的群众已经得知抓到“小滑头”的消息，大家高呼：“打倒走狗！”陈定现同志历数了“小滑头”的罪状，当场宣布将他枪毙。当时我们只有一支四寸长的小手枪，开了好几枪才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坏家伙打死。接着，我们就向闸北进攻。冲到郑家木桥警察局时，警察都跑光了，可枪还挂在墙上，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拿枪来武装自己，只是毁掉了反动公文，狠狠砸了他们的办公室。

第二次暴动，由于起义的时机不成熟，归于失败。记得事后瞿秋白同志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批评了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信的大意是，群众积极性很高，罢工、暴动、枪毙工贼，而中央却不积极领导等等。

五

第二次暴动失败以后，周恩来同志亲临沪东部委，找张叔平同志和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新怡和纱厂等厂的党支部书记，了解党团员和群众的情况。我也参加了这次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问党员中谁在旧军队中当过兵，我们谁也回答不出来。周恩来同志和气地说，这不要紧嘛，过去我们只知道罢工、示威，没有很好注意武装自己，这就无法战胜武装的敌人。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要在工人中找出过去当过兵、会使用武器的人，要他们帮助训练出一支武装纠察队的骨干。

周恩来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不久，上级派徐航安（“四·一二”后脱党）为沪东区纠察队的总指挥，我们也在老怡和纱厂细纱间找到一个当过兵的群众孙长胜。接着，在华德路寿品里租了一幢房子，开始了纠察队的训练。

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时，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全上海八十万工人全体总罢工。徐航安、孙长胜带领的武装纠察队和罢工群众，首先攻打虹镇警察局。警察见我们人多，有的丢枪就跑，有的跪下求饶，一些群众揪起他们说，你们不用害怕，起来教我们装子弹、瞄准、卸弹壳，教会后就放你们走。警察们乖乖地听他们的话。还有，沿途一些警察，见了我们立一个正，敬一

个礼，就拱手把枪交给了我们。革命形势真是好得很！我们这支队伍出发时，只有十支盒子枪、一箱手榴弹，这样一来，武器增多了，而且有了不少长枪。这支武装队伍，径直向天通庵路进攻。

当一些徒手的群众冲到北火车站时，站内已空无一人。群众情绪高涨，迫切盼望北伐军赶来，有人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希望听到运载北伐军的火车声音。但是，没想到驶来了孙传芳的军车，车上机枪猛扫，群众多人饮弹倒下。由于我们都是徒手，一面赶紧后撤，一面向总指挥部紧急报告。幸好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前进，等他们进入车站时，我们的武装队伍闻讯赶来了，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总工会交际部长赵子敬同志，赶到龙华北伐军司令部，说明战斗的紧急情况，要求北伐军迅速前进，但是蒋介石、白崇禧为了达到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目的，就是按兵不动。最后，待车站敌人即将被歼的时候，北伐军才冲了上来，夺取了胜利果实，国民党军队的第一辆称作中山号的装甲车，就是从我们手中弄去的。

起义胜利后，全市举行了一次“市民大会”，选出代表三十多人，并复选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及钮永建、虞洽卿、王晓籁、白崇禧等十九人为委员，组织临时市政府，即所谓“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王晓籁、顾顺章为主要负责人。

这时，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公开成立了十大产业工会，除了铁路、海员等，新成立了手工业总工会，我任纺织业总工会委员长。上海工人群众欢天喜地，每天都有许多人到总工会送旗送匾，以及各种物品，表示庆贺和慰问。同时，总工会整编了纠察队，成立了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到四月初，纠察

队发了蓝布军装（学生装）、八角军帽，军帽帽徽是青天白日旗，中间有一个红五角星加镰刀斧头，并举行了授旗典礼。

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上海总工会派了四十个人的慰问团，由我带队，押着四个火车皮的慰劳品，前往龙华司令部，慰问北伐军。到了龙华车站，等了一两个小时，白崇禧拒而不见，只来了一个象管理员的家伙，他趾高气扬地说，你们回去，把东西留下。我问他，车皮怎么办？他说，也留下。我们说，车皮留下，我们怎么回去呢？他理也不理。那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往回赶有二三十里的路程，弄得全身上下都是泥水，大家边走边骂，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等人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果然，蒋介石进驻上海以后，就处心积虑地企图消灭工人的武装力量。他一方面秘密勾结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青洪帮，一方面假惺惺地给上海总工会送锦旗，用“共同奋斗”的口号来麻痹我们。他把刘峙的部队调进闸北，把严重、薛岳的部队调出上海。由于刘峙的反动面目人所皆知，我们十分警惕，蒋介石又将刘峙调走，换上了北洋军阀过来的周凤岐的部队。与此同时，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等人跑到南京去了。

在这样形势下，我党中央领导人产生了麻痹思想。四月十日，传达了中央指示，说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等人都到南京去了，形势缓和了；纠察队的同志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家，现在可以陆续请假回去看看。

在形势“缓和”的空气中，一场血雨腥风的屠杀开始了。四月十一日深夜，商务印书馆的纠察队总部被流氓包围，杜月笙、张啸林等青洪帮流氓头子暗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十二日清晨，我听到许多地方响起了枪声，感到形势有变化，急忙赶

到江浙区委宣传部长尹宽（后来成为托派）那儿。就在此时，尹宽还寄希望于蒋介石，他正在写什么“请求蒋总司令发还我们枪支”的标语。当我知道纠察队的枪支已部分被收缴的消息后，当即请示是否以纺织工人罢工来支援纠察队，尹宽竟含含糊糊，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进了门，我又赶忙向周恩来同志请示，他坚定果断地回答：“罢！”

当各纱厂罢工工人来到闸北时，已经十二点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处的罢工队伍已到了。在此之前，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被反动军队全部缴光。愤怒的罢工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恒丰纱厂女工王阿宝（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二九年病逝）第一个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大家已经看透了蒋介石假革命、真反动的狰狞面目！

第二天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青云路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泊之同志主持，他宣布了汪寿华同志不幸遇害的消息，表示深切的哀悼，全场群情激愤。会后，二十多万人的游行队伍，向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去请愿，当先头队伍刚到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宝山路口）附近，即遭到早已设伏的机枪的扫射，沿途秘密布置的士兵，也开暗枪射击。顿时，宝山路上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反革命大屠杀！当时，天下着大雨，我和张勤英同志（纺织总工会组织部长）躲到江浙区委新建立的一个秘密机关，恰巧，遇到周恩来同志和赵世炎同志，他俩正在谈话。我记得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还埋藏着一些枪支，需要时还可以拿出来用。他还严肃地说，现在政治形势变了，我们的组织形式也需要变。赵世炎同志回答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这时雨小了，我们就离开了那里。

记得过了四、五天，赵世炎同志就亲自着手整顿组织，产业工会除留下铁路、海员总工会外，其余均撤销，工作归部委直接领导。不久，又将沪东部委、引翔港部委合并成沪东区委、小沙渡、曹家渡两部委合并成沪西区委，法租界、南市两部委合并成法南区委，沪中、浦东、闸北三部委改为沪中、浦东和闸北区委。每个区委设上海总工会特派员，干部也有所调动。这样的组织，比较适合当时的环境。

另外，“四·一二”事件后，许多工人涌到上海总工会，占据了总工会，国民党反动派也派了一些人进驻总工会，取名叫什么“工会改组委员会”。十四日早晨，国民党的那些“接收”人员，为了笼络人心，给每人分发面包和一块现洋，群众虽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但他们不仅不要，还拿起面包、现洋，狠狠回击那些发放人员。当天上午九点左右，赵世炎同志要我们通知全体群众在十二点以前撤出，大多数群众流着眼泪，痛苦地告别了总工会。从此，我们又转入了地下斗争。

六

乌云笼罩着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消极逃跑了，有些人则背叛了革命，成了无耻的叛徒。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党派王若飞同志来上海，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四达里一〇四号传达中央关于成立江苏省委的指示。正在传达时，董星吾来报告说，有两个人被二十六军逮捕了，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在这里开会了。若飞同志讲，我快点传达，传达完就散会。不到十二点会就散了，没有出事。我回到法租

界，刚刚吃完饭，突然交通耿其昌来报告，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被捕了。据耿讲，陈等三人吃完饭，说到一〇四号去看看有没有出问题，结果进去刚坐一会，就被包围逮捕了。耿其昌是越屋脱险的。

陈延年是新成立的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是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是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被捕后，韩步先立即叛变了，他供出了赵世炎同志，同时也供出了上海总工会的秘密地址。赵世炎同志被捕了；总工会正在四川路开会的地方也遭到了破坏，致使许多同志被捕。上海总工会那次被捕的有张佐臣（汪寿华同志牺牲后，继任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杨梅生、王克全、董星吾、孙良惠、张勤英等同志。后来，赵世炎、陈延年、郭伯和、张佐臣、杨梅生、张勤英等同志英勇牺牲，其它人判了徒刑。韩步先的叛变，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党决定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实行武力制裁。如沪东巡捕房包探头目、反动组织“沪东共进会”的分会长陈海标，在他开设的三江茶楼上被打死；法商电车公司的高级职员某某，吃、住都躲在四楼办公室，也在白天被我红色恐怖队潜入击毙。其他一些较小的反动分子，则用斧头将其砍伤，或用西瓜皮装上大粪套在其头上，以示警告。

七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被调到沪东任上海总工会特派员。

十月，杨树浦路恒丰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本家推翻一九二六年

罢工时所承认的条件（不得随便开除工人、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工资照发等），举行了罢工。工人提出严格执行一九二六年规定的条件，增加工资十分之一，恢复被开除的工人工作，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七个条件。可是，资本家态度很顽固，不答应工人所提的条件。经了解，原来是提篮桥巡捕房探目刘文禧的两个徒弟给资本家打了保票，在后头撑腰。当月中旬，我们得知刘文禧的这两个徒弟在平凉路豁棚路口茶馆里吃茶，立即派红色恐怖队李剑如等同志将他们处死了。这件事震动很大，资本家马上派人表示承认全部条件。然而，这时省委派来的徐炳根坚决不同意与资本家达成协议，说什么要通过恒丰纱厂的罢工，发展到沪东的总同盟罢工，再发展到上海总同盟罢工，举行第四次武装起义。当时我认为沪东的情况不可能发展到总罢工，便具体地分析了各厂的情况，除了申新五厂、厚生纱厂、永安纱厂有把握罢工以外，其余各厂均无把握。因此，主张暂时可以同恒丰纱厂资本家达成复工协议。可是徐炳根仍不同意，沪东区委书记刘少犹同志也不同意。这样，恒丰纱厂的罢工只好坚持下去，永安纱厂、厚生纱厂、申新五厂罢了工。

由于罢工的目的是要发展到第四次武装起义，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所以，罢工的口号和要求都是政治性的，经济要求摆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记得纬通纱厂罢不了工，乃派厚生、永安纱厂的工人冲到厂内，开枪示威，才使纬通厂也勉强罢了工。这样一来，罢工的形势即趋紧张，东方纱厂、老怡和、新怡和等英国纱厂由巡捕房戒严，日本海军陆战队也把日本纱厂守护起来，结果，日本纱厂、英国纱厂都罢不了工。徐炳根、刘少犹每天除了空喊总同盟罢工外，什么具体措施也拿不出来。在这种不利于工

人的情况下，恒丰纱厂资本家借机无条件地宣布开厂，工人上班者颇为踊跃，罢工失败了。徐炳根见到这种情景，竟不顾一切，弄来了一个炸弹，派人向正在上工的恒丰纱厂工人掷去，幸好炸弹没有爆炸，否则不知要死伤多少阶级弟兄。

徐炳根杀害工人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那时强调提拔工人干部，如向忠发、王克全、徐炳根、徐锡根等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后来，向忠发当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徐炳根当了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锡根据说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些人先后都叛变了党，成了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个教训是我们党应该永远记取的。

* * *

作者后记：本文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要求所写，有些事根据史料记载，如沪西工友俱乐部和一九二五年二月罢工一段；有些事虽是我直接参与，但因年头已久，记忆可能不完整或者遗漏，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指正。

在同蒲线上……

王新亭

(全国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一九四七年七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召开了整编会议，决定以太岳军区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和地方部队组成的二十四旅合编为第八纵队。我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仲英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张祖谅同志为参谋长，桂绍彬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八月一日，召开了纵队成立大会。

从此，八纵队转战于同蒲铁路线上，参加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经受了大规模的攻坚战、运动战的锻炼与考验。这支部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中，愈战愈强，由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发展到二万二千五百余人，歼灭了大量敌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三 打 运 城

运城战役，是首次经历的比较艰苦的攻坚战。经过三次攻打，才把它拿了下来。

第一次打运城，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由我率领太岳军区部

队，协同陈赓同志领导的四纵队进行的。当时，晋南各县除运城、安邑、夏县三城外，均告解放，晋南残敌纷纷猬集运城。这里有敌正规部队一万余人，土杂武装数千人，并有伪政权三个专署、十六个县政府。守敌以永久性工事与半永久性工事结合，明堡与暗堡结合，还设有附防御工事，火力较强。为了引诱运城守敌出援，以便歼其一部再相机攻城，我们首先向羊驮寺飞机场发起攻击，并攻占北关、西关，歼敌第二〇六师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后因陈赓同志的四纵队奉命南渡黄河、挺进中原，我军遂主动暂时停止对运城的围攻。

九月，为策应外线兵团挺进中原，完成战略展开，我奉命指挥八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一部，第二次围攻运城。

这时，我们的重武器都给四纵队带走了，只有两门旧炮，其中一门还是用牛车拉的，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炮屁股，才能打出一发炮弹。因而，攻坚作战颇感困难。但经过努力，仍然攻下了运城外围七个碉堡，接近到距城壕一百公尺左右。十一月中旬，王震同志率领西北第二纵队，从山东返西北，路过晋南，晋冀鲁豫军区指示他们协同八纵队打运城，加强了攻击力量。为统一指挥，军区指示组织运城前线指挥部，指定我为前指司令员，王震同志为政委。

正当我们扫清登城障碍，即将发起总攻之际，突然接到情报说，胡宗南部将原拟南调陇海路增援的钟松第三十六师四个旅撤回，北渡黄河，增援运城。因此，我们主动撤围，集中兵力迎击援敌。部队进到运城西南的平陆地区，歼敌三千七百余名。由于这一地区，深沟横列，对部队运动作战不利，以致未能全歼援敌，使其得以窜进运城与守敌会合，破坏了我军原来的攻城阵

地。我军第二次攻打运城仍未成功，但因牵扯了敌人，对外线兵团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二打运城中，晋南人民对我军此次作战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不仅出民工，抬担架，运送粮弹，而且借给部队门板达十七万块之多，供修工事之用。这些门板，都在战斗中被敌人烧毁或遗失，以致运城周围几十里地区的群众，夜不能闭户。部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门板包袱”，大有不打下运城对不起群众之感。而且我们的士气很旺盛，积极请战。因此，我们向军区提出了再打运城的请求，军区首长也同意和鼓励我们再打，并叫我和王震同志前往治陶开会研究。

于是，我们积极进行第三次攻城的准备。我和王震同志，反复研究了战役指导问题，并召集前指党委会，与各部队军政干部仔仔细讨论敌情、地形和打法。我们分析运城的敌情，尚有胡宗南部两个团一个营，阎锡山部三个团，共七千二百余人，数量较前有所增加；有其他杂牌部队，各种火炮近百门，轻重机枪三百四十余挺，火力配系严密，工事较前加强，不仅全部修复以前被我军摧毁的工事，又在城东增修不少碉堡。根据敌情、地形，我们决定以西北两面为主攻方向，东南两面为助攻方向，实行四面围攻。另外，考虑到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卢氏、洛阳一带尚有四个旅和一个骑兵团，在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一个师和一个旅，可能向运城增援，因此，我们以太岳军区三个团，位于茅津、太阳、沙窝、风陵、吴王渡，担任阻援任务。

第三次打运城于十二月十六日晚开始。首先攻击外围据点。至二十三日，扫清了外围，最前沿阵地推进到离城垣外壕只有三十公尺处。原定二十五日攻城，但二十三日接到情报说，胡宗南

的八个旅，开始渡黄河，向运城增援。我和王震同志商量，认为必须在援敌来到之前将守敌歼灭，否则要受重大挫折。因此命令二纵、八纵于二十四日提前分别从城西、城北发起总攻。两个方向的突击队，都采用云梯和跳板登城的办法。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火力较强，而我们炮火很弱，两次攻击均未成功。八纵二十三旅有二十八位同志一度登上城头，但没有能够扩大突破口，退了下来。我和王震同志考虑，用云梯和跳板攻城不行，决定向城墙底下进行坑道作业，但时间紧迫，坑道作业距离不能太长，只能跳进敌人火力严密封锁的外壕强行坑道作业。因为二十三旅在打曲沃时用过坑道爆破，我们便决定主要让二十三旅担负这一任务。

二十六日上午，我和王震同志赶到二十三旅指挥所，它设在距前沿一千公尺处的一所大砖瓦窑里。我们召集二十三旅团以上干部举行了紧急作战会议，进行了具体布置。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同志表示，要尽全力完成任务。会议在紧张、坚定的气氛中结束，王震同志到二纵阵地上去了，我仍留在二十三旅。黄定基同志与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副政委蔡剑桥等，研究出一个方案：七连的交通壕已经接近到距城北外壕二十来公尺，有强行坑道作业的可能，可以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里去挖坑道，装填炸药爆破，开辟冲击道路。他们把设想告诉了七连，七连排长刘明生和战士车元路等九位同志，主动要求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夜里，风雪漫天，寒气袭人。经过短促准备，九位勇士背着防御敌人子弹的门板和湿被子，带上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络的绳子，分三组行动。第一组刘明生、乔永亮、郭海顺，在火力掩护下跃进，通过铁丝网时，刘明生负伤，乔永亮牺牲，郭海顺滚

进外壕，联络绳被炸断，上下失去联系。第二组崔有富、郭宪章、常豫功下到外壕，也听不到消息。第三组车元路、申士功、张有才出发时，提出建议：不用火力掩护，以免暴露目标；也不背门板和湿被子，轻装跃进。张国斌、蔡剑桥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他们果然顺利地摸进了外壕，同壕内同志会合。

勇士们在壕内挖掘坑道。当挖到三公尺时，因土湿地虚，受到地雷爆炸的震动，坑道全部倒塌，郭宪章被压住。勇士们一面抢救被压战友，一面继续挖掘。他们大部分负了伤，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刺骨的冰块泥浆之中，艰难地进行土工作业。没有运土工具，就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将泥土捧出，有的战士手指甲也脱落了。为了沟通上下联络，负伤五处的车元路，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忍受着疼痛，在外壕和指挥所之间，一夜往返五次。

旭日东升，晨雾渐散。我在六十九团指挥所刚开完会，部署好了攻城行动，便听到令人兴奋的消息：英雄们经过彻夜努力，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五点五公尺长的坑道和可容三千公斤炸药的药室，并且在通往我阵地的开阔地上，挖好了几步一个的避弹坑。

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根据情报，敌人的八个旅援兵，再有一天时间就可能到达这里。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天晚上：攻下城来，敌人援兵不打自退，攻不下来，我们就腹背受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今晚一定要攻下来！”

张国斌回答说：“一定打好，保证完成任务。”六十七团团长康烈功也说：“我们一定和六十九团同心协力，并肩登城！”

二十七日黄昏，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完成了三千公斤炸药的传递和装填。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二十多公尺宽的大缺口。

突击队迅即突入城内，后续部队跟着拥进城去。这时，二纵也从城西攻进了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当夜将守敌一万三千余人全歼，解放了运城，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敌人援兵听到运城已失，便没有前进。

运城攻坚战，就这样经过连续艰苦的作战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对于运城战役的意义，新华社当时发表的评论指出：“此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同时也证明了我大军打到外线后，我内线兵力还很强大，不但能拉住它，而且能反攻并消灭它。”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纵队在翼城召开运城战役总结大会。这时，徐向前副司令员率领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和十三纵队，来到翼城，指挥八纵队、十三纵队及吕梁、太岳军区部队各一部，准备发动临汾战役。他指示各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八纵队总结大会。我在会上作了运城战役总结报告。徐副司令员最后讲话，进行临汾战役的动员。他阐明了发动临汾战役的意义，号召各参战部队，将运城攻坚作战的经验，运用到临汾战场，同心协力，英勇战斗，夺取临汾战役的胜利。

强攻“卧牛城”

临汾战役原定三月十日开始。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并求得在城外歼敌主力一部，便于尔后攻城，乃提前于三月七日发动。至五月十七日，战役结束，历时七十二天。

临汾是一座古城，相传是尧帝建都的地方，俗称“卧牛城”。此城内高外低，东高西低，西靠汾河，东有东关为屏障。城墙内

外砌以石头，里面装填泥土，高达十公尺多，厚达二十余公尺，城墙上能走大车和汽车。城墙外围，环绕着一条十公尺多宽的深壕。

临汾是敌军孤悬在晋南的坚固设防据点。守敌有二万五千人；包括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胡宗南部第三十旅、八个保安团和补训团、四个伪专署、十四个伪县政府，由阎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指挥。临汾具有独立防御体系，工事比运城还要坚固复杂，外城与内城、外壕与内壕、永久性工事与半永久性工事结合，防御火力很强，射程短，威力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攻坚，确非轻而易举的事。

三月七日至四月十日，为战役第一阶段。按照前指部署，十三纵攻击东关，八纵在城南攻击。

在城南，八纵二十四旅七十二团三月七日突然进抵飞机场，敌人有十架运输机，正在装运三十旅向西安增援。我即令七十二团以迫击炮袭击，击中两架飞机，使敌空运计划遭到破坏。八日，二十三、二十二旅分别攻占柴村、张吴、尧庙宫、乔家庄等外围据点，并打垮敌人多次反冲击而巩固了阵地。十一日，部队推进到距城墙三百公尺处。此时我们侦查，城北地形较高，对登城有利，便考虑是否将兵力转移到城北，夺取兴隆殿，依托该阵地攻城。为此，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不顾安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亲自走上制高点，观察兴隆殿地形、敌情，不幸头部中了敌人冷枪，光荣牺牲。王墉同志原来是一位进步青年学生，在敌人监狱中斗争坚决而入了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他朝气蓬勃，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当我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心情悲痛，深为惋惜。随即命邓仕俊

同志接任旅长。

由于城东部队两次攻击东关未成，四月一日，前指调整部署，集中八纵、十三纵主力，从东北、东南两面，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攻取东关。

四月五日，二十三旅开始与敌争夺东关外壕，同时进行坑道作业。至九日晚，完全控制外壕，挖好四条坑道和药室。接着，一夜之间，组织了一百二十人，运送炸药一万六千二百斤，装填好三条坑道的药室。十日十八时，在炮火支援下，三条坑道同时爆破，炸开二十余公尺的两个缺口，突击队乘着烟雾，只一分钟就登上城头，迅速向纵深发展。经过巷战，十一日晨，攻取东关战斗结束，歼灭守敌六十六师大部。徐副司令员打来电话，祝贺坑道爆破成功和攻入东关的胜利。

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十七日，为战役第二阶段。前指指示，先扫清城垣外围据点，将前沿阵地推到外壕前面，进行坑道作业，尔后登城歼敌。

尽管我们将前沿阵地尽量推前，但敌人火力仍能控制外壕，坑道作业需暗中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长度达百余公尺，所以作业量很大。

敌人非常害怕坐“土飞机”，因此，我们挖坑道和敌人反坑道的斗争激烈。敌人也从城内往外挖坑道，来寻找我们的坑道，还用缸竖在地上，偷听我们挖土的声音。一发现我们的坑道，就加以破坏。到五月十六日，整个战线上的坑道，绝大部分都被敌人破坏，只剩下二十三旅在东北角挖的两条各长一百一十公尺的坑道了。而在这两条坑道里，也能听到敌人挖土的声音，受到敌人破坏的威胁。

情况十分紧急，前指决定将总攻时间由十八日提前到十七日十九时。二十三旅迅速完成炸药的传递和装填，一条坑道装黑色炸药一万二千公斤，一条装黄色炸药六千公斤。二十三、二十四旅突击团，随即进入阵地，做好攻击准备。在这紧张的时刻，我和张祖谅、桂绍彬同志，带几个参谋人员，提前进入前沿指挥所。指挥所就是在城外开阔地上挖了一个四、五公尺的深坑，架上枕木覆盖，交通沟就是来回运动的便道，观察所是从一条覆盖的交通沟延伸出来的。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子弹呜呜叫，飞机穿梭飞，我军上下，则一片寂静，等待着总攻信号。我耽心仅剩的两条坑道遭到敌人破坏，心情十分不安。

夜幕降临，总攻时间到了，信号弹升起，一声巨响，震动大地，浓烟冲天。坑道大爆破成功了！城墙上出现两个各宽三十多公尺的大缺口。部队的战术动作协调得很好，坑道爆破、火力转移、步兵冲击，三者一个信号，一齐动作。突击队迅速登上城垣，向城下两侧发展。最先冲到“镇守使衙门”（即梁培璜指挥所）门口的，就是在运城立了大功的车元路。这位独胆英雄，喝令敌人缴枪投降，打死了逃跑的军官。团长张国斌带部队跟了上来，占领了敌人的指挥所。最后在一块庄稼地里，活捉了梁培璜。二十四时，战斗全部结束。

战役后，党中央曾致电祝贺说：“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希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临汾战役的经验。经徐副司令员提议，中央军委批准，将在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二十三旅命名为“临汾旅”。在八纵队庆功大会上，徐副司令员亲自把一面绣着“光荣的临汾旅”字样的奖旗，授给了二十三旅。

歼灭阎军野战兵团

临汾战役刚结束，六月初，八纵队又参加了晋中战役。这是徐向前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指挥实施的一次漂亮的运动战战役。这时，奉军委和华北军区命令，由八纵队、十三纵队、十五纵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同志兼司令员和政委，周士第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陈漫远同志任参谋长，胡耀邦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晋中战役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晋中敌人向太原集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并保卫晋中地区麦收，解放晋中人民。我们部队经过运城、临汾两次战役，未获休整，随即参加晋中战役，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等待部队休整好了再打，势必丧失战机，贻误大局。因此，毅然决然地发起晋中战役，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这个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临汾战役后，晋中已成一片柳叶形的孤岛，处于我广大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晋中敌人有十三万人，包括第六、七、八三个兵团（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总队（内有以日寇为骨干编成的第十总队）、二十二个保安团、二十一个保警大队。敌人大部配置在同蒲路忻县至灵石的各要点上，另组织“闪电集团”，企图阻止我军北进。

我军投入晋中战役的兵力，是六万余人，包括八纵队、十三纵队、十五纵队，华北炮一旅一部，太岳、吕梁、北狱军区部队各一部。从整体的兵力对比讲，我军不占优势，但我军处于战略进攻形势，部队士气高涨，而敌人却面临战略溃败的颓势，我军在政治上压倒了敌人，能够在全局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我军

又以多胜少，尽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各个分割包围，勇敢大胆，机动灵活，终于以伤亡一万一千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七万五千余人。这是相当可观的，说明徐向前同志指挥有力。

按照兵团部署，我军先以少量部队向晋中腹地深入活动，打击阎军抢粮，主力由南向北，争取在祁县以南地区，歼敌四至六个师，再攻取一些县城，尔后乘势扩张战果。

战役第一阶段，从六月十九日开始。敌以第三十四、四十三、六十一军各一部，及敌“亲训师”（七十二师），“亲训炮兵团”组成的“闪击集团”，分路由汾阳、孝义、平遥、介休出动，合击高阳镇地区我军地方部队。我们八纵队，根据徐司令员命令，沿同蒲路东侧，向平遥、介休出击，拔除了一些山口据点，进入平遥、介休以东平原地区，诱敌“闪击集团”回窜，以便在其回窜中，协同十三纵队予以歼灭。

我召集各旅干部进行部署，拟于平遥以南、曲亭镇以北的曹村地区伏击可能沿铁路行动的敌四十三军一部。部署好了以后，由张祖谅、桂绍彬同志随第一梯队二十三旅、二十四旅行进，我随第二梯队二十二旅行进。但当二十三、二十四旅先头部队进到曹村时，敌四十三军沿汾河西岸向北走了，而与“亲训师”、“亲训炮兵团”遭遇。我接到报告，即令二十四旅拦腰切断敌人，二十三旅迂回包围，二十二旅堵击该敌逃窜。于是，二十四旅先头部队七十一团立即抢占要点，组织所有轻重火器，突然猛烈攻击敌行军队形。后续部队随即投入战斗，一举将敌切成数段。同时，二十三旅及二十二旅一部，由正面及翼侧出击。敌措手不及，来不及展开火力，炮未放列，即被压缩到汾河东岸河滩。被围之敌，前有重兵，后靠汾河，东涌西突，一片混乱。我们部队

勇猛冲杀，激战三小时，速战速决，全歼该敌。“亲训炮兵团”崭新的二十四门山炮，全部被我们缴获。这些山炮，我们以一部分调拨给兄弟部队，其余装备了各旅。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第二阶段，敌军剩下唯一的野战集团——赵承绶第七兵团，集中主力三十四、四十三军及第十总队，企图在祁县以南与我军决战。根据徐司令员命令，八纵二十二旅协同十三纵等，迅速插入敌之侧背，控制了榆次、太谷间广大地区，切断敌之退路，将敌包围于大常镇一带。

与此同时，我率领二十三、二十四旅，攻歼祁县守敌三十七师。这次攻城，刚缴获的山炮发挥了威力，五十分钟将城墙轰开二十多公尺宽的缺口，部队随即突入城内，发展顺利，数小时全歼该敌。尔后，我们由祁县兼程北进大常镇地区，投入围歼赵承绶集团主力的战斗。该敌被围后，曾在七架飞机掩护下，企图分两路突围，均被击退。被围之敌，成了瓮中之鳖。接着，徐司令员调整了部署，以八纵在西南，十三纵在西北，晋中部队在东北，太岳部队在东南，从四面八方向被围之敌压缩。

七月十日发起总攻。八纵二十三、二十四旅包围南庄，对敌三十四军四十四师师部和两个团及十总队，展开了苦战。敌人利用坚固房屋及村外野战工事顽抗，并有飞机轰炸扫射助战。我们集中多数曲射火炮，对敌进行轮番连续密集射击，打击敌之气焰。以山炮、野炮摧毁敌村外发射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击，分割、包围敌人。以迫击炮进行间隔射击，轻机枪手占领房顶，掩护步兵小组逐屋爆破前进。南庄房屋大部被毁，敌仍拼死抵抗。六十九团八连连长田中其，率领该连猛插十总队指挥所，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该连一位无名英雄，在敌指挥所院内，冲

入日寇群中，拉响了集束手榴弹，炸得敌人尸体横飞，自己光荣牺牲。敌指挥系统终被打乱。七十团二连，也将敌四十四师师部驻地院墙炸毁，突入院内，消灭敌人。激战至十二日晚，敌四十四师两个团被全歼，十总队伤亡过半，余敌窜至东范村。

南庄战斗后，我见太谷之敌九总队企图绕道东贾村以北窜往榆次，即令二十三旅追击，于十三日歼其二千余人。另奉兵团命令，二十四旅协同吕梁部队，组成“汾西集团”，截击平遥、介休、交城、水文、汾阳、孝义北逃之敌第十九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各一部，俘敌八千余人。二十二旅配合十三纵攻歼西范之敌。十三纵攻破了赵部最后据点小常镇，敌首赵承绶、沈瑞被活捉。此后，为扩张战果，八纵队七月二十日进占太原东南之小店镇，二十四旅并一度进占汾河西岸距太原十里之大小王村。晋中战役至此结束。

此次战役的胜利，给了阎军以决定性打击，使其丧失了进行野战的能力，并使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获得解放。党中央曾致电高度赞扬说：“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这份电报底稿尚存军事博物馆，“极大”原为“很大”，毛主席亲笔把“很”字改成了“极”字。

群 困 就 缚

晋中战役结束之时，徐向前司令员即乘胜挥师北进，兵临太原城下。部队进行战前动员，侦察敌情、地形，准备进攻太原。

阎锡山的野战集团被歼，只剩下五个师和一个总队的兵力了。他就在太原城内和外围，大肆抓捕壮丁，恢复和组建了八个师和两个总队，另从西安空运来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师，再加上

保安部队，太原守敌总兵力拼凑了十万余人，统由阎锡山和梁化之、王靖国、孙楚以及日寇顾问岩田指挥。太原是阎锡山老巢，阎和日寇前后共经营了数十年，本来已有坚固设防。晋中战役开始后，阎又突击抢修了大批钢筋水泥工事，沟壑纵横，碉堡林立，构成一座所谓“百里防线”的要塞城市。仅各式碉堡就有五千余座，星罗棋布，互相关联，还部署各种口径的火炮六百余门。阎锡山自己吹嘘其防御“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位美国记者描写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这些说法，未免神乎其神，是给阎军官兵打气壮胆的，但是其防御的坚固性却不可忽视。

已在太原前线的我军，有华北第一兵团三个纵队、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军委命令组成以徐向前同志为书记的前委统一指挥，并实行围困、瓦解和军事攻击三大方针。八月四日，兵团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晋中战役，传达前委关于太原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徐司令员在会上讲话，号召各参战部队加紧努力，求得在思想、组织、战术、技术、物资等各方面完成战役准备。兵团还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参谋会议、后勤会议，具体部署和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八纵队，上上下下，同心协力，为准备战役而忙碌着，充满了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

十月初，敌人有七个师沿汾河与同蒲路之间向南扩张，抢掠群众粮食，并企图阻止我军主力进逼太原。前委抓住敌人脱离碉堡地带的有利战机，命令我军于十月五日发起太原外围初期作战。八纵队负责攻歼窜至小店镇之敌四十四师。五日拂晓发起战

斗，二十四旅和二十二旅迅速完成对小店镇的包围，运用小组连续爆破的手段，逐院逐屋，夺路而进，消灭敌人。后将残敌压缩到其师部大院，炸开缺口，突入院内。战至六日九时，全歼该敌，俘敌师长李子法。我军在整个太原外围的初战中，获得了歼敌一万余人的胜利。

十月下旬，开始进行东山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要点争夺战。这是整个战役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四个要点居高临下，地形险要，是太原城东的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阎军除依托坚固工事，以严密火力与我军进行地面战斗外，还不断出动飞机，昼夜进行狂轰滥炸。

八纵队受领的任务是夺取小窑头。小窑头有十三个集团阵地，以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号阵地为最高支撑点。这里可以俯制东门城壕和环城铁路，系敌人要害之处，敌人投入机动兵力较多，所以，争夺尤为激烈。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四旅并附二十二旅六十五团，发起攻击，至次日，攻占十处阵地，歼敌四十师、十总队各一部。二十八日，敌集中精锐的整编三十师两个团、四十师一个团，在几个炮兵群的交叉火力支援下，以十四号阵地为中心目标，对小窑头各阵地进行反扑。我军由于各阵地留守兵力单薄，伤亡较大，先后弃守。二十九日，二十四旅七十团、二十二旅六十五团，再次发起攻击，有的阵地得而复失，经反复争夺，至三十日，大部夺回。但十一、十三号两个重要阵地仍在敌手。而且，七十一团五个连被敌围攻，伤亡很大。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下决心，命令攻坚能力最强的“临汾旅”——二十三旅六十八团出动攻击。该团团长程九章，带领三营，经过周密侦察和组织战斗，以炮火摧毁前沿与小组连续爆破相结合，英勇猛

攻，一举突入十三号阵地，消灭守敌两个连，并挫败敌人两次反冲击。程九章同志在战斗中奋勇当先，头部负伤。十一号阵地之敌，慑于被歼，放弃阵地而逃。我们终于牢固地占领了小窑头全部阵地。

我军夺取东山四要点后，十一月初，敌整编第三十师师长黄樵松，两次派遣中校参谋来我八纵队接洽起义。黄樵松的前来，是由于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取得巨大胜利，我军争取蒋军官兵起义投诚政策对他的感召，急欲寻求一条出路。黄樵松的中校参谋第一次来后，我报告了兵团，还未及研究答复，他又来了，说起义已经准备就绪，要交出该部防守的东、北两个城门，内应外合，接应我军入城，要求迅速答复。我立刻请示兵团，兵团指示与黄樵松取得联系。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随即与在邯郸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高树勋一起，赶来八纵队，组织谈判事宜。经纵队党委讨论，胡耀邦主任批准，便派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用宣传部长名义带着一位侦察参谋（用警卫员名义），随三十师来人前去与黄樵松谈判。

晋夫临行时，正是初冬的拂晓，露水很重，颇有寒意。我给他送行。我看他穿的衣服单薄，便脱下自己的绿色毛衣给他穿上。我再次叮嘱他如何与黄樵松联系，如何里应外合，信号是什么，并要他提高警惕。但是，晋夫一进去，就和黄樵松一起，被敌人逮捕。事后得知，是因为黄樵松对起义没有严密组织，被他的部下、二十七旅旅长戴炳南出卖了。在狱中，晋夫同志正气凛然，痛斥敌人，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以后，晋夫和黄樵松被押送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阎将整编三十师改称三十军，将戴炳南一下子提为军长，以示奖赏。戴在太原解放时，

被我军捕获，得到枪决的应有下场。

十一月十六日，军委对太原前委发来电示，鉴于傅作义已是“惊弓之鸟”，太原如攻下过早，有可能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向西或向南撤退，增加我军尔后解决的困难。因此，要求太原前线我军再占若干外围据点，并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

在前委具体部署下，八纵队执行了军委的指示。首先，尽量攻占一些外围据点。二十二旅副旅长温先星带领一个团，袭击了松树坡等五处阵地，消灭守敌，将前锋推进到仓库区。敌八十三旅及九总队反扑十二次，均被击退。温先星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二十四旅七十二团，也攻占了田亩圪塔阵地。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然后，部队转入围困和休整。时值严冬降临，东山人烟稀少，缺水缺柴。各部队便自开窑洞，自烧木炭，化雪代水，想出很多饮食保暖、阵地防寒、武器防冻的办法，渡过寒冬。十二月下旬，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战役初期、中期的经验教训，周士第同志曾作过战术报告。一九四九年一月，八纵队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经验，学习战术理论。二月，军委颁布全军统一番号，华北一兵团改为第十八兵团，八纵队改为六十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分别改为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师，我改任军长兼政委。

寒冬过去，生机勃勃的春天到来。随着平津的解放，根据军委命令，第十九、二十兵团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由平津调来加强太原前线。同时组成太原总前委，徐向前同志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同志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太原前线我军。四月五日，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和总攻的必胜条件；决定了总

攻方案：首先集中大部兵力，割裂敌人外围据点，歼其大部或全部，占领攻城有利阵地，尔后集中全力攻城。这时，徐向前同志积劳成疾而休养，彭德怀同志由中央返西北，途中留太原前线，在会上作了指示，并在以后指导了战役的实施。

总前委命令四月二十四日对太原发起总攻击。六十军受领的任务是，与一野七军组成十八兵团的右集团（我为指挥，彭绍辉同志为政委），夺取仓库区、五号碉、六号碉、英国坟、大小把沟及黑土港后，由大东门以北地段登城，歼灭所属地区之敌。部队加紧进行总攻准备。一天，彭副总司令由我陪同，视察了右集团在仓库区的阵地。彭总看到战士们在进行坑道作业，很重视，连声称贊这种办法。他鼓励战士们在总攻中英勇杀敌，为人民立功。战士们表示，决不辜负首长的希望。彭总满意地笑了起来。另一次，我带着参谋人员，到城东外壕前沿检查部队攻击准备情况，在交通壕一段暴露地段，被城墙上的敌人发现目标，遭到一阵炮击，我们就匍匐跃进，一直到达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志们又惊又喜。

四月二十日，开始了扫清外围的战斗。友邻第十九、二十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首先从南北两线，对外围之敌进行猛烈攻击。下午十八时，我们十八兵团左、右两个集团，各以三个箭头猛攻，顺利突破敌防御前沿，发展迅速。右集团八师，挖通六百公尺长的坑道，装炸药二十万斤，炸破仓库区主阵地，一举歼敌三个连，全部占领仓库区，并乘胜追击，攻占剪子湾。一八〇师以连续爆破，勇猛冲杀，攻占了英国坟、大小把沟、大东关，与警备旅会攻黑土港，并控制了环城铁路线。战至深夜二十三时许，将敌四十师、“神勇师”基本歼灭。这一天的作战，我军各

线部队，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外围各个防区、数十个据点的敌人，或歼灭，或包围，使敌整个外围防御体系陷于支离破碎，土崩瓦解。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我军继续横扫外围据点。我们右集团六十军肃清黑土港以西环城铁路上各火力点，七军攻占西杨家峪。然后迫近城垣，清除了外壕内外的伏地堡，摧毁通城暗道，创造攻城条件。整个外围作战的进展，是十分理想的，敌人守备外围的十二个师全部就歼。阎锡山在慌乱中乘飞机逃走了，王靖国、孙楚等人，拒绝我军最后一次劝降，收拾残兵三万余人，在城内作垂死的挣扎。

二十四日，天刚破晓，我军集中一千三百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墙进行轰击。倾刻间，浓烟突起，直冲云霄，笼罩了太原上空。因烟雾弥漫，不易观察，我们便以工兵爆破相辅助，打开城墙缺口。七时，南、北两面的十九、二十兵团首先登城。接着，我们十八兵团左、右两个集团四个箭头一齐登城。各突击队十分钟以内就攻上城墙，抢占制高点。城墙上的守敌，在我军猛烈的火力下，一部死伤，大部躲藏在掩蔽部内，不敢动弹，被我军逐一搜索肃清。同时，后续部队分头向城内发展，以小组连续爆破开辟道路，与顽抗之敌展开巷战，猛打穷追，势如破竹。各路部队迅速向敌人的指挥中心——阎军的“绥靖公署”合围。一阵冲杀，解决了“绥靖公署”之敌，活捉敌首王靖国、孙楚和日寇顾问岩田。至十时，攻城战斗全部结束。

就这样，阎锡山的十二万残兵败将（包括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被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太原获得了解放。我军自战役开始以来，也付出了伤二万六千余名、亡四千七百余名的代

价。光荣属于为人民而流血牺牲的同志们！

太原战役的胜利，结束了蒋介石、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宣告了华北战局的胜利终结。党中央五月一日致电祝贺说：“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 * *

太原战役结束时，我到十八兵团工作，六十军由张祖谅、袁子钦同志分别接任军长、政委。后来，这支部队出征西北，进军西南，为把革命进行到底作出了新的贡献。

忆张秋人、胡公达烈士

薛暮桥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国民党浙江省特别法庭受审后，移押杭州陆军监狱。

入狱第三天，我被关到甲监五号，和我同住的有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他做过广东黄埔军校的教官，讲革命史。他到杭州担任省委书记不久，有一天在“三潭印月”遇到黄埔军校几个反动学生，围着他要他到黄埔同学会去。张秋人同志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但裤袋里有一张党员名单，在几个人监视下无法销毁。他心生一计，跳入湖中假装逃跑，把裤子踏入湖底泥中。被黄埔学生拉上来时，只穿了一条内裤。张秋人同志被捕后，黄埔军校反动学生一百余人联名证明他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法庭审讯时，张秋人直认不讳。法官问他同参加的有哪些人，张骗他们说有沈玄庐（共产党叛徒，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戴季陶、邵力子。法庭听到都是国民党的要人，未施酷刑，上报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我们都知道张秋人是我党重要领导人，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当除夕处决八位同志时，大家都敲墙壁讯问张秋人是否安全。

张秋人在狱中每天读书五六小时，而且要我们跟他一起读书。当时许多狱友有书，互相传阅，其中有些是外面禁阅的书籍，看守们不知道，也让送进来了。每天晚上，灯光昏暗，张秋人为我们讲革命史，从法国大革命讲到巴黎公社，何人何事连年月日都记得很清。二月七日，他说，晚上我给你们讲“二七”大罢工的历史，我们听了十分兴奋，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我们讲课，第二天他就被枪毙了。

张秋人遇难前天天督促我们学习。有一天读书方毕，他长叹一声，很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我们安慰他说，法院还没有详细讯问你的案情，大概不会判决。他说谁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还审什么，早应该枪毙了。我忍不住问他，你既然知道要死，为什么还天天读书。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活一天要工作一天，在牢房里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这话使我像触电一样十分震动，周身血液奔流，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从此以后我牢记着他的教导，在狱中三年半坚持每天学习五六小时。我年少失学，许多知识是在牢狱中学来的。

一九二八年春节期间，有几天没有开庭，紧张的气氛开始缓和下来。旧历正月十七日，我们正在下棋，突然看守又来开门。叫张秋人开庭。张秋人同志一出走廊，看守即把铁门关上。张知道已经到了一生最后的时刻，两手握着铁门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罢！共产党万岁！”看守忙把他拉出去。狱中有个小法庭，临刑前要“验明正身”。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秋人同志大叫“老子张秋人！”说罢抢前几步，抓起案上一个砚台，向法官头上打去。法官慌忙退避，几个法警忙把秋人拉住，推出去枪决。张秋人同志临刑前还接连高呼：“共产

党万岁！”

我同张秋人同志不但同住一间牢房，而且同盖一条棉被，两人的棉被一垫一盖，比较暖和一点。秋人同志牺牲后，我捧着他的棉被和衣服、书籍、送出牢门。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每想到他临刑前的豪迈气概，就使我在革命的任何艰险时刻，都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张秋人同志在大革命时代，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常委宣中华同志（共产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同被称为“诸暨三杰”。“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我利用在铁路工会的地位，亲自护送宣中华同志从笕桥车站（我是该站站长）登上一列货车去上海。车上工人都是共产党员。不料货车在龙华停留两三小时，宣中华下车看桃花，被一个国民党特务识破，被捕后由杨虎亲自审讯，中华同志破口大骂，当日就被斩首。我在“四·一二”前代表沪杭铁路工会去上海组织铁路工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同志领我到上海总工会去见汪寿华同志，汪即把沪宁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津川同志找来同我见面。“四·一二”前夕上海青洪帮头子杜月笙请汪寿华去吃晚饭，被杜月笙出卖，一去不返。

我住陆军监狱甲监五号时，对门有一位胡公达同志，是浙江省共青团的省委书记。他在“四·一二”前曾用徐玮的原名由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公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当时我未见过徐玮同志，所以在陆军监狱不认识他。法院和许多狱友都不知道胡公达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因为他在杭州工作不久就因很小的案情被捕），他也沉默寡言，尽力隐蔽他的

身份。后来共青团的前任省委书记石天柱被判死刑，他的家属是大地主，找了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来保他。特种刑事庭庭长钱西樵亲自找石天柱谈话，要他立功免刑。石天柱出卖了胡公达同志。钱西樵又找胡公达同志谈话，说石天柱立功免死，劝他也立功，否则将被判处死刑。并说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呢？胡公达同志笑着说，我提出三个问题，你答得好，我就不做共产党员。钱对胡所提的问题一个也答不出来，胡说这没有办法，我只好当共产党了，说着大摇大摆回到牢监。

从此以后，胡公达同志改变了过去的沉默态度，每天当看守不在的时候，就对着牢门递饭的小口高声大讲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因为我们都是“八七会议”前入狱的，不知道召开“八七会议”，胡是第一个向我们传达党的这个重要会议精神的。本来陆军监狱对犯人管得很紧，不准高声谈话。后来政治犯多了（有二三百人），再加上军事犯也受我们影响，经过抗议，看守对谈话也就不敢多加干涉了。当时狱中只有两人会唱《国际歌》，经他们传授，大家都唱起来。看守并不知道我们唱的是什么歌，也不管。

一天，看守“陆判官”（每次杀人都由他来提人，所以大家叫他“判官”）来叫胡公达开庭，胡知道要被枪杀，冲着“陆判官”高叫：“今天枪毙几个人？”“陆判官”吓得面如土色，把钥匙和名单都掉在地上，抖抖索索地说，四个人。胡公达同志坦然地拾起钥匙和名单，把另外三人一起开出，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挺着胸脯一面叫，一面走。这一天，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有一百多人前来观看，我们开始只听到墙外人声热闹，但不知道什么事。胡等高呼口号后，我们立即紧张起来，齐声高唱《国际歌》。

这一次法官不敢“验明正身”了，拉出去就枪决。胡公达等继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一枪，呼一声，打到第三枪时，最后一个人还高呼口号。

张秋人、胡公达两同志的英勇就义，为我们上了两次最好的党课，连许多军事犯也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石天柱这个可耻的叛徒，在这时候也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那时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特种刑事庭庭长钱西樵把石天柱改判十年到十五年的一等有期徒刑。石天柱天天被同志们责骂，无地自容，向党低头认罪，表示愿意站在斗争前线立功赎罪。所以此后狱中斗争，石天柱都跟着参加。一九三〇年红军一度占领长沙，国民党为了报复，大杀了一批共产党员，听说牺牲了十八位同志，石天柱在这一次也被枪毙了。他出卖了同志，最后仍然没有保住自己。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長

全国政协委员

张承宗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迫害原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和党员，制造了种种谎言，进行恶毒的攻击，污蔑一九四二年上海地下党领导和机关撤退到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事实真相怎样，请读张承宗同志的《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编者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领导上海地下党（包括江苏地区）的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成立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前后达三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又成立上海局和地下市委。

华中局城工部的三年，在领导上海地下党坚持敌占区的斗争，在保护干部、培训干部，整顿组织、审查干部，在开辟新的地区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进行决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十分悲痛的是，当时热情关怀、支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经常予以指示的革命老前辈陈毅同志，自始至终领导城工部工作的刘长胜同志，都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世长辞了。城工部负责交通和教育工作的田辛同志，在城工部时间最长，比较多地知

道和保存了这三年的斗争历史资料，也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在回忆这三年的历史时，他们的光辉形象时时浮现在眼前，令人怀念。

（一）撤 遣

一九四一年初，我从职委调到江苏省委情报委员会工作，担任情委书记，史永（沙文汉同志的弟弟，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老姚（家本）两位同志是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同志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和刘长胜同志经常到史永同志家碰头，商议工作。史永同志的爱人汪菊影同志做些机关工作。当时曾在这个系统工作的，记得起来的有张心宜（较早撤退到根据地，现在上海市造船局）、柯执之、赵铮兄弟二人、郑振华（已故）、王大超（已故）、黄征风、吴复培（已故）、袁锟田、张纪元、张子良、朱文蔚、梁万程等同志。在这段时间里，对打入敌伪内部了解敌伪情况，保卫党的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刘长胜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调我到根据地去，要我把所属的党的组织关系交出去，等候组织上派交通员送我去解放区。

我把柯执之同志的关系，交给教育界的周克同志（现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柯原来在情委工作，给我当秘书和交通，整理情报资料，并把下面的情报收来，整理后又经过她和江苏省委的交通联系，传递上去。她当时在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的团体里当秘书，职业掩护条件较好。我有时到她的办公地点去和她联系。我又把一部分搞情报的关系交给史永同志，由史永同志转出去。另外有些关系则直接交给刘长胜同志，由他去转。

当时我在一家银行当职员，我走了以后，家属要留下来，我的弟弟顾斋同志仍留下坚持工作。我借口患了肺病需要离开上海去外地休养，向银行告了病假。

临近离开上海的时候，刘长胜同志才把我调离的原因和我到根据地后的任务告诉我。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所统治，环境险恶。日本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不准有三人以上的任何集会。日本特务和宪兵机关，千方百计要破坏我地下党的组织。他们秘密地开黑名单，把抗战初期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抗日积极分子作为逮捕的对象。中央为了保护白区的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到根据地去工作，区委以上的负责干部都要撤退。江苏省委所属的上海、南京各地党组织，只留下部分负责干部就地坚持。各级组织都采取分散的、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活动。群众工作采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式，隐蔽在群众之中，坚持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条件下，党依靠群众创造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建立了多种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冲破了敌人的各种限制与禁令。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经验广泛运用，使我党能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哪里有群众那里就有党的活动，党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刘长胜同志告诉我：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随后都要去根据地。刘宁一同志已在根据地，要我到了根据地，先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做上海撤退同志的接待和审查工作，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由交通员周晓华（现在上海市国防工办）和戚原同志（现在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护送去解放区。和我

接关系的是周晓华，他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身强力壮，举止很持重。戚原同志没有和我打招呼，是暗交通。我们从北站乘火车到南京，然后渡江到浦口，沿津浦路北上。下午二时许，在嘉山车站下车。嘉山是个小站，但一样的有日本兵和伪军检查行李和查看身份证件。我当时打扮成个商人，穿着短衣长裤，上身是黑色直贡呢，手里拿着个包裹，里面有两套短衫裤、毛线衫裤、一条被单，还有些牙刷牙膏之类，几包香烟，准备必要时“塞给”日伪军的。我用的身份证件是六合县的，是张通过“敌伪军”关系弄来的假身份证件。日伪军看看身份证件，望望我的面孔，放我走了。走出了车站，周晓华同志指点我前去的方向，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离开一段路，装着互不相识的样子。一路很顺利，到了嘉山县边区，当晚在蒋家营宿了一宵。第二天急着赶路，到了洞溪镇，区长胡坦同志（现安徽省副省长），交通站洪流同志接待我们，他们怕我才到根据地，走长途有困难，给我找了一匹栗色的马，到古城又过了一夜。次日，周晓华同志一直送我到义庄。那时晓华同志患疟疾，他没有告诉我。幸亏是匹老马，“阁笃，阁笃”一步一步地走得慢，晓华同志还能紧紧地跟上。

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在离汉涧附近十五里的义庄，靠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同志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点也就设在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里。我到的时候，石榴同志（即石志昂同志，解放初期随周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飞机上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牺牲）已先在。他负责接待事务，我负责干部审查。田辛同志于十月也来根据地，负责交通。

我们在交通站里占一间房子，泥地草屋，里面有两个床，上面铺草，这就是我们的交通联络点。我和石榴同志各睡一床。上海

的同志来了，我们就让新来的同志睡。自己在泥地上铺一点草，睡在地上。但是有些新来的同志一定要我们睡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来的是吴涤菴和陈永箴两位女同志，嘻嘻哈哈的，高兴得不得了，她们硬是要睡在地下。因为我和石榴同志是先到的，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来的同志都要我们教歌。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地区，一部分在路西（津浦路），一部分在路东，当时就学唱《路东人民之歌》，还有新四军军歌。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情绪高昂，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亲如家人。到了根据地，的确象到了娘家一样。石榴同志负责接待工作，热情待人，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在交通联络站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前后接待和审查的干部约百余人，大部分是区以上的干部。经过了解，报告江苏省委领导（开始是刘宁一同志，以后是刘长胜同志），批准后送到江苏省委举办训练班的地方顾家圩子。送去训练班是由交通员带的，我也带过，如杨佩景同志（当时人家叫她“小皮球”，矮而胖）和季梅先同志两人就是我送去的。有一部分同志，因为在上海已经暴露，回上海比较困难，就介绍给淮南区党委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是一般党员，还有少数非党积极分子，就在当地分配工作。从上海来的干部，其中一部分是工人干部，一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区党委和二师都很欢迎，都是根据地迫切需要的。我们在淮南得到区党委刘顺元和李世农同志，专员公署方毅和汪道涵同志很多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输送干部和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可是有位部门负责人对青年知识分子采取嘲笑讥讽的态度，自以为很革命。例如我们有时在晚上也参加地方打游击的活动，一次一位年青女同志夜行军时摔倒在水沟里，他不但不热情帮助，反

而经常以此作为笑料。可是到一九四三年，这位负责人自己却害怕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偷偷地逃跑了。

四二年十月，刘长胜同志由戚原和舒忻两交通员护送来根据地，十一月，刘晓、王尧山（现在上海市委纪委）、赵先、陈永箴同志和张本（叫她丁小姐），还有潘汉年、何革，一同由仪征进来。据说他们是从镇江渡江到仪征边区的，在镇江住了一夜，是利用潘汉年在伪方的情报关系送来边区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是对刘、王等审查的问题之一）。他们在淮南区党委住了一宿，我去看了一下。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去顾家圩子了，潘汉年则去了黄花荡新四军军部。

同年十二月，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区以上干部，基本上都已经运送完毕。我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也到顾家圩子集中；田辛同志仍负责交通工作，设在总联抗的交通联络站就告结束；石志昂同志由江苏省委决定派去顾家圩子学习，后到新四军二师师部工作，一九四三年初，又重新把他派回敌占区。

（二）顾家圩子——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

江苏省委所在的地方，属于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的地区。新四军军部已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从坑城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天长县铜城镇附近，地名叫黄花荡。华中局领导机关也在那里。华中局决定江苏省委驻在新四军军部的西北二十几华里的泥沛湾，附近有个大庄子叫顾家圩子作为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地点。顾家圩子的东北二十多里是铜城镇，是我边区一个贸易中心，离开敌人占领的天长县城约有五十多里。顾家圩子是一个较大地主的庄屋，地主跑掉了，一部分人分散住在附近的一些小庄子里。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一共有五位。刘晓同志是书记，刘长胜同志是副书记，刘宁一同志负责工人工作，王尧山同志是组织部长，张登同志（即沙文汉同志）是宣传部长。他们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在白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只知道他们是上级领导。这是上海地下党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负责干部在一起，济济一堂，有一百几十人，盛况空前。大家对领导很尊重，关系很亲切，称呼很随便，相互称同志，或老刘老王的。大家背后亲切地称刘晓为“老刘”，长胜为“胖刘”，宁一为“瘦刘”。

江苏省委的干部训练班总的由刘晓同志负责，文化界的关建夫同志担任秘书，老关的爱人赵佩珍同志担任后勤事务工作，吴涤苍同志（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同志担任医务工作。华中局很关心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的安全，派了一个警卫班做保卫工作，给江苏省委领导同志都配备了警卫员，还派了通讯员。有位连长负责领导警卫工作，同时又为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当军事训练的教练。

干部训练班分四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人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王尧山同志兼了一个支部书记；老关同志是一个支部的书记，我是工人界的一个支部书记。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员的支部有十余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李莲香（刘宁一同志的爱人，现名李淑英）、王尧山、赵先（王尧山同志的爱人）、张登、蒋林根（大家叫他“蒋木匠”，现名涂作潮）、杨健生、梁毓哲、朱志良（现在景德镇市工作）、陈永箴（陈小梅）、阿曾、阿叶等同志。

学生界的支部有二十余人：顾以信、顾以佩、张本、李琦涛、刘起林、高景平、钟石川、王伟业、侯裕民、潘文铮、吴涤苍、黄素痕、季梅先、杨佩景、谭峨谷、吴学谦、马飞海、陈一鸣、严家裕、陈向明、王涵钟、钟惠群（钟沛璋）、大吴、小吴等同志。

文化界和职业界的支部有十余人：老关、老赵、梅益、唐守愚、吴小佩、张钢（即韩述之）、梅洛、应仁珍、钱天常（即钱正心）、王津、康善贤（李大）、小周（大新公司支部书记）等同志。

工人界的支部有十余人：陈公淇、王群、张祺、孙明、顾松盛、范小凤、顾莲英、俞宝琴（现名袁丽芬）、王立（王烈豪）、徐伯晖等同志。

有些同志担任交通工作，有的没有编入支部，有的临时参加原来所属部门的支部。这些同志有：钱伯荪、丁祖宪、周晓华、赵茅兴、田辛、何萃、俞敦华、张征秉、戚原、高骏、舒忻等人。事隔三十八年，可能记得不尽正确。

参加干部训练班的一百几十人，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开始集中，十二月正式学习，大约到一九四三年二、三月结束。饶漱石到过顾家圩子，张云逸、谭震林、刘顺元、方毅等同志来做过报告。开学时，曾开过全体大会，由刘晓同志做动员报告，主要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还有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工作的实际，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如关建夫、梅益等同志总结文化界工作的经验，工人、职员、学生界的同志都分别总结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江苏省委很强调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作为专题来总结，我被指定写大团体工作

的经验，陈一鸣同志也写了学生界方面大团体工作。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党刊《团结》上用“李却”的笔名写过大团体工作的经验；在干部训练班里，又根据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中法校友联谊会、洋行华员俱乐部等实践，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主要内容记得有：（一）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广泛地组织群众利用已有的社会组织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二）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教育群众，从低到高，宣传抗日，宣传党的主张；（三）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四）深入参加团体的各个产业内部，发展党的力量。过了一个月左右，刘晓同志又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总结了这一段的工作，并对认真总结工作的同志和工作较好的支部进行了鼓励和表扬。这些总结的材料都由城工部刘长胜同志保存，一九四五年八月刘长胜同志重新回上海工作，交给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收存。

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和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上操、跑步、射击、投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

文化娱乐、体育生活也很活跃，全是年青人，最大的也不过三十来岁，青年学生干部最活跃，唱的、跳的，每次娱乐晚会，歌声不绝。最受欢迎的是顾以佶同志唱《延安颂》，李琦涛同志唱《夜半歌声》，刘起林同志拉洋片《抗日救国西洋景》。休息的时间，打排球和打篮球。打排球的健将还是学生方面的多，我有时候也凑个数，我打出去的球，大家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以后不少人干脆给我起个绰号，叫“莫洛托夫”。

学习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了个消息，鬼子要进行大规模

扫荡，根据地要准备反扫荡，部队紧张动员进行游击战，军政机关一律分散，要精兵简政，训练班、学校都要暂时停办。这个消息一来，引起了不少思想波动，江苏省委又进行了动员，说明当前形势和根据地的战斗部署，华中局决定为了白区干部的安全，要求分散地返回敌占区去，坚持敌占城市工作，配合根据地的斗争。江苏省委讨论决定，大部分可以回到敌占区去的一律都回去，一小部分留在华中局建立城市工作部，领导原来江苏省委所属范围的城市工作；另一小部分在根据地分配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个把月，到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才告结束。

交通员很紧张地、分批地护送一百多位干部返回上海及其他敌占大、中城市。大家都恋恋不舍，每日夜晚，三三两两，漫步田野，歌唱《延安颂》，尤其是有些干部听说省委将率领一部分干部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都希望能到延安去。经过江苏省委的说服解释，大家都服从组织决定，坚定地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斗争。

那次学习时间虽短，收获却很大。第一，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的报告，比较突出地反对主观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第二，对调查研究，有了根本的认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个党员做工作的起码态度。以后返回敌占区的干部，都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工作的最根本条件，到解放前夜积累了大量的有作用的调查资料。第三，比较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了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的方针，对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和敌占区应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认识上更加自觉，因而在行动上更能坚决地加以贯彻。第四，

加强了党性和思想修养，工人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职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的观点都有所提高。刘晓、刘长胜同志讲革命斗争的历史，对干部进行了形象化的教育。刘晓同志讲了长征途上的故事，讲到他前爱人的牺牲；讲到西安事变和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派他到上海来重新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的经过。刘长胜同志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国内外斗争，特别讲了中国工人阶级在苏联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与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这些故事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小说，可惜现在回忆不起了多少了。

（三）华中局城工部——新四军调查研究室

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华中局正式成立城市工作部，又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我留下担任秘书兼干部科长。为了与敌占区联系及护送干部来往根据地，专门成立了交通科，由田辛同志担任科长，前后担任过交通员工作的约四、五十人。陈一鸣、吴学谦、马飞海、陈慎言都在部内担任研究工作，陈浩同志担任后勤工作。在我们机关附近有政策研究室，陈同生、李代耕、贺希闵、陈穆和张逸城等同志曾在那里工作。

当时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邓逸凡同志为政治部秘书长，钱俊瑞同志为宣教部长。华中局联络部设在小王庄，部长是潘汉年，副部长是徐雪寒，不久潘就调往延安参加整风。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范长江，副社长于毅夫，施瑛和费恺是新华社的机要员，新华社每天出版电讯稿，是由政治部洪荣华、严寒等同志刻蜡纸印刷的。

城工部刚成立时，刘晓、刘宁一、张登和王尧山同志还在。

曾经对抗战以来的江苏省委工作做过总结，当时我和马飞海同志列席参加过一段。讨论的中心围绕在城市工作方针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但又要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总的是肯定江苏省委是执行中央方针的，但也有的同志认为配合武装斗争有不够之处。这以后，江苏省委及原有在顾家圩子受训的一些干部调动很多。张登同志调淮南区党委担任宣传部长，闵廉同志调淮南区党委任宣传部副部长，王尧山同志调华中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刘晓、刘宁一同志分别率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随同刘晓、刘宁一同志去延安的，有顾以信（现在驻奥地利大使馆）、顾以佩（现在广州）、唐守愚（现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吴小佩（现在北京）、李淑英（全总）、黄素痕、季梅先（现在上海市委纪委）、刘启林（北京西苑机关）、潘文铮、王伟业、张钢、老关、李会香同志等人，梅益同志本来也要去延安，中途把他召回。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有一部分是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刘晓、马纯古、刘宁一、张妙根、卢离棠、王明远、卢伯明、刘贞、顾复生等同志，在日本投降后又陆续从延安派回国民党地区工作（刘宁一同志未回）。

顾家圩子学习的有一小部分同志分配在当地工作，如舒忻、高景平、钟石川、陶戈晖、谭峨谷等同志，有的如朱志良、梁毓哲（现青岛海洋研究所）、杨健生同志分配在华中局机要电台胡立教同志处。

留在城工部的同志，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如吴学谦同志分工敌伪文化方面的研究，陈一鸣同志分工敌伪青少年问题的研究，马飞海同志也有分工，我除照顾全面外，分工关于敌伪经济

方面的研究。经常根据敌伪的报刊，和通过来根据地学习的同志座谈，综合情况，加以研究，提供刘长胜同志参考。刘长胜同志经常阅读情况，并加指导。特别是陈毅同志，在他未去延安之前，经常来城工部作报告，与同志们讲述形势及党的历史，尤其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他讲得很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同志们最爱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大家认为这是最生动、最活的马列主义的课。陈毅同志谈笑风生，深得同志们的爱戴。他也经常翻阅我部从敌占区带来的日伪书报刊物，有一次看到一本画册，封面是汪精卫的像，陈毅同志当场拿出笔来题了一首诗，原话回忆不起来，内容是痛斥汪精卫在石头城沐猴而冠，有奶便是娘，甘当汉奸是“契弟”（娘子）。当时在城工部工作的同志经常有机会去华中局听报告。作报告的都是到华中局来汇报工作或开会的各地区负责同志，如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李一氓、谭震林、粟裕等同志，这些报告使我们大开眼界，了解我党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具体情况，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在敌占区坚持地区斗争的信心。梁国斌、胡立教等同志经常来我部。粟裕、叶飞、张鼎丞、江渭清等同志在华中局开会期间，也来我部探望过刘长胜同志。我们在城工部通过调查研究的实践，进一步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求上海地下党的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要对周围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这项工作更普遍化了。

华中局城工部实际上是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的机关。当时主要抓住两项工作，一项是整风学习，培养干部，经常分批调敌占区的党员及少数积极分子来解放区学习。另一项是派干部去敌占区了解工作情况，或不定期地找各部门负责干部来城工部

汇报工作。为此，敌占区干部进出根据地的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二年八月至四五年八月的三年中，约有两千人次。所以做好交通工作，保证根据地和敌占区的联系，输送干部和物资，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部里的研究，在四二年已有交通线的基础上，派干部在根据地周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面开辟交通线，在边区附近敌人城镇里设立交通站。田辛和周晓华同志都曾派出去了解情况，开辟交通路线。我和吴学谦（现中联部副部长）、陈慎言等同志也都曾到边区仪征、扬州、六合一带进行了解。在这一方面，根据地党政和贸易机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我们经常说，有了根据地，敌占区工作条件就有利得多了，新四军就是上海地下党有力的靠山。

交通路线主要有浦口、六合、明光、嘉山、管店、仪征、瓜州、扬州等几条线，其中仪征和六合两条线用得比较多。远一点的如洪泽湖边也设过交通联络点，姚天佑同志驻在那里，后来因用得不多，就撤掉了。先是吴学谦和钟沛璋，后来是陈慎言和刘衡嘉同志（现在浙江省侨办）驻在仪征、扬州，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同志（现电力部副部长）给了很多帮助。俞敦华同志驻在六合竹镇，陈先同志（现国家计委统计局局长）给了很多帮助。邵健和刘进同志驻在明光，摆了一个布摊，专门为警察系统党内人员使用。前后当过交通员的同志很多，有工人、职员、教员、学生、警察，南京等地都分别有交通。在根据地由田辛同志领导，在上海由钱伯荪领导。交通员有周晓华、高骏、王津、戚原、俞敦华、贺崇寅、王逸民、赵茅兴、舒忻、刘大庸、彭原、刘衡嘉、刘进、姚明达（现在青岛海洋研究所）、毛良、徐陈思、林钧、屠传泗、褚雷、严维勤、王业康、王自慎、浦侠、佟子君、秦志明（程

韵启)、曹达、张治秦、何莘、张征秉、郁统聚、丁祖宪、沈凡、何志毅(仲伟)、胡华清等三十多位同志，他们除掉个别出过一些小岔子以外，一般都安全及时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并且也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工作打下了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我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对于上海地下党来说，也是意义深远，极其重要的。开始，我们只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整顿三风报告反复学习，并且抄写后秘密送至上海及南京等地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随着延安及新四军根据地整风运动的逐步开展，城工部的干部一面参加新四军直属队的在职干部整风，一面制订计划，根据地下党的特点，对地下党的干部分批分期地采取短期轮训，结合汇报工作进行整风学习，以及少数干部调到华中党校整风等方法学习。这一工作一直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

刘长胜同志参加了华中局的整风，他学习非常认真，做笔记，写自传，与干部谈心。他经常谦虚地说，我文化水平低，你们要帮助我。其实他发言、写信，都是自己起草的，做报告从来不夸夸其谈，非常实际，把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人人明白。对干部表现好的就表扬；如果有何错误，他毫不客气地当面直率地批评，批评过后并无成见。他非常爱护重视培养工人干部，善于发挥知识分子干部的特点。他逢年过节，总是记着有些干部包括有些中央领导干部在敌占区的家属生活很困难，总是派人找干部家属送些安家费用。例如陈云同志、洛甫同志的家属当时都在上海，长胜同志和城工部非常关心。对于其他干部，包括交通员也是一个样子。对我来说最为感动、永远难忘的是我在一天晚上，

突然急性盲肠炎发作，痛得难忍，刘长胜同志请吴学谦、周晓华、陈浩等同志用门板把我抬着，亲自送我到卫生部医院里（实际上是个休养所）。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同志亲自诊断，非立即动手术不可。时已深夜，不巧医院里唯一的一盏汽油灯坏了，只好点起了蜡烛和用手电筒照明，由崔部长亲自动手，给我做了手术。待我醒来，已是次日天亮了。刘长胜同志就坐在手术室里，直到天亮。长胜同志这样关心、爱护同志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学习。

我们在职干部约十来人，田辛、陈一鸣、吴学谦、周晓华、陈慎言、丁祖宪、陈浩、马飞海、刘衡嘉、赵茅兴和我等，以后还有侯忠澍、楼云，最后还有朱洁等，是一个支部（包括联络部、新华社的党组织），我是支部书记，参加军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华中局的领导同志陈毅、曾山、饶漱石、彭康等，经常给干部做报告，以陈毅同志的报告为最多，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滔滔不绝，有时一下子做四、五个小时。他讲到武装斗争与根据地重要性时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如一群狗，它围上来，要有打狗棒（武装），加上一堵墙（根据地），背靠着墙拿着打狗棒，就不怕狗的围攻。他常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历史上自己的某些错误，阐明毛泽东同志现行路线的正确性，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实际的党史教育，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对于我们是非常新鲜，感受很深的。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我们又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章，以及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三年的整风，真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大学校。我们一般都是先领会文件精神，再联系实际，然后进入专题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撰写自传。我们当时在城工部所写的自传，一直保存在华中局组织部的档案里。每人写好自传，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本人提出自我鉴定，然后由小组和支部做组织鉴定。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还要由新四军直属单位领导小组做鉴定。

在职干部进行整风的同时，我们分批对上海地下党的部分干部进行短期轮训。方式多样，根据地下党的特点，有的采取个别汇报的方法，有的编入小组学习，有的送往党校等等。据我回忆，参加华中党校第一期学习的有田辛、陈一鸣、邵健、俞敦华、戚原、刘大庸等同志，当时张登同志任教育处长；参加第二期学习的有梅华（毕琳）、金瓯卜、陈文彬（驻英使馆参赞）、马文林、苗雁群等同志，参加第三期的有李庆发和毛良等同志。

为了轮训地下党的干部，城工部成立了教育科，由田辛同志兼任科长，陈一鸣、纪康（丁丹）等同志都曾帮助过轮训班的工作。前后参加过学习的近千人，每期二至三个月，也有的时间更短些，根据不同对象而定。大体内容是：学习整风文件，联系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部分人做简要的自我鉴定，没有写自传。我除根据长胜同志意见参与领导学习以外，着重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因限于当时的条件，除向地下党各级组织了解以外，不可能内查外调，但基本情况还是掌握的。有的一时做不出结论的，也分配适当的工作，留待实际的考验和证明。一九四五年有部分同志送往华中建设大学学习。

我极力想回忆出参加学习班同志的名单来，以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强迫做交代，我尽量把我所能记忆的全部写下来，为了怕以后回忆不出那么多，我把这个名单分散地记在《毛泽东选集》上面，总算没有被毁掉，对我今天写这个

资料不无帮助。一九四二年底起到一九四五年前上海陆续来的干部是不断的。一九四三年警察系统的干部邵健、刘峰、刘诚、苗雁群、曹传辉、刘继霖等同志来学习，邵、刘等都把儿子送来解放区参军，窦敬良有两个儿子、女儿，马益三的兄弟，苗雁群几乎是全家都来。四三年吴彩松（即吴良杰，现南京市工交办负责人），开始接头口号对不上，后来王尧山同志讲了才接上关系。较早的一批如侯忠澍（即宋嘉漠）、金德琴（现在英国，即李天荫）、楼云、贺崇寅、王自慎、张治秦夫妇、彭原、王群、佟子君、姚明达等同志来后，有的曾经留在城工部工作过一个短时期，特别是侯忠澍担任秘书工作，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贺崇寅同志曾分配去四师淮北地区城工部，也是日本投降后重新调回敌占区的。四四年整风学习班举办次数较多，如浦作、浦侠、秦志明、杨春林、刘志雄、倪洪生、张书宝、杨秉儒、祝平、诸敏等同志都参加过。四四年七、八月陈良（现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洁（即计漱人，已牺牲）和上海郊区搞教育工作的一批同志如马崇儒（现苏州市委统战部长）、杨逸（现在科学院上海分院）、李琼（杨帆同志的爱人）等在一起学习。四四年七月间刘德全（现名郁统聚）曾带王中一、庄建安、武文斌、杜英等来学习。曹达同志进来后，担任部分交通工作，并带了高廷年、闻余堂、闻羌、陈蕙英、谢采华、张振民、唐国裕等同志前来，有的当时还是积极分子，以后才入党的。如闻余堂同志，参加救国会，在药厂工作，到根据地去过卫生部，发现通过商人购买的阿斯匹林质量差，他提出简便的检查方法，以后并为根据地采购和输送医药器材。四四年十一月，刘峰（现南京市委书记）、朱启鉴（现在南京航校）、周克、朱明等同志来短期学习，并个别汇报工作。到四五年八月前为止，

来汇报工作或短期学习的尚有罗士其同志夫妇、老丁、王纪华、汪壁、王大可、胡华清、张寿根、梁廷锦、王良材、史毓民、熊志华、雷树萱、项克方、梅达君、姜敏、戴利国、沈凡、方行、朱克明、屠基远、屠传泗、吴耐、潘劳、汪检基、陈思、顾文斗、金殿贵、沈鸿春、娄惠贞、王连宝、王菊芬、王惠康、陈铁峰、黄明(现在四川师范学院)、王云等同志。四五年五月，王勤华、史凡、施民、沈鸿春、娄惠贞等同志由纪康同志帮助，曾学习过一个月，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已出版，除整风文件外，学习了这个文件。也有一部分干部经过城工部，分别介绍到部队或地方去工作，如黄群华、王正、徐盼秋、周景文、吕理复、叶英、柯刚、周劝业、林德明、毛云中、戴叶、戴自觉、小俞、吴石、赵不祥、俞志明、蒋大年、王淑一、金殿臣的女儿等同志。

在这三年中，很重要的是还有各系统的党组织领导人前来汇报工作，如工人方面张祺、陈公琪等同志，职员方面陆志仁同志，学生方面张本、李琦涛，教育方面钱伯荪同志，警察方面邵健、刘峰等同志，南京方面刘峰、朱启鉴等同志，也有下面的各级干部。张祺、邵健、张本不止一次前来汇报工作，如张祺同志说，他曾经三进三出解放区，在四二年底到顾家圩子，他记得有陈公琪、孙明、顾松盛、范小凤、余宝琴等同志来学习，他两个星期就出去了。四三年底，又来汇报工作并参加整风学习，到四四年初又出去，最后一次是四四年七、八月间，主要是学习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决定并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陆志仁同志去过根据地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到七月，曾经写过职委的工作报告和总结，也写过自传，刘长胜同志提了意见。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间，刘长胜派彭原同志通

知他来城工部阅读《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研究如何贯彻。陆带了两个搞统战工作的同志谢寿天和韩宏倬同志一起来。学习中央指示后，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了，党也开始新的发展，积极为迎接抗战胜利做准备。通过他们的汇报，城工部刘长胜同志部署敌占区城市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与敌伪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城工部除了领导敌占区城市工作以外，在解放区的干部和临时参加学习的同志，都积极地参加部队的活动，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是单独的编制。我们参加了军事活动，如上操军训，学习巷战，参加夜行军活动，有时有情况，敌人可能出动扫荡，我们就作战斗准备，夜间连续转移，使敌人摸不到。我们同时也参加生产，按军直属机关的规定，要按时上交生产的蔬菜等。我们有些有利条件，从上海带来一些种子，如番茄、菠菜等，生产的番茄要算是好的。刘长胜同志当时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但他也参加劳动生产。我们的重劳动力有周晓华、吴学谦、丁祖宪、陈浩等同志，干起活来很有劲。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总要到田间去转一转。

此外，还动员了工人、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革命，输送了各种器材、物资支援根据地。还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对敌占区进行宣传工作，寄发宣传品，如《论联合政府》等文件、新华社电讯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指出，在敌占区“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

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江苏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针，把领导机关撤到新四军地区，保护干部，培养干部，坚持领导敌占区城市工作，积蓄了革命力量，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诬蔑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撤退到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这是有意的恶毒攻击，是为迫害上海地下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制造反革命的舆论。

（四）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

一九四四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望，反攻日寇的日子已近。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了“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的责任来”，“……又一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的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农村工作为主，转到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并重的地位；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到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党中央不仅决定了方针政策，而且对计划组织，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和领导都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城工部的工作立即转到了紧张战斗的阶段。首先是城工部干部本身学习中央指示，提高思想，制定计划，贯彻落实。决定了立即向地下党各级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认真贯彻。各系统的负责干部部分批调来根据地进行学习，拟定各自的宣传、组织的计划。当时华中局党刊《真理》有一期专门由城工部撰写了有关文章，传达中央精神，号召广大群众迅速组织地下军，准备与新四军里应外合。刘长胜同志，陈一鸣同志和我都分别写了关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职员运动的文章。《新华论坛》刊物上，我也曾用“万人”的笔名写过敌占区职工运动的文章。刘长胜同志还曾以华中区职工运动筹备会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敌占区的职工群众，组织地下军，配合新四军，夺取华中的大中小城市。

职工方面，特别是工人方面专门派干部和积极分子来根据地学习，进行包括巷战的军事训练，短期学习训练以后，即派回上海等地组织地下军。有些干部也派回上海，领导和组织地下军，如周晓华、高骏、孙明、刘志荣、毛良等同志。为此，又加强了交通工作，派舒忻同志去刘家集，以后在汊涧建立交通联络站，为了适应大批干部和群众来根据地，以后刘家集由仲伟、陈思同志负责，汊涧的接待站由俞敦华夫妇负责。

当时又组织了五、六十个在工人苦力中有联系，甚至与流氓组织有关系的同志，来根据地学习，然后派回工作。其中有江南造船厂的老工人，原来在纺织厂中的老工人倪洪生、张树生等，还有一位姓许外号叫独眼龙的，他们与部分失业工人、苦力、流氓势力中一些人有一定联系。中央明确地指出：“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都要去进行工

作。”“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条方针被“四人帮”污蔑为“流氓路线”，他们完全是反对中央的指示和方针的。争取伪军 伪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上海伪警工作是一个重点。邵健、刘峰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以“兄弟会”、“读书会”、“互助会”等分散的灰色的组织方式，团结和争取了伪警，成为必要时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支力量。在南京，争取伪军进行策反是个重点，通过南京党组织和策反的关系，打入了伪军里面，到四五年六、七月间，伪军钟剑魂起义，伪警卫第三师起义，伪军校的一部分人到解放区，是由田辛同志负责接待的。

在这时期，又派遣干部加强沪宁线交通要道工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南京刘峰、朱启銮两同志来城工部汇报工作，并接受准备起义的任务。为了加强南京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成立南京市工委，由刘峰同志任书记，除朱启銮同志外，又增派陈慎言和彭原两位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南京市的工作。南京的工作，一九四〇年至四四年，可以说是开辟时期，市工委成立后，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是个发展时期。陈良、吴良杰和马卓然、马文林等都是在差不多的时期派去南京工作的。在苏州、昆山方面，派了屠基远、屠传泗、吴耐、潘劳（吴、潘两位的名字，还是我代他们取的）和汪德基同志去工作，由屠基远同志担任苏州县委书记，利用有些同志在敌伪机关中的社会地位，找到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还有一件事需要写一下，一九四五年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转来电报，要我们把长期坐牢后汪伪特赦释放的姜维新同志，接来根据地。姜维新同志一九二五年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搞过红色恐怖队（即打狗队），

并为党中央做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姜维新第五次被捕，受尽拷打、电刑，初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四五年因大赦出狱。我们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派干部去上海把姜维新同志接来城工部，姜维新同志因长期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长胜同志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期，但不到半个月，日本投降，他也随着被派回上海。从这一事情中，我们对周恩来同志那样关心干部，极为感动。他对十五年前在他领导下的一位工人同志，记得这样牢，连姜在提篮桥监狱中的号码都记得清楚，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恩来同志的高贵品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延安电台发来电讯，苏联宣布对日宣战。这天晚上，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的首长都彻夜未睡。九日天还未亮，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同志和我去华中局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饶漱石，参加的有曾山、刘长胜同志和我（记得还有张执一同志）。饶传达了中央电报指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华中地区大中城市，准备进攻上海，命令城工部所有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宣布了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同志任书记，委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未到职）和陈祥生。据饶漱石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地下军。后来陈在浙东被捕叛变。

刘长胜同志和我回到城工部后，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决定我和张执一同志立即出发回上海。当时田辛同志适因公外出，我把工作都交给朱洁同志，重要文件都交给刘长胜同志。当天，我由赵茅兴和曹达同志带领，从根据地出发，于八月十一日到达上海。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的战斗结束了，我又重新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

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聂洪钧

(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聂洪钧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曾任过中央农委秘书长、红十军政委、红七军政委、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秘书、西北军委主席、三五九旅南

下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六六年不幸因病去世。去世前为粮食部副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本文是聂洪钧同志生前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标题是我们后加的。

编者



聂洪钧同志在陕北吴起镇（1936年）

埃德加·斯诺摄

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错杀

了党政军一些人员，引起同志的不满，影响了团结，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等都在红军工作，没有我的同意他们是不会被捕的，他们不被捕，则习仲勋、刘景范等也就不会被捕。但是，我没有坚决反对，而是积极的参加者与执行者之一。

一九三五年五月，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我由上海临时中央局调陕北苏区，会同几个同志成立“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

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来和我谈话，说了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蔡子伟；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问题。

五月三十日，我离沪到天津。在天津，北方局老高谈话时，也作了这样的介绍。

九月，进入陕北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相继到达永坪，合并编为红十五军团。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和交换意见，确定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决定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按北方局通知，原定参加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刘祚夫不能来了，要我们就地提一人参加，经过商量确定程子华参加，成立了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随后代表团会同西北工委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兼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

在西北工委的半个多月时间，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指出了李西萍等人的名字和在苏区进行破坏活动的事实；“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到他的包庇；黄子文是刘志丹派到关中的，蔡子伟是刘志丹派到西北工委来的，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二十六军全军覆灭；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等等。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

红十五军团建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部署战争，歼灭敌军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的第一个大仗即是劳山战役。

在劳山战役开始之后，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会议提出了开展反对右派反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会议之后又召开了省委会议，会议确定了肃反的方针：肃清西安、太原等地来路不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同时决定逮捕李西萍和从太原新近派来的张慕陶的一个交通员，以便追踪其他右派反革命。刘志丹、高岗参加了会议，并表示同意这个决定。会后，我随部队开到前方，根据省委的交代，曾召开两次军团负责人会议，有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高岗和我参加。会议一致决定：来一个深入反对右派的思想教育工作，揭穿右派的阴谋活动，严格注意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对其中确有破坏行为的人应予逮捕。

尔后，进行的劳山战役，以我军大获全胜结束。

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

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我们决定出兵环县，迎接中央红军。随即召开军团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红十五军团出击庆阳、环县之间，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并报省委。

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的行动，并要我们足够地估计到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最后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我们去信催郭速来，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十月，红十五军团进行了榆林桥战役。

榆林桥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三天，中央红军到了。我们即由榆林桥赶往下寺湾迎接。在下寺湾的中央会议上，我把红二十五军

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并编为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战役以及肃反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口头报告。

十一月七日，我跟随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不久，陕北肃反被揭发为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等为中央放出。我在接受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处分之后，离开部队，调到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工作。

大革命失败之后

——湖北松滋党组织的发展和九岭岗起义

黄 杰 沈德纯

(全国政协委员) (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湖北松滋县的党组织坚持斗争，并英勇地领导了九岭岗农民起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革命处于低潮。是年秋冬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胡宗铎、陶钧等先后盘据武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取缔一切革命组织，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一切革命的青年和群众，湖北省委无法建立。因此，在鄂西、鄂北成立两个特委，直属中央领导（这时中央机关已迁到上海），将党团员向各有关县份及农村撤退。松滋的黄绍豫、张波臣、沈德纯，江陵的彭之任、关序萱、黄杰等同志均先后于一九二七秋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回到松滋、江陵等地。黄杰同志原在沙市活动，因敌人有所注目，特委决定派往松滋工作。经彭之任同志将黄杰送至松滋，由黄绍豫同志介绍到街河市雷鸣泽所办的向上女子学校当教员。松滋建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由黄杰同志任支部书记，张波臣同志任青年团书记。阴历正月底，沈德纯由武昌回

到松滋。大约在阴历二月，鄂西特委（此时驻沙市）派张光杰同志到松滋街河市，在他的主持下，由张波臣、李春秋、黄绍豫、裴光月、沈德纯、黄杰等同志组成中国共产党松滋县委员会，由黄杰同志任县委书记，沈德纯同志任组织部长。

松滋县委成立后，着手发展党团组织。邓卜雄去杨林市、金鸡山、纸厂河一带，刘君瑞去刘家坪、裴家场一带。松滋城内由黄绍豫、杨其权和刘明哲等负责。张波臣、裴光月等同志负责西斋、刘家场、九岭岗一带工作。街河市、雷井口由李春秋同志负责。杨林市、金鸡山一带、松滋城里纸厂河等地的督促检查工作由沈德纯同志负责。黄杰同志留在向上学校掌握全面情况，并参加学校附近的街河市、雷井口两个支部的工作。农民长期处在封建恶霸、地主豪绅压榨下，迫切需要翻身革命，只要有人倡导，便一呼百应，因此党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一个多月的光景，就发展了党员近三百人，团员也有相当大的发展。

阴历三月，鄂西特委在江陵县召开扩大会议。江陵环境不好，黄杰同志曾在江陵做秘密工作，被敌注目后才派往松滋的。因此，特委指示黄不去参加扩大会议，松滋县委决定派沈德纯同志前往。特委扩大大会在江陵岑河口开了半截，因环境恶劣转至监利亦未开成，最后转到公安。当时公安县委书记是段德昌同志（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掌握了少数的革命武装，这才保证会议顺利结束。

特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松滋革命形势与任务，考虑黄杰同志是入党不久的女同志，年龄只有十七、八岁，担任这样一个县的重任有困难，于是决定派李述礼（北京大学学生，广东人）为松滋县委书记，黄杰改任组织部长，沈德纯为宣传部长。

特委扩大会结束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进攻愈来愈猛，鄂西特委在沙市的机关惨遭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及魏良生同志等均被捕，英勇牺牲。特委机关迁至宜昌，特委书记由周逸群同志担任。

松滋地区较偏僻，地瘠民贫，没有外来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民团的武器较好）。李述礼到松滋后，县委机关即迁至九岭岗山区，黄杰也脱离向上学校随县委到九岭岗，并化名桂青。

沈德纯同志返回松滋即到九岭岗，将特委扩大会议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讨论了扩大会议决议，并研究了松滋的任务。于是李述礼、沈德纯等同志即去杨林市、纸厂河、裴家场等地布置并检查工作。

李、沈下山不两日，阴历五月一日的上午，西斋区民团一个中队长带领二十七名武装团匪进山搜查捉人罚款，九岭岗农民被迫起义。当时，党组织发展很快，队伍没来得及训练，秘密工作很不严密，被西斋的土豪劣绅向芳田、罗经伍等发觉。他们一面上诉国民党县府（当时的反动县长是高季浦），另一方面责令西斋区国民党区长雷新民逮捕了两个共产党员，严刑审讯，逼供出九岭岗党员名单，故派区中队长率领武装，上山抓人罚款。九岭岗这个闭塞山区，农民素称强悍，过去常对“官府”抗捐抗税，还保有“反清复明”的封建组织。当敌人进山抓人罚款时，有的农民要求杀敌缴械。黄杰同志当时考虑，我们队伍刚刚发展，很不巩固，敌强我弱悬殊很大（当时尚不知敌方已掌握我方情况），主张暂时隐蔽，以便争取时间训练队伍，继续扩大力量。至于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可以由沈德纯同志利用社会关系营救。可是敌人步步进逼，声言“不交出全部党员便将九岭岗烧光杀尽”。在

危机之际，县委来不及召开会议研究，仓促间打出红旗（一块红布），放出一挂鞭炮，这时九岭岗全山男女老少，听到鞭炮声，见到红旗，一涌而出，喊杀声、鞭炮声遍及全山。敌在我突然袭击下，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英勇的农民同志们用菜刀、镰刀、锄头，将敌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我们仅一人受轻伤。

九岭岗农民起义后，沈德纯同志通过多方社会关系了解敌人动向，知其已掌握我们的情况，正积极调集其他各区民团兵力来镇压革命，同时，国民党县长高季浦又向松滋邻县宜都敌驻军四十三军火速求援。

松滋县委得此消息后，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用缴获的二十七条步枪加上土武器（菜刀、镰刀、锄头）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急速进军到西斋、石牌。农民为着雪恨报仇，杀了老土豪原任区长的雷敬之及其部分家属，烧了国民党现任区长雷新民及土豪恶霸向芳田、罗经伍的房子，没收他们的财物及粮食，分配给了农民，打富济贫，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同时派张维高去宜昌特委请示，又听说贺龙同志在湘西桑植县活动，便派人去找，但因敌层层封锁，均未取得联系。

起义三天后，敌集结了各区民团和敌驻宜都之四十三军陆续向我包围上来，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形势下，只得将石牌、西斋队伍撤退到九岭岗。在敌兵层层包围攻击下，“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援兵”，县委即决定用少数武装守住山口，掩护已暴露面目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我们被迫将随带之枪支与油印机等埋藏在九岭岗对面之猫儿盖山下。在敌人的残酷进攻和惨无人道的烧杀下，九岭岗起义失败了。

李述礼、黄杰等同志先后化装为农民、村姑在群众的掩护下

离开了九岭岗，撤到沈德纯同志家中。敌人追查很严，李述礼是个外省人，黄杰同志是个外县人，又是剪发放足的女青年，很不好隐蔽，李、黄又转移至刘君瑞的家乡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迫，黄杰又被国民党松滋县府通缉，县委决定由沈德纯设法将黄杰同志送出松滋境外。沈德纯经过其胞姐夫伍少石（地主）以内眷的名义用轿子抬出松滋境外到公安东嶽庙，黄即去湖南津市沈的朋友家中暂住，等待鄂西特委指示。沈德纯同志将黄杰同志安排后即返松滋，这时松滋环境更为恶劣，反动派到处捉人，同志们已不知去向，县委无形解体。沈德纯同志在松滋无法继续工作，只得也去湖南津市，是年冬去北京找上党的关系。黄杰同志在夏秋间离津市返家乡找鄂西特委去了。李述礼离开松滋去北京，脱离了党的关系，现在西北大学教书。

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却撒在了松滋人民的心中。

* * *

【黄杰同志附言】本文是我和沈德纯同志于一九六〇年写出的。沈德纯同志，原是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主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委，“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因病去世。今提供这篇回忆录，也是对他的纪念。

记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谭 汤 池

(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湘赣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湖南边界连绵几百里的罗霄山脉中段。

一九三一年，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排斥和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革命引向了危机。一九三四年秋季，主力红军被迫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留下的部分武装和党政军机关干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游击斗争。我这里就坚持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作一些回忆。

一、战略转移 主力红军撤离根据地
二、坚持斗争 边区省委留于武功山

一九三四年秋，正是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进行浴血奋战达到高潮的时候。

当时，湖南茶陵县党政军机关住在湘赣边区茶陵、永新、宁冈之间九龙山区的一个约有几十户散居人家的村子里。县委书记

是李运田，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是雷发云、张善诚，我担任政治保卫局长。

一天，接到湘赣省委指示，令我和保卫局预审员肖振南同志到省政治保卫局报到。我把工作交给接任的周德元（他是保卫局执行科长），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第三天到达省委所在地——江西永新的碧江洲。

在省委，我们见到当时党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同志，他非常关心和仔细地向我们询问了茶陵方面的情况。当时省委有好几个领导在场，我只认识省工会主任刘士杰。我们汇报茶陵工作情况后，便到了保卫局。省保卫局长吴德峰同志找我们谈话，我们才知道，军区部队要编为红六军团转入外线作战，省级机关也一分为二。留下部分人员与部分武装坚持边区斗争。省保卫局也同样分出一部分随同吴德峰同志编为六军团保卫局。肖振南同志随同吴德峰同志到六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工作，我分配到省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长（解放后听吴德峰同志说：肖振南同志在长征中牺牲了）。

几天后，六军团在任弼时、王震、肖克等同志带领下，离开碧江洲，突出敌人重围，向湘南运动了。我们也从碧江洲转移到牛田圩，销毁文件，清理在押犯人（这里面有在永新、沙市战斗中活捉的敌旅长侯鹏飞和一些团级军官），做好战斗的转移准备。

不久，敌人围攻省委所在地，省委决定率领红五团向武功山转移。到了安福的杨梅山，休息了一天，成立了由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肖行麟（后叛变）、省工会秘书长郭桂秋、省保卫局特派员贺时等同志组成的北路特委，留在该区坚持斗争。省委继续向武功山前进。途中（已进入武功山区），又遇到一支从中央根据

地突围出来的江西一个分区的机关和部队（现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芦文兴同志就是属于该部的），约有一百多人。随即，部队进行了合编。经过几夜的行军，最后到达武功山的鼻上村（属莲花路口区），与该区的党组织及红三团会合了。省委在武功山住下来，领导整个边区的斗争。当时为了统一领导武功山区的斗争，省委决定成立莲（花）安（福）萍（乡）地区特委及军分区，调省保卫局长刘发云任书记兼政委，我接任省保卫局长的职务，参加省委常委。

不久，从电台得知，六军团到了湘西，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后来成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十月，中央红军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整个南方苏区被敌人占领，我们转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二、浴血战斗 军区司令彭辉明牺牲 二、叛徒可耻 省委书记陈洪时投敌

六军团离开边区时，除留下红五团这支主力部队外，各地区都有独立团或营，还有不少县、区游击队。仅在武功山地区就有红五团、独立三团、敌后挺进大队及省政治保卫大队与机关武装人员约三千人，其它各地区、县武装加起来也有近三千人。各级党政组织还比较健全。在武功山，参加常委会的省党政军领导是：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陈洪时，省委副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省苏维埃副主席肖行麟（当时在杨梅山北路特委），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省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后调莲、安、萍特委、军分区，由谭汤池接任），省团委书记王用济，妇运书记旷金媛，省工会主任（名字忘了），省白区

工作部长刘炳高。省委主力部队红五团团长是曾开福，政委是谭福英，负责人还有段焕竞等；红三团负责人记不得了，罗维道可能是其中之一；敌后挺进大队政委是刘培善。湘赣边区，从九龙山到武功山，地形险要而复杂，丛林茂密，活动方便。更主要的是，湘赣边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工作基础好。这些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可是，当时担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的陈洪时，是一个投机革命，执行王明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在这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思想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当时有许多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从敌占区逃了进来，无处安身，没有粮食吃野菜，有的夜晚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小孩子哭，怕惊动了敌人，便把自己的孩子闷死，还是要跟着我们革命。陈洪时非但不去保护这些干部和群众，组织大家同敌人斗争，反而把他们当做“包袱”。在转移时，不准通知这些人，致使这些同志和群众有不少惨遭敌人杀害，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省委同各地区部队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省委转移到武功山后，在工作上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斗争形势进行新的部署，仍然沿用老一套。在军事上，照旧集中兵力，搞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和敌人硬拚，致使敌人很快发现还有红军的主力部队。因此敌人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去尾追堵截长征的红军，另一方面又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围剿”我们，使我们的工作刚开始就陷入被动。

在湘赣边区，敌人集中了李云杰、李抱冰、罗霖等三个师，伙同大批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向我扑来，由北向东，反复进行扫荡。整个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到处在流血，十分残酷。在武

功山，我红五团和红三团与敌李抱冰师浴血奋战，消灭和杀伤大量敌人。但敌众我寡，我方损失也不小，特别是虎头岭一战，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不幸负重伤，送至后方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接着，敌人向武功山大量增兵，从莲花、萍乡两地向我合击。面对这样严重的情况，作为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人的陈洪时，却命令部队同敌人展开拉锯式的阵地战，同力量占优势的敌人硬顶硬拼。敌人依仗碉堡，白天向我发动猛烈进攻，晚上缩回碉堡休整。我军白天被迫应战，夜晚还要派出部队袭击敌人，人员弹药消耗很大，部队也得不到补充休整，接连几仗失利，部队战斗力大大减弱。一天，敌人集中力量向省级机关驻地进攻，部队战斗到天黑，此时，陈洪时不经过组织动员，又非常仓促地将机关干部和我们的政治保卫队统统编入红五团（我也到红五团兼任特派员）。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匆匆忙忙带领红五团、红三团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盲目地离开武功山，向茶陵、攸县、莲花地区的棋盘山转移。时遇大雨，道路泥泞，白天要同敌人战斗，晚上还要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到棋盘山后，省委又遭敌突然袭击，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发报机被敌缴去，剩下的是只能收不能发的收报机了，从此与中央和六军团也失去了联系。一天，省委把我从红五团调回，召开常委会，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缩小目标，分散活动，红五团向茶陵方向行动，红三团回武功山，派我和省妇运书记旷金媛到攸县县委去指导帮助工作，省委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向太平山转移。部队行动后，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了湘南蔡会文、方维夏同志派来联系的一支小部队，省委即派人命令红五团向湘南行动。

次日下午，我和旷金媛以及省团委书记王用济同志的爱人初

英、省委干部谭恭喜、警卫员彭加珠等同志，同攸县县委书记等三人前往攸县润坪地区。我们在润坪地区进行组织工作，活动了二十余天，刘培善（原福州军区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刘别生（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长，后牺牲在抗日战场）率领挺进大队把我们从润坪接回省委驻地（属江西萍乡县）。

省委当时住在山上，用毛竹搭了两个大棚子，不远处有一条溪流。原来，省委到太平山后，陈洪时的叛徒面目逐渐暴露。陈洪时的老家在萍乡，家里是大地主，他原配妻子尚在。他当时利用党的地下组织关系，把他的家人叫到太平山，避开省委其它负责同志单独与家人谈话。他自己又单独下山，到地下组织家里与家人接头。因为他是书记、政委，谁也没有警惕怀疑。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他借口目标大，不利于隐蔽，提出要带领省委机关到萍乡安源一带开展城市工作。这个右倾逃跑的主张，当即遭到大多数到会同志的反对，特别是当时具有较高威信的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同志坚决反对，使陈洪时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我们回到省委后，向常委们汇报了攸县的工作情况。省委决定让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管保卫工作。

由于陈洪时机会主义的领导，整个工作被动，党内思想也比较混乱。离开了武功山根据地，失去电台，同中央与六军团失掉联系，对全国革命斗争形势不明，红五团去湘南后也一直无消息。为了与中央取得联系，常委会决议派人到湘南去。陈洪时提出派谭余保与刘发云前往湘南找蔡、方二同志。由于当时大家都未完全觉察陈洪时叛变的企图，加之谭余保与蔡会文、方维夏同志较为熟悉，到会同志也就同意了。会议上还决定由我接任刘发

云（莲、安、萍特委及军分区负责人）的职务，派我和王用济同志带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与挺进大队一起到攸县排山一带活动。

谁知我们一走，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妇运书记旷金媛等人派往萍乡一带搞群众工作，几个女同志（谭余保、王用济的爱人）也被安置到地下组织群众的家里，这样，留在省委的仅有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警卫队了。这时陈洪时佯称省委被敌人发现，带领省委人员和警卫队约三十余人，转移到某地隐蔽。到某地后，被敌人包围缴械（这是以后我听龙承绪讲的），陈洪时可耻地投降了敌人。

陈洪时叛变后，从敌人那里捞了一个“招募专员”的职务，带领敌人到太平山地区疯狂搜山，破坏我们的组织，逮捕杀害我们的同志，强迫群众下山，并大量散发他写的反动宣传品，以动摇我们的军心民心。一时乌云布满了边区上空，湘赣边区的革命形势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三、挺身而出 谭余保举旗挽危局 三、坚定决策 棋盘山成立新省委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这万分危急困难的关头，谭余保同志从往湘南的途中回来了。原来他在去湘南的路上，走到茶陵严尧垅上时，派刘发云下到村子里去了解情况，结果刘逃跑了。考虑到南去的行动已被暴露，谭余保同志便返回到棋盘山。他从当地县委那里得知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后，挺身而出，力挽残局，举起了红旗。他通过地方党组织派人到各方联络，并首先决定调回坚持在攸县排山地区的莲、安、萍特委、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并派易湘苏同志（原中南局监察组负责人，已去世）到攸县来找我们。

湖南攸县排山地区过去是我们的游击区，人民群众对我党和红军的政策是拥护的。我和王用济、周杰（军分区司令员）带领特委、军分区来这里后，一方面在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同敌人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我们的情况。刘培善、刘别生同志率领挺进大队在军分区领导下进行单独活动，经常挺进到敌中心区，捉土豪筹款，扰乱敌人，同时也做组织宣传群众的工作。

为了与省委取得联系，我们曾几次派军分区侦察员刘贵生，到太平山找省委联络，刘回来汇报说未找到。易湘苏同志来了，带来了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和谭余保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派人出去召回挺进大队，连夜出发，向棋盘山急驰。当我们经过太平山时，见山上、山下道路两旁的树上，到处都张贴着陈洪时书写的“招募书”一类的传单标语，不禁使我对侦察员产生怀疑，怎么他没汇报过这些情况呢？同时，我对周杰的行为也感到可疑，因为周同陈的关系很密切，他曾提意见要我和王用济同志带领特委机关在排山隐蔽做地方工作，他带领军分区部队去找省委陈洪时，这里是否有什么未公开的内情？到棋盘山后，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余保同志，对周杰警惕了起来，但对周杰的两个亲信——侦察员刘贵生和供给部长徐德甫却没有警惕。后来周从柴棚里逃走了；徐德甫要叛变投敌，走到途中找群众带路，正好找的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便被处死了；刘贵生在敌人的一次袭击中，乘机带枪逃跑了。这是后话。

我们跟着易湘苏同志到棋盘山后，在山上的一个柴棚子前见到了谭余保同志，他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说：“省委已被陈洪时破坏了。省委其他同志下落不

明，现在常委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但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那怕只剩下一个人，红旗也决不能倒下！”我们的心情也很激动。这时，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和参谋长段焕竞等同志进来了，大家都热情激动地握手问好。在这斗争最困难艰苦的时刻，革命同志之间的心贴得更近了。

原来，红五团到茶陵后，又与超过他们十余倍的敌人展开了激烈而频繁的战斗，经常是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同志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拚，伤亡愈来愈大。接到省委要他们向湘南行动的命令后，想休整一下部队，但时间紧迫，且敌人尾随身后，不能实现。途中没有地图，没有响导，凭着记忆和星斗辨别方向向前疾走。突然和一股敌人遭遇，短兵相接，子弹失去了作用，就用刺刀、枪托展开肉搏，经过一场血战，终于冲开一条路，到了湘南。但又没有立刻找到方维夏、蔡会文同志，由于目标大，很快被敌人发现，敌人团团围住他们，他们被迫撤进深山。由于远离根据地，远离人民群众，吃饭成了大问题，饥饿象脚链一样绊着他们，人人眼窝深陷，脸色苍白，许多同志一坐下，就停止了呼吸。最后被迫从湘南突围，全团由一千多人减成一百多人，政委谭福英叛变，部队回到棋盘山时，仅剩下几十人。听他们叙说这些悲壮的历程，我们心里也十分悲痛。

在这期间，除武功山区外，附近的一些部队和人员陆续都回到棋盘山，其中有傅茨喜同志率领的省委特务队一部，有吴金莲、胡金莲、冯北达等同志率领的莲花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们在棋盘山召开了干部会议，同志们愤怒地声讨陈洪时叛变革命的罪行，一致通过决议，开除陈洪时的党籍。为了继续领导边区的革命斗争，决定成立新的省委，停止

原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的工作，统一成立军政委员会（公开名义为游击司令部）。大家一致推举谭余保同志为省委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分工是：谭汤池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管保卫工作，周杰为省委宣传部长，陈永辉（原莲、安、萍特委秘书长）为省委秘书长，王用济为共青团省委书记，陈珍元为省委妇运书记，曾开福为军委会副主席（主管军事），段焕竞为军委会参谋长，徐德甫为供给部长，刘培善、吴金莲、尹德光等同志为省委委员。

会议决定在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战士中，开展反陈洪时叛变革命的斗争，肃清其造成的恶劣影响。省委向全体党员、干部、战士指出：背叛革命是绝无出路的，是绝无好下场的。只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并发表了告群众书，告诉人民群众，党和红军永远不会离开他们，任何敌人消灭不了党和红军，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

棋盘山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湘赣边区的革命，挽救了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结束了陈洪时机会主义叛徒路线所造成的混乱危急局面，保存了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革命骨干力量，稳定了党心、军心和民心，重新达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使整个边区革命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从此，在以谭余保同志为首的边区省委领导下，边区革命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的生存，并逐步走上稳定、巩固、发展、壮大的道路。

四、克服困难 省委派人四方联络 四、依靠群众 武功山找到红三团

棋盘山会议后，我们立即开始了新的行动，省委决定派王用

济同志到湘南找方维夏、蔡会文同志，另外派我和段焕竞同志到武功山找红三团（红三团到武功山三个多月一直没消息）。会议上，大家仔细分析了情况，确定了路线，挑选了几个熟悉去湘南道路的同志，随同王用济同志前往湘南。临行时，同志们谆谆嘱咐，在棚子门口一一握手告别，直到王用济同志一行八人的身影在崎岖的山路上消失，大家还默默地预祝他们胜利归来。前几次派人联系的失败，更使我们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可是他们一去便杳无消息，我们同外界的联系也就中止了，直到解放后，我见到随同王用济同志到湘南的谭恭喜同志，从他的口中得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湘南找到方、蔡两同志，完成了任务。不幸的是，不久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王用济同志同方、蔡两同志一同牺牲了。王用济同志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对革命事业非常忠诚，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送走了王用济同志，我和段焕竞带着彭加珠等几个同志便向武功山出发。红三团与我们中断关系已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边区经历了最艰苦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部队损失是不会小的。但是，红三团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不少是党的坚强干部，不论环境怎样恶劣，我们估计多少总会存在一部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到了武功山，一连几天，我们在山上山下、密林深处转来转去，没有见到一点踪影。带的干粮吃完了，没有办法，只好下山找老俵，一则弄点吃的，顺便也可打听一下红三团的消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下，老俵们的生活十分困苦，我们在夜里两点钟叫开一家老俵的门，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经过谈话，老太太知道我们是红军，便进去拿来一小簸箕粗粮给我们，老太太含着眼泪向我们诉说了

反动派的罪恶，激起了大家无比的仇恨。五个月前我们曾住在这里，今天的情况跟那时大不相同了，房屋被烧掉不少，鸡、鸭、猪、狗全给白军抢走杀光了，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红三团，于是我们又上山了。找了一天一夜，走的实在太疲劳，到一条大深沟旁时，天刚蒙蒙亮，我们正准备休息一下，忽然有同志发现沟旁路边不远处有小草被踏倒的现象，延伸下去，好象是一条有人走过的小路。我们象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立即作了分析和研究：这不会是砍柴的老俵走过的，这原是没有路的；挖竹笋的，现在已没有竹笋可挖了，肯定是我们自己人走过的。我们怀着一线希望，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扶着石头、树枝向前走去，走到半山腰，脚印更明显了，再走一会，脚印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大，肯定是一队人。我们高兴地忘记了疲劳，下到深沟，在一个石岩背后，出现了一个大水坑，走过去才发现还有两个大石洞，洞里出来了一群人，中间还有一些妇女，他们从我们的打扮上似乎看出是自己人，当我们说出是省委、军区派来的时候，他们都激动的哭了，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当我们问起县委和红三团时，他们说，离这不远，我们又互相说了些话，喝了点水，他们便带着我们找到了县委，县委又带着我们找到了红三团。

原来，红三团到武功山后，立即被敌李抱冰的部队重重包围，敌强我弱，部队伤亡很大。为了保存力量，不能与敌硬拼，红三团只好在深山里与敌周旋，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刚闭上眼睛，敌人就尾追上来，部队疲劳不堪，最后只剩下几十人。萍乡、安福县委机关在敌人残酷“清剿”下，损失也很严重，许多同志牺牲和被俘。剩下的同志在萍乡保卫局长周道一和

安福保卫局长郁金明的领导下，重新组织了县委，他们与罗维道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团剩余部队及武功山后方医院的同志们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吃树皮、挖野菜，顽强的坚持斗争。看见我们来到，同志们当时的那个热情激动劲儿，现在想起来，似乎就在眼前。今天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我们在武功山呆了半个多月，整顿了县委，成立了莲（花）安（福）萍（乡）县委，由周道一、郁金明等同志负责。部队也进行了整顿，由罗维道等同志负责，后方医院的同志都编到了县委和部队里。以后，周道一等同志做了很多工作，省委和军委会也都到那里住过，武功山在游击战争中成了我们一个主要根据地。

五、敌人“清剿” 搜山烧屋大发射狼兽性 忍饥耐寒 环境艰苦方显英雄本色

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是一九三五年。那时，敌人李云杰、李抱冰、罗霖三个师分驻在湘赣边区的吉安、安福、遂川和泰和一线，莲花有敌保安十团，新喻、分宜有敌保安六团，萍乡有敌保安四团，在茶陵、攸县、醴陵都有敌保安团和大批的地主反动武装，对边区山地实行重重包围，设立层层碉堡封锁线，进行反复“清剿”，不断搜山、杀人、放火、抢劫，实行砍树、烧屋、移民并村的政策。千方百计的想消灭我们。在敌人的“清剿”下，又加上党内陈洪时叛徒路线的影响，失败主义的情绪非常严重，我们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在永新方面，县委机关、部队及医院在省委离开牛田后几乎损失殆尽；遂（川）、万（安）、泰（和）工委被敌打垮，各县武装已不复存在；杨梅山区的北路特

委，据说由于肖行麟叛变，贺时同志牺牲，组织全部遭到破坏；茶陵党政军机关和独立营在茶陵秩堂东坑龙上地区遭受敌人伏击，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弹尽力寡，全部覆没，整个湘赣边区作为根据地已不存在，部队由几千人减为几百人，武器弹药奇缺而又无从补充。在棋盘山开会时，部队不足二百人，武功山武装也不满百人，已无法与敌展开正面战斗，敌人还不断利用叛变分子带路，进山“清剿”，失败主义情绪象瘟疫一样蔓延滋长，经常有人反水叛变。有时，我们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稍有疏忽，就可能遭到袭击，真是睡觉都要睁一只眼。情况非常困难，整个革命形势转入最低潮。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气馁，没有动摇，我们转变了原来的领导方法和斗争方式，在新省委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为了坚持持久斗争的最后胜利，除了加强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各种不利于革命的思想情绪作不疲倦的斗争外，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整顿恢复我们的各级组织，清理党员队伍，使各级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棋盘山会议上，省委就作出了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和领导的决定。我们加强扩大了莲花县委，以棋盘山为中心，成立了茶（陵）攸（县）莲（花）中心县委，由吴金莲同志任书记；以后又以太平山为中心，成立了攸（县）醴（陵）萍（乡）县委，由尹德光同志负责；又派出以傅芙蓉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茶陵、永新、宁冈地区的九龙山一线开展恢复、整顿组织的工作，省委还派出干部协助各县委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并决定各部队都要协助地方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派出工作组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我们秘密恢复和发展了共青团、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组

织，把群众组织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使革命之火在边区又燃烧起来。当时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每个同志身上就是一把伞，一条毯子，一个干粮袋，再加一个缸子，白天奔走于深山密林之中，来往于各村之间，夜晚深入群众家中开展工作，为了避免给群众带来麻烦，我们就天当被、地当床，和衣而卧。遇到阴雨天，雨伞当屋顶，两人合盖一床被，合铺一条毯。在机关里（所谓机关不过是用树枝搭起来的柴棚），不分老幼官兵，大家都挤在一个铺上睡觉，晚上起来，互相盖被子，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非常深厚。如遇到敌人搜山，柴棚子被烧，那就只有露宿了。在冬天，敌人“清剿”严重的时候，有时就在雪山上露宿，冻得不行，只好互相抱着取暖，坐到天明。由于敌人封锁，群众不能进山，经常缺粮，只好夏吃杨梅冬剥笋，野菜山果当干粮。有个同志饿的实在吃不住了，跑进山里寺庙，把鼓皮扒下来烧着吃了，同志们后来打诨开玩笑叫他是吃鼓皮的，最后竟成了他的大号，真名别人倒不叫了。

行军走路进山时，必须十分小心，走过后，还得把草一根根扶起来，防止敌人沿来路突袭。我就好几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幸而都被哨兵发现了，不然就做了俘虏。那时，还要经常警惕出叛徒，叛徒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教训太多了。一九三六年，我到莲花南郑区检查工作，当时区委机关住在一条山沟里，沟里有条小河，柴棚就搭在小河旁边。我到的当天晚上，我们有一支部队来到这里，驻在我们右边的山上，离我们约有三里路，因为天色已晚，没有取得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区委书记胡金莲同志正在“打摆子”，但是他还是坚持跟我谈了工作情况。当时，离区委一里地有个小村子，村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但里面出了一个叛

徒，他向敌人报告了我们的行踪，第二天天未亮，他带着敌人悄悄地摸来。这时，大家都还在甜睡，炊事员同志起来做饭，哨兵也就撤回来了。炊事员苏娥同志（女）到小河边洗米，听见对面的树林里有踩倒树枝和小竹的声音，她就大喊了一声，顿时，枪声大作，我们从梦中惊醒，立即从后门冲出撤到山上，到山上发现少了胡金莲同志，大家都很着急，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一阵喊杀声，原来是山上的部队，他们听到枪声，才发现敌人在偷袭我们，立刻冲下山来，敌人也不知虚实，吓得赶快跑了。我们回到柴棚，发现胡金莲同志倒在门口，手里握着枪，枪里子弹已经打光。原来他忍着病痛，掩护大家，最后子弹打完，撤退不及，胸部中弹牺牲了。看到这个情景，大家都忍不住哭了。胡金莲同志是江西人，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是工作能力很强，与敌斗争非常坚决，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过去担任过县委书记，带领区委机关转战于莲花地区山里山外，对恢复发展莲花的组织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为胡金莲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村里的群众都来了，哭得很伤心，县委的同志听到后也都很悲痛，同志们发誓一定要为胡金莲同志报仇。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处决了那个叛徒。

象胡金莲同志这样的好干部还有许多，其中有使我难以忘怀的茶（陵）攸（县）莲（花）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同志。他出身于贫农，为人十分忠厚，工作踏实，勤勤恳恳，他领导的茶攸莲中心县委当时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县委，在他和同志们艰苦工作下，莲花、攸县恢复了四个区委，后来又在茶陵恢复了两个区委，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使他积劳成疾，最后，病逝在战斗的岗位上（也就是深山里的柴棚子）。他的去世，也是边区一个很大的损

失。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几位红军女战士。省妇运书记陈珍元同志，工作总是走在别人前头，作风泼辣，对敌人无比憎恨。抗日战争时期，她调到江西搞秘密工作，与赣西南特委书记刘符节同志（与陈毅同志在赣南一同打游击的）结了婚。以后刘符节同志被叛徒特务暗害，她同叛徒打官司打到法庭，威武不屈。易湘苏同志，她担任茶攸莲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时，经常一个人在漆黑的深山密林中奔走，访村串户，开展各种工作。一次下山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但她英勇不屈，丝毫没有暴露我们的组织。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党才通过关系把她营救出来。还有王桂娥、李珊（发姑）同志等，这些同志不愧为英雄的红军女战士。

六、形势转变 边区省委改变战略 主动出击 游击武装越战越强

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我们由尽量保存自己，避免与敌作战，帮助恢复发展各级组织，打土豪等，发展到进行更多的游击战争。开始，我们没有成熟的游击战争经验，后来，蔡会文、方维夏同志派人送来一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小册子，使我们受益不小。当时我们如获珍宝，每天都学习这本书，互相传抄，做到人手一册，这本书对于指导我们进行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我们在斗争中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省委把所有部队编成为六个大队，在战略战术上也改变了原来的作法。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在边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展开小规模的、隐蔽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我们的原则是分散活动，隐蔽目标，声东击西，夜晚出击，争取主动，灵活机动，

找敌人的薄弱点进行攻击，避免与集中较大之敌正面作战。战斗方式通常是伏击和诱敌出来包围消灭之；或者乘敌不备，远道突袭。当时敌人都是拂晓出来，黄昏返回，我们则针锋相对，黄昏后出击，拂晓而归。采用这些战略战术后，我们取得了不少胜利。

一九三六年秋，湖南攸县的敌人派出了一个班到皮家村地区来催收杂税捐款。群众听到后恨极了，立刻将这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经过分析研究后，派出一支兵力大于敌人两倍的精干部队连夜出发，于拂晓前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森林中。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真来了，进入伏击圈后，一声令下，一个冲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见不妙，立即钻进路边的一个祠堂里，进行抵抗。我们迅速包围了祠堂，采取了火攻，并发动了政治攻势。最后，贪生怕死的敌人终于把枪一支支从里面扔出来，全部投降。离此不到二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碉堡，敌人由于不了解我们的虚实，缩在乌龟壳里，始终没敢出来增援，我们只费了点子弹，获得了全胜。把俘虏教育一番，每人发了一块银元释放了。这些俘虏回去后，到处宣传我们的厉害和好处，扩大了影响。以后，小股敌人一般不敢再轻易出来。一九三六年冬，江西莲花县敌人的一支短枪别动队（武装特务），经常骚扰我游击区，还冒充游击队敲诈勒索群众，我们多次下手未能成功，最后，采取了诱敌的办法。打入韩山里区公所的同志用假情报把敌人引诱出来，我们则将部队埋伏在莲花县城到韩山里大路旁的树林里，当敌进入伏击圈后，我们突然袭击，很快地就把这群坏家伙歼灭了，解了群众的心头之恨。从此敌人就躲在碉堡里很少出来。那时，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到处筑碉堡，白天出来“清剿”，晚上就缩进碉

堡，自以为万无一失，有时晚上连哨兵都不派，根据这种情况，省委号召军民齐动手，火烧“乌龟壳”。

我们发动群众配合，以几个人为一小组，半夜摸到敌人碉堡跟前，把浇上火油的柴禾和稻草堆放在碉堡门前点燃，一会儿，燃起了冲天大火，便听到正在赌纸牌的匪兵们乱叫乱蹦起来，这时候，同志们站在山上，远望着熊熊的火光，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这一系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也学乖了，加强了戒备。情况的变化，使我们又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深入敌人封锁线以外，乘敌人不备，突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一九三六年夏季，在段焕竟、刘培善同志率领下，我们集中了一支较大的部队，冒雨急行军八十余里，奇袭了敌安福县政府所在地——州湖镇，打死了敌县长，消灭了县政府的武装，缴获了许多武器和物资，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时，我们的部队早已凯旋而归。

就这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清剿”，使我们的游击区和部队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

七、消除误会 谭余保亲自为陈毅松绑 奔赴前线 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二团

一九三七年十月，傅茨喜、李森启、黄炳光等同志从段焕竟、刘培善同志那里送来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当时，由于我们同党中央断绝联系已有几年之久，对外面的形势

了解甚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消息，经过分析也估计到中央的路线有了新的变化，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情况下，同国民党暂时妥协是可能的。但是，严酷的现实斗争环境又不能不使我们对敌人的宣传和来到山区的人保持高度警惕。那时候，我们的同志还在天天流血，敌人还在逼迫一些红军家属和群众上山劝降。我们过去由于缺乏警惕而被叛徒出卖造成流血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对陈毅同志一来就谈起国共合作，我们是非常怀疑的。加之陈毅同志只身进山，只带了一张署名项英的介绍信，手续不全，我们无法证实他的身份。当时，虽有些江西战士证明陈毅同志是江西军区的司令员，谭余保同志也认识他，但是，省委书记陈洪时都叛变了，就是军区司令员，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呀！我们把陈毅同志作为“叛徒”抓了起来，并准备杀掉。这时，陈毅同志毫无受冤之意，他反复讲道理，耐心地启发开导我们。他讲了整整一天一夜，我们终于感动了，暂时未杀陈毅同志。于是，派人下山，去吉安找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曾山同志，经过了解，才知道陈毅同志讲的都是真的。当我们知道后，谭余保同志和大家都哭了。谭余保同志亲自给陈毅同志松了绑，向他道歉。陈毅同志这时却反过来安慰大家，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由于手续不全所造成的误会，他这种宽阔的胸怀，使我们十分感动。以后知道陈毅同志和我们一样，在赣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对他更加敬佩了。陈毅同志在山上的不少日子里，曾亲自写信给茶、攸、莲等地国民党政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终于等待到了胜利的一天，不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留下部分同志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继续坚持边区斗争，其余武装部

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团，在段焕竞、刘培善同志带领下，跟随陈毅同志奔赴抗日前线。

后记

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到此暂时算完了。但是，边区革命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决不止这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幅中，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仅占很小的一页，但它的意义是伟大的，它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许多骨干，并为以后成立的新四军输送了许多优秀干部。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王光美同志及其兄弟 参加革命的前后经过

王 新

王光美同志和她的三哥王光超、四哥王光杰（后改名王士光）、妹妹王光和（曾改名刘玲）、王光平（后改名刘莉）解放前都参加了革命，有的是具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诬蔑他们是“叛徒”、“战略特务”、“假党员”，强加了种种不实之词，实行了残酷迫害。我是他们参加革命的知情人和直接关系人，也受到了隔离审查。今天，应该还历史的真实面目了。

名字里的奥妙

王家人口众多，是个大家庭，光美她（他）们参加革命，涉及家中的其他人，因此，先谈一下王家的情况。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曾贴出这样一张骇人听闻的大字报，其中一段如下：

王槐青子女的名字是这样的：

子：光英、光杰、光琦、光超、光复

女，光中、光正、光美、光和、光平

十一字排成下列：

光复①和平②超英美，琦③杰④中正⑤

注解：

① 光复：统一中国，收复别人统治的土地。

② 和平：不分青红皂白，停止一切战争，打败对手。

③ 琦：作“依靠”讲，作“倚”讲。

④ 杰：豪杰，英雄的意思。

⑤ 中正：人民公敌蒋介石别名也，叫蒋中正。

如此解释，王家简直反动透顶了！

这张大字报取名“名字里的奥妙”。果真有奥妙吗？据我了解，事实是这样的：

王槐青老先生，本名王治昌，槐青是他的号。他早年刻苦读书，曾出洋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接受了明治维新的新思想。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过教，到北洋军阀的农商部里当过工商司长，还出使过英、美等国，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他前后有三位夫人，均是前妻续娶。

他有十一个子女，长子王光德，自小双目俱盲，早年故去。次子王光琦（因老先生在日本结婚后生，取长崎的崎字音），三子王光超（因出生后不久，母亲即故，为超度母亲而取字），三个孩子是前两位夫人所生。后来，王槐青老先生在天津教书时认识了董洁如，娶她作了夫人。此后，又有了八个子女，他们是：王光杰（因也算老大，取人杰之意）、王光复（袁世凯称帝倒台时生）、王光英（因老先生出使英国）、王光美（因老先生出使美国）、王光中（因老先生返国）、王光正（取意不清）、王光和、王光平（均

因当时战事较多，想和平之意）。由于子女多，哥弟姐妹不好叫，他们兄妹便商定，以哥姐相称，前面六个男子，均以哥称，后面五个女子，均以姐称，如光英称作六哥、光平称作五姐，这样来避免称呼过杂。关于他们名字的取意，显然都是很平常的。十年动乱中制造的那些耸听之言，既是极其荒诞，又是无知和十分可笑的。



右起：王光和、王光美、王光中、王光平（前排）
王光正、王光超、王新、胡珉、严仁英（后排）

天津秘密无线电台

我怎么成为光美她（他）们参加革命的知情人和直接关系人呢？要从我自己参加革命，到后来和王光杰同志认识谈起。

一九三六年，我作为东北流亡学生，进了天津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不久，就接触了党的外围组织校学生自治会，我

积极参加活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出版委员。“七七”事变后，同学们抗日情绪很高，由于我家条件好，她们就常常来我家学习报务和救护（为了准备抗战）。党的支部也常常到我家活动，当时我并不知道，不过她们都是我的高班同学，来来往往，家里并不介意。在进步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很快向党组织靠拢了，当年十一月十六日，我经阎国珍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我十七岁。

王光杰同志是北平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学生，由于他入学时认识了姚依林同志，因此在姚依林和郑天翔等同校同学的帮助下，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和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了“民先”，并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加入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学校暑假结束，刚刚开学，王玉瑛同志（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即张洁清）通知我，后天有个“南宫（河北省南宫县）来的人”和我接头，暗号是双方手中都拿着《万象》和《语丝》杂志（早已停版的刊物）。过了一天，王玉瑛同志又告知我，来人变了，不是“外来”的而是“城市”的，联系暗号不变。

第二天，我来到接头地点——天津大花园。果然，来人身着毛料大褂，一付城里人打扮。在公园的长条坐椅上，接上关系后，他低声对我说，工作需要通信机关，现在，外地来了一位搞通讯的同志，组织上要你去维护机关，与他组织一个“家庭”加以掩护。这消息太突然了，我认为自己还很幼稚，怕完不成任务，思想不大通。来人严肃地对我说，你不是党员吗，你背一下入党誓词。我无话以对。他又和蔼地说，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接着，他告诉我当晚再次接头的地点。这天晚上，我就见到了将要组织

“家庭”的王光杰同志。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跟我谈话的人叫姚克广，也就是姚依林同志，他不仅给我们在英租界伊甸园安排了秘密电台的机关，还给王光杰和我取了“吴厚和”与“黄蕙”的假名。开始工作后，原有的机器打火花，既不安全，又不能保密，王光杰同志请姚依林同志从北平运来了他自己装配的发报机，使用正常，而且安全，这个秘密电台就正式诞生了。

在姚依林同志的领导下，我学会了应付环境，维护机关。同时，在为党的事业工作中，我与王光杰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党组织正式批准我们结婚，从此，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光美对我们的帮助

还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光美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她读了《大众哲学》等许多进步书刊，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当时，王家好几个青年男女都满怀着救国的心情，十分憎恨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唯独五哥王光复，却十分赞赏国民党，他常在家中说，要抗日救国就得拥护国民党。光杰、光美等对他的这种言论十分不满，经常对他进行开导，但是收效甚微。后来，王光复仍不顾父母和兄妹的相劝，外出投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搬迁内地，光杰曾有一段时间在家居住，光美也休学在家，光杰一面暗地抄收苏联电台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台的新闻广播，提供党内领导同志参考，一面抽暇帮助光美补习物理课程，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不久，地下党组织

要求光杰自己装电台，以备后用，可装电台要买一定的器材，光杰手中没有多少钱，光美就把家里给她的零用钱拿出来，支援四哥，后来带到天津的那部发报机，就是靠兄妹俩的力量装成的。

光杰和我在天津搞地下电台后，活动是极其秘密的。他离家时扬言去上海就职，只有母亲知道是去天津做进步工作，通信联系便定期由住在天津小白楼的十舅收转。家里来的信由光美代笔，她在抬头总称“珠姐”（光杰小时叫“小珠”），以保护秘密；光杰回信称她“小妹”（光美小时称“小妹”）。

“王光超大夫诊所”——秘密联络点

一九三九年阴历十月初八，我生了一个男孩，光杰他母亲董洁如十分高兴，特意从北平赶来。这时，我们秘密电台已经奉党组织指示撤销，光杰和我奉命调到平西（北平西部）抗日根据地，由于要在北平接转关系，经组织同意，我们随董太太一同返回北平家中——旧刑部街三十二号。

回到北平，董太太为了使我们减轻负担，便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光杰随即和党的秘密交通接上了头，准备不日动身。正在协和医学院读书的三哥光超听说我们抵家，便回来看我们，他一见就问：你们需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啊。我们一听十分高兴，根据地多需要专门学习过的大夫啊。我问，你真想去？他说，想去，只是我还没毕业，毕业后，我一定去。我们对他说，要去根据地，什么时候都欢迎，以后我们交通来还可以带你去。三哥光超，是王家中第一个向我们表示要投身革命的，后来，他办的诊所，果然成了向根据地提供药品的秘密联络点。

事也凑巧，到平西根据地后的一次外出活动，我和其他几位

同志被地方乡团“白脖子”捉住了，但身份没有暴露，在当地党组织的活动下，我被送回北平，后由董洁如老太太的帮助，重新回到旧刑部街家中，但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的一天，记得是“圣诞节”，突然有一个人来找光超，我一看他的打扮，象是老区来的，不免心里又惊又喜，难道组织上来人了？不一会，光超进屋偷偷告诉我：你们的人来了。原来，当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同志到了平西，找到军分区司令员肖克同志，请他移交北平地下党的一些关系，并通过肖克同志找到了正在军分区司令部电台工作的王士光同志（即王光杰同志，到平西后改名；我在平西时也由王兰芬改名王新），刘仁同志说，听说你家人很多，是否可以在你家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呢？刘仁同志那时对王家所处的地位、影响显然是了如指掌的。士光告诉他，三哥王光超思想比较进步，是搞医的，曾表示愿意到根据地来。刘仁同志说，我们不希望他来，只希望他能在那里的联络点，这样作用会更大。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士光很快给光超写了封信。当天来的人，正是送信的秘密交通，由于我回家的情况士光还不了解，所以信中没提到我。

当晚，三哥带我到外院南房正在修建的诊室中见了这位同志，我请他向组织上转告我被俘和获救的情况。接着，三哥按照信上提到的需要金鸡纳霜和消炎药品的单子，连夜外出采购齐，装在天源酱园的酱菜筐里，第二天一清早，便让来人带走了。记得事后光超还有意地对人说，来人是他曾经治愈的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谢他的，送来了一些土产等等。

从此，光超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好事。一九四二年秋天，他在家的院内正式挂牌办起“王光超大夫诊所”，对外接待病人，地下

联络站也方便多了，常有人来取药品，秘密交通还向我转达了刘仁同志的指示，王光超同志不要求去老区了，提供药品的事很重要。刘仁同志并让我等待组织交给的新的任务。

接受新任务

一九四三年春，一个自称李道宗（即崔月犁同志）的人来找光超，接着找到我。他告知，他是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派他来和我接关系的。他向我了解了光超及其爱人严仁英的情况，并约定今后通过“王光超大夫诊所”联系。然后，他告诉我：你的任务是要动员王家的学生参加革命。为了使组织了解他们兄妹的情况，我一个一个作了介绍，光美（已上辅仁大学研究班）原来就倾向四哥，有一定基础，我和她感情很好，她在家里又说了算，四姐光和，在贝满中学上学，学校里进步学生较活跃，我跟她比较接近，容易做工作。经我介绍后，崔月犁同志同意先做她俩的工作，引导她们参加革命。

当时，董洁如老太太为了不使我一人住一间屋子发闷，特地让光和搬了进来，我心里很高兴，这下可便利工作了。晚上，光和常常谈起学校里两派学生的事，我就乘机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她听得十分仔细，后来她有趣地说，学生有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也有站在国民党方面的，双方都说自己好，你和四哥都是共产党，当然要说共产党好啰，我什么都不信，非要自己亲自去看看。接着她表露了要去根据地的想法。我听后，答应她有机会一定反映她的情况。当时，崔月犁同志给了我一些宣传工作用的书面东西，其中摘有毛主席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内容，我白天偷偷学习，晚上就讲给光和听。到了一九四

五年的夏天，经过光美同志和崔月犁联系商定，光和奔赴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继续当好一座“桥”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接受组织任务，正在锦州家中做父亲的工作，突然接到“速归”的电报，我一看这事先约好的暗语，便知道是三哥三嫂打来的，组织上同意我去根据地工作了。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兴奋之下，我匆匆赶回北平。在家没住几天，便和崔月犁等四人一同成行。没想到，到定县灌头村时，竟遭遇到抢粮的伪军拦截，我们受到了关押审讯。地下党组织很快通过在伪皇协军当营长的华有绵同志的活动，花了一些钱，找到保人，将我们救出来了。但是，由于交通断了，只得返回北平。

回到北平，我继续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当好王家子女和根据地之间的一座“桥”。五月份，我从家里搬出，到一所医院当“护士”，临行前，约光美今后在外面见面。六月初的一天，景山公园的山亭上，我和光美见面了，这时我们已经不仅是姑嫂关系，而且是地下党同志关系了。我一方面请她转告光和做好去根据地的准备；另一方面通知她，我不久还要离开北平，联系人可能会改变，请她注意辅仁大学的信件，再次接头由信件转告。回来后，我向崔月犁同志作了汇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北平。第二次由郑建庵同志去接头了，以后又改由崔月犁同志直接跟光美同志联系。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快投降时，我由东北返根据地，路经北平，五姐光平找我说，你和大姐的关系我知道，现在四姐也走了，你要帮助我，让我也走。我很快跟崔月犁同志联系，反映了她的迫切要求。这年秋，我离开北平后，光平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光美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已经积极为党工作。国共停战后，又经刘仁同志亲自指示，崔月犁同志通知她到北平军调处做翻译工作，光美同志开始踏上了新的历程。

*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到刘少奇同志这一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牵连，王家兄妹及子女蒙受了不白之冤。危难之际，周恩来同志多次站出来仗义执言。记得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国务院召开业务会议，周总理点名当时已经遭到批判的王士光同志参加，有人提出士光和光美的所谓“黑关系”，周总理听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了解他，他不是黑线人物！坚持让士光参加了会议。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士光被投入监狱。在狱中，他坚持学习，在一无参考资料，二无必要工具的条件下，写出了六七十万字的电子雷达技术资料。听说资料上送后，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对士光的刻苦精神，作了一定的评价。

一九七三年，董洁如老太太在狱中去世，周总理作了三条明确批示：老人是老人的事，不要和子女混在一起；在外地的子女可以来京参加告别，不要说人家是孝子贤孙；遗物要分给孩子们。周总理的批示，使仅仅能赶来告别的三个亲属子女感动得落泪不止。当时谁也没想到，就在同一个监狱里，竟先后关押过王家的六个老老小小！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事实到头来终究还是事实！

(晓实整理)

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

王
會
悟

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十号李书城家中召开了。

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有一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向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起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

党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爱人李达同志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兴夫人王宗汉、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黄绍兰校长，说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她答应了。我买了苇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博文女校。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于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十号李书城家中召开了。

宁死不屈的李联奎同志

赵 鸣 飞

(全国政协委员)

李联奎同志一九二二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山西省五台县二区人民武装自卫队大队长、

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

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付麻将牌。

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我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舱门，提醒代表们注意。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艇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施静文整理)

县委宣传干事等职务。他在县委和我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联奎同志是一个热爱党、工作主动、学习紧张、活泼愉快、刚毅有为的好青年。

由于内奸的告密，联奎同志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捕，押到了高洪口日寇据点。敌人先是胁迫一个被捕的年轻妇女劝说联奎同志投降，联奎同志当即怒斥其叛变可耻。她被联奎同志骂得不敢抬头，没敢再吭一声。敌人见计无效，就用烧红的铁钎子、铁铲子把联奎同志烫得遍体鳞伤，但联奎同志始终是怒目而视、威武不屈。

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残无人道地决定，用铡刀杀害联奎同志。在那充满腥风的刑场上，联奎同志满怀正义，出人意料地面对汉奸大声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必然要失败，你们要留条后路，不然群众是饶不了你们的！”他气宇昂然地向群众高喊：“敌人是杀不完我们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气急败坏的敌人上去捂他的嘴，联奎同志挺身一跃，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惊恐万分，连忙把联奎同志拉住要动手杀害，可联奎同志看到群众为他掉泪，又挣扎呼喊：“乡亲们，别伤心，日本汉奸是杀不完中国共产党员的，要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当敌人把他的头按在铡刀上时，联奎同志还在高喊：“兄弟姐妹们，要抗战到底！”在场的群众见到这般壮烈情景，无不潸然泪下。

李联奎烈士永垂不朽！

于若木同志谈和江青的斗争

本刊记者

“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借机上台，篡党夺权，以残酷的手段疯狂地迫害老干部。然而，除了那些软骨头以外，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同志，哪能屈服于这伙反革命野心家！为了捍卫真理，他们向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于若木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〇年，正是江青红得发紫的时候，于若木同志顶黑风，迎恶浪，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江青开火了，她贴出了一张公开点江青名字的大字报。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我们登门访问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于若木同志，请她谈一谈这一斗争的经过，她再三谦辞，表示不要多宣传个人，在我们反复申明这是为保存历史资料后，她才谈了这一斗争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经组织介绍，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开始听说了江青这个人，当时她在十二班，我在十九班，同班同学告诉我，她叫蓝萍，演过《大雷雨》，是有名的电影明星、红极一时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见她在党校自编自演了《弃儿》等节目。后来我进了马列学院，江青也进了这个学院，恰巧分到了同一个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认识了。那

时她为了个人的一些事情，经常跑中央组织部找人谈话。

一九四三年春，由于陈云同志长期劳累，身体比较虚，组织上决定他到枣园休息。到了枣园，我们和王稼祥、朱仲丽同志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枣园的另一处，江青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看看，还常让朱仲丽同志给她看病。当时，延安的许多干部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十分看不惯，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从不议论。江青也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谈话中对我表示赞许。那时，延安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待遇差距并不很大，就穿衣来说，一般人领平纹布的衣服，而领导干部是量体做斜纹布的衣服，我从来未与别人计较这些，只是按制度领普通衣服。江青说，你不与别人讲平均主义，不计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讲平均主义。

到了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这个人越发不象样了。从保健医生、护士那里听到，江青一个人要一个专职保健医生、三个护士日夜轮班照顾，我十分气愤地说，许多老同志资格比她老、功劳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没有这样做，她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何况她身体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嘛！

一九六二年春的一个夜晚，我随陈云同志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幢房子。刚一进门，就觉得眼前异常豪华，尤其是四周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连桌子也是用绿绒包了的。进了厕所，就连马桶盖、马桶的垫圈也用绿丝绒包了。陈云同志说，这幢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完全变了。随员解释说，这栋楼重新作了修整，是专门为江青同志准备的，后来她不住了。我听了才恍然大悟。住进去后，我仔细作了观察，窗帘有两层，一层是遮

光用的，这层窗帘在白天能够把光线完全遮住，就象洗像片的暗室一样，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听说江青只有这样才能睡午觉。这层窗帘是用三层布缝制的，向室内的一面是浅草绿色的丝绒，中间一层是棉绸，外面一层是黑卡其布。此外，还有一层淡绿色的乔其纱，这层薄纱是为了使室内光线柔和的。据招待人员说，在修整时，窗户都按要求改成了落地窗，而且安了双层窗。一、二楼，凡是主人活动的范围，从走廊到卧室、会客室、活动室、餐室、卫生间，所有的窗帘都是一样布置的。落地窗，从房顶到地面大约有三米多高。我数了数窗子的数目，大约估计了一下用布数量，恐怕不下几十匹布。我对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十分看不惯，非常不满，不断地向陈云同志嘀咕：“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跟陈云同志说了之后，我觉得并未解决问题，要按组织系统提意见。一次，警卫处处长找陈云同志谈问题，他一出来我就找到他，对他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潢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市场供应这么紧张，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去供应群众”。处长回答我说：“那还要问问江青同志，谁知她还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还告诉我，这种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还有三处。我一听，毫不客气地说，这真是开了眼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

谈话之后，我曾在陈云同志的随员中提过倡议，我说，咱们联名提提意见，起草个意见书，大家签名。但是，对我的倡议，他们一笑置之，谁也不敢理我这个岔儿。但是，我总在想，江青这样铺张浪费、挥霍财物难道就是合法的、应该的，不该揭发

么？难道她就可以例外么？我觉得她简直象高踞于党组织之上的太上皇，毫无顾忌的为所欲为。多数人对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靠边站了，后来下放到湖南衡东国家科委“五七”干校。六九年党的“九大”时，江青进入了政治局，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同志，都深为不满。第二年六月，干校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联想起一九六二年的所见所闻和其它一些事情，感到江青这种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对她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虽然江青当时已经红得发紫，搞了所谓“八个样板戏”，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宝座，有的人还提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的口号，但我想只要坚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为题，向党组织写了揭发材料。七月三日，我又在和一些群众共同商量的基础上，写出了一张题为《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在干校公开张贴出来。大字报从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露她的灵魂本质，特别举出了六二年我在上海耳闻目见的真实情况。我一针见血地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在她身上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使用的语言中，我觉得她完全是这样一种人物。

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中轰动了，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它寿命不长，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北京来了人，可能是带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离了，后来，戴上

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大会小会地进行批斗，罚干重活等等。最后，他们甚至召开全干校大会，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我被“专政”了，艰辛的日子虽很长久，但是我也从许多同志的态度上看出来，他们并不是真正把我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违心地念稿子。有些群众还乘没人的机会，偷偷安慰我，有的人还暗暗地给我送维生素B，问我要不要零用钱……。我从内心中感到有温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这一类坏人总是长不了的，党和人民总要胜利的。

于若木同志以后的情况怎样呢？

在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她不仅没有屈服于政治上、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反而更加挺起身子，继续揭发江青的问题，向组织和同志们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向组织写的思想汇报中，于若木同志义正辞严地写道：“我和江青之间并无任何个人冤仇。我和她的斗争，其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于若木同志明确认识到“现在吃点小小的苦头，是为了避免将来吃大苦头，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然让江青这类修正主义分子掌了大权，我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的思想汇报中，于若木同志更尖锐地揭露江青“以她那样恶劣的思想意识，居于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就有使我们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时候如果不挺身而出，坚持斗争，就会误了党的大事，葬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

到了一九七二年七月，于若木同志在向组织汇报思想时，

更加坚定地指出：“江青这个走资派就是现在党内最大的一个隐患，是名副其实的赫鲁晓夫”。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于若木同志对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在长时间的所谓“群众管制”期间，她在同江青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始终没有后退一步！

后来，于若木同志随着干校同志一块回到北京，但是，仍然被限制自由。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经过几番周折，于若木同志的女儿陈伟力打听到了她的消息。经过申请，北京市科技局白介夫同志批准同意，她们母女俩相隔多年后，终于重新见面了。一九七三年初，陈云同志从江西被接回北京，打听了于若木同志的情况，几经周折她才能够回到家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周恩来同志也关心着于若木同志，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见到科学院领导同志，问起于若木的问题怎么样了，说，你们是否搞得过分了一点？李先念同志也关心过此事。可是，在江青、康生一伙横行的日子里，于若木同志虽被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还留了一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喜庆日子里，于若木同志的冤案彻底翻过来了：在华主席、叶副主席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决定：撤销院党组原来对于若木同志的错误处分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号召全院同志们向她学习。听到这一消息，知情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于若木同志不愧是一位坚强的老同志，不愧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同志。当我们向她深深表示敬佩时，她认为不能这么看。她告诉我们：“我做的革命工作很少，当年是因为我受了小

学和中学教师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周小舟同志（当时叫周怀求，在两级女中教语文）对我帮助很大，再加上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大哥于道泉的影响，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一九三六年，我在北平女一中上学的时候，郭明秋介绍我和谷羽、王立言同志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即由团转党。这样，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

（石肖岩 黄国平）

王若飞同志在内蒙古地区革命 活动的若干史实

史 筹

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活动，是蒙汉各族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仅就接触到的史料对他在内蒙进行革命活动的若干史实，探讨于后。

一、若飞同志被派遣到内蒙以及被捕 和由国民党绥远法院解送太原陆军 监狱的时间问题

有些文章和著作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有所出入，很有必要核正。

若飞同志来内蒙工作以前，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据与若飞同志同时派遣到内蒙的一位化名“田××”的同志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写给中共河北前委的报告说：若飞同志等三人是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底决定派遣的。他们三人从苏联取道外蒙古，在库伦（即乌兰巴托）齐集后，于九月开始分两路

动身，一人^①去宁夏阿拉善旗定远营；若飞同志与“田××”同行，经归绥（即呼和浩特）到包头^②。

又据国民党绥远高等法院刑庭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对王若飞同志的“刑事判决”^③载：“缘黄敬斋（即王若飞同志——引者）于民国二十年十月间（不记日期）奉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之命，来绥远包头县……”。“判决”又载：若飞同志被捕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被捕地点是包头“泰安栈”。这份“判决”中并记有若飞同志说的：“我人地两生，刚到一月就被扣获”。

又据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字第二二七八号“密令”，以及同年七月六日政字第四四〇三号“指令”^④，王若飞同志从绥远高等法院解送太原陆军监狱收

① 此人即潘恩普，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被捕。据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一九五九年一月派人访问吉合同志的记录说：“潘恩普被捕后叛变了”。

② 此系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所搜集的资料。“田××”，即吉合同志。

③ 此“刑事判决”系从当时的指定辩护人王大顺律师处获得。

④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字第二二七八号“密令”全文如下：

“令高等法院：

查共犯黄敬斋即王若飞，业经该院依法判决交监执行在案。现值防共时期，对于该犯戒护，亟应注意，俾免他虞；兹经电奉太原阎主任本月巧申法电开：‘准将黄敬斋一名抄同原判叙明执行期满日，解送太原陆军监狱执行，并报备查’等因奉此，除分函晋绥宪兵副司令派员协助护送外，合亟密令该院，仰即将该犯黄敬斋克日备文派员解送太原陆军监狱收禁，并将起解日期具报备转。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主席傅作义”。

同年七月八日政字第四四〇三号“指令”全文如下：“令高等法院：二十五年七月六日呈报共犯黄敬斋一名，业由山西陆军监狱收禁由，悉悉。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八日，主席傅作义”。

禁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六日之间。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若飞同志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底由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的；同年十月间到达包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从绥远解送太原陆军监狱的时间则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六日之间。

二、敌人是否从若飞同志嘴里夺到 文字材料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一些文章和著作的说法也有所出入。

若飞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敌人逮捕他的紧急时刻，为了保卫党的机密和革命同志的安全，机智地把身边的文件材料塞进嘴里，英勇地和敌人搏斗，拼命往肚里咽。因此有同志的著作说：敌人没有从若飞同志嘴里抢出纸单。这不一定符合事实。

乌兰夫同志是当时在内蒙古地区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是若飞同志到内蒙期间经常与之联系和共同战斗的。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乌兰夫同志曾对《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的几个同志谈过这件事。他说：若飞同志被捕时，“搜出了汇票、他自己的报告和我帮他写的一个报告。他用香烟纸写报告，字写得很小，搜捕时一下吞进肚去了。我的报告用包头那种厚麻纸写的，他没能完全吞掉，被敌人拿到一部分，上面有我写的一部分真名字。这些人因我们赶紧通知，才没被抓走”。乌兰夫同志说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据上引国民党绥远高等法院对若飞同志的“刑事判决”中

载：“……黄敬斋独自一人寓居泰安栈，以收买烟土为名，藉掩旁人耳目。至是十一月二十一日晚被公安局稽查查店，在黄敬斋屋内发现其姓名与店薄所载姓名不符，乃带局讯问。复^①在其身上搜出《陈云章工作的情形》六纸、《告全旗蒙民书》一纸。黄敬斋见事败露，急将《工作的情形》、《告全旗蒙民书》共七纸，抢夺吞入口内，冀图灭迹。当被警士夺出，整理完好。将黄敬斋并反动证据呈解绥远省政府……。”

这份“刑事判决”的“主文”中并有：“《工作的情形》六纸、《告全旗蒙民书》一纸，均没收。”

“判决”中所说的“陈云章”，有一处还提到是“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陈云章”，这是乌兰夫同志当时的化名。敌人从若飞同志口中夺出的六张《陈云章工作的情形》，即乌兰夫同志写的当时由他所领导的内蒙地区地下工作的情况报告。这份工作报告确实被敌人夺去了一部分（敌人称“六纸”），“判决”中还列举说：“查核《工作的情形》内云：台已村有党员三名，已设有支部；巴什村、王必前气村、东西荣寿村，均有党员多少不等。是显系意图组织团体而危害民国无疑。”

敌人还从若飞同志口中夺出一张《告全旗蒙民书》。“判决”中说：“又查《告全旗蒙民书》内载解除痛苦的方法：（一）不能信赖国民党；（二）不能信赖班禅；（三）不能信赖王公；（四）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全是假话等语。是显系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自不待言。核其所多，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责。”

从“判决”看，敌人从若飞同志那里除了从他口中夺出去的

① 此字原件不清，似“复”，又似“后”。

这一点点未咽下去的材料外，其他一无所获。敌人所写的“判决”记下了若飞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坚贞立场。

三、党中央派若飞同志去内蒙的革命任务问题

有些同志的文章说：党中央派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地区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①说计划要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他计划活动的范围则不只是内蒙古地区，还包括西北陕、甘、宁、新各省的广大地区。

据上引“田××”同志一九三三年给河北前委的报告说：一九三一年七月底党中央派若飞同志等到内蒙，是要“成立西北特委”，“以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

这个报告的《附记》说：党中央“对于西北特委的指示——初步任务在于调查西北情形及西北各地党的情况，作一详细报告。对于内蒙党可以当时情形建立关系、接洽指示之，必要时可易临时接头。最重要者，即对回民暴动，虽尽量参加及组织，确实拿着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充实到组织中去，打入群众中去。”

报告并说：根据上述指示：“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 按着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军阀及欺骗民族统治的压迫（按：原文如此——引者），实行解放的原则上，实行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自决、民族独立。

(二) 在一般的说，组织西北共党，领到〔导〕西北农民反对

^① 见杨植霖、乔明甫著：《王若飞在狱中》，夏涛：《粉骨碎身全不顾，只留青白在人间——缅怀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光辉的一生》，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

帝国主义屠杀及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与地主的剥削，实行土地改革。

（三）以宁夏为工作中心建筑军事工作，组织游击队，渐渐成为红军，在军事上行动的第一步打通西北路线。”

“田××”同志是中共中央决定让他随同若飞同志一起来执行任务的，上述报告的基本内容应是可信的。

很明显，党中央派若飞同志来内蒙，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若飞同志的任务主要是来领导内蒙古及西北回族等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其中特别是组织回民暴动，要在陕、甘、宁、绥、新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把“西北工作打成一片”，和把“西北路线打通。”①

四、若飞同志到内蒙后的斗争概况

在敌人的法庭上，若飞同志曾说过他刚到内蒙一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除了敌人从他嘴里抢去的几张文字材料上所记的，“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完全是欺骗敌人的。若飞同志到内蒙工作的时间虽只有一个半月，但做了大量工作。

乌兰夫同志对若飞同志的这一段工作曾概括地说过：

“王若飞同志回来，这一带的工作就进一步搞起来了。据他的指示，要搞军事。‘长期的秘密的保存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要快一些在内蒙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他曾搞了一个内蒙平民革命党，还起草了一个宣言。在搞的过程中被捕捉了。搞这个党，说明只要把民族政策摆出来，工作就很快发展起

① 引语见上引“田××”同志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的报告。

来了。”

“王若飞来搞‘内蒙平民革命党’，搞蒙汉团结，共同抗日，就是针对这种自治运动的形势^①搞的，是要解决民族问题。”

“王回来后已把事情都交代了。建点后他就准备走了，由我们主要负责。王派吉合到陕北和刘志丹联系，并准备再在宁夏建个点。那时王还在包头一带组织了抗租抗税、反锅厘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②

王若飞同志的战友、夫人李培芝同志回忆说：

“他于一九三一年夏季（暑假后）去的内蒙，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他初去是为发动内蒙人民反蒋，建立苏区根据地，建党，领导内蒙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但他去后不久便是‘九一八’事变，因此他的活动任务也就随之转化为——号召和发动人民起来抗日救国：一方面积极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另一方面搞武装工作，组织军队准备进行抗日。当时内蒙的情况很复杂，不但有敌日伪军，还有土匪、傅作义的军队。在建党方面算是做成了；关于建立武装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联系方面，也做了些，如与当地杂牌军和土匪王英队伍中做过工作，使其上层过来，利用这对其部下进行整顿利用，用此力量（按：原记录稿如此——引者），并且在牧民中已经有了些武装了。据××后来说，他（指若飞同志）曾派人和陕北联系过。不幸的是未做成之前于当年十月间（按：

① 这里所指的“这种自治运动”，是指“背后有日本人搞分裂活动，把这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德王等正在酝酿的自治运动，是一九三一年夏，日特盛岛角芳在北平拉拢和策动德王搞的。

②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同志的谈话记录。

应系十一月间——引者）被捕了。在监狱中他曾几次上书给傅作义（约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要他全民抗日（共同抗日），在这方面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很难讲。自此后的傅作义作的还不太恶，也没有因他上书而杀了他，反之傅作义在这件事上作的还不太坏——国民党代表意图要杀他，他（指傅作义）认为这人是人才，有学问，人品好，不杀，很狡猾地给阎锡山和共产党送了人情。一九三四年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①。当时他给我和他舅父来信写道：‘我坐不了这十二年长的狱，中国革命就会胜利的。’在一九三七年春从太原被释放出狱。”^②

根据以上两位老同志的回忆，并参照一些其他材料，大体可以把若飞同志这一段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归结如下：

- (一) 若飞同志通过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对内蒙地区的情况作了调查考察。
- (二) 建立了一个内蒙平民革命党，还发了内蒙平民革命党宣言，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
- (三) 向内蒙地区的党组织传达、宣传了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正如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①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党绥远高等法院刑庭对若飞同志的“刑事判决”“主文”是：“黄敬斋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裁判确定羁押日数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若飞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捕的，而正式判决则是一九三四年四月，这中间的两年零五个月，国民党法院称为“羁押日数”，只能“二日抵徒刑一日”。所以实际刑期为十二年。

②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派人访问李培芝同志的记录。

《内蒙古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革命的历史》一文所说：“虽然王若飞同志在工作很短的时间后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但对内蒙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使内蒙的共产党员懂得了群众运动必须与军队工作结合，更进一步的来注意搞武装斗争。”

(四) 他直接领导了包头一带革命群众的抗租抗税、反锅厘的斗争。

(五) 他派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为把陕、甘、宁、绥等地的革命力量联成一片作准备^①。

(六) 派人去宁夏阿拉善旗定远营。若飞同志自己也准备把内蒙的工作交代好之后亲自去宁夏领导斗争，但尚未走成即遭反动派逮捕。

(七) 在内蒙的杂牌军和土匪王英部队中也做了一些争取工作。

(八) 在敌人的监狱里，若飞同志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敌人，教育了同志，并向监外给当时绥远省国民党统治头目傅作义写信做工作，对他晓以抗日大义，给他以影响。

若飞同志在内蒙古地区的光辉战斗历程，将永远铭刻在蒙汉各族人民的心中！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派人访问吉合同志的记录整理：一九三一年，吉合和王若飞同志派来内蒙古地区工作，“(在包头、归绥之间活动)，来内蒙不久，吉合同志因工作需要到了陕北，找到了刘志丹同志所领导的部队，在那里工作了一个阶段，主要做军事训练工作，并担任军事科长。后因另有任务，就到了宁夏，在宁夏不能开展工作，所以从草地跑回包头。到包头泰安客栈找若飞，听说若飞被捕了，组织被破坏。”